SHEHUIZHUYIFAZHANSHIGANG

社会主义发展史纲

高　放/策划
冯秀珍/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社会主义发展史纲

高放 策划　冯秀珍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发展史纲/冯秀珍著.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

ISBN 7－80083－996－6

Ⅰ.社… Ⅱ.冯… 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生－教材 Ⅳ.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434 号

社会主义发展史纲

SHEHUIZHUYI FAZHAN SHIGANG

著者/冯秀珍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省涿州市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印张/14.125　字数/349 千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7－80083－996－6/D·962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定价：28.00 元

（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66062752）

（发现内容误差请与本社编辑部联系　　电话：66062738）

序言：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什么会形成四个阶段

冯秀珍同志在北京科技大学对硕士研究生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已经有9年了。她一直使用我的文集《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或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重要参考书。但是这两本书份量都较大，她苦于缺少一本适合理工科研究生用的简明教材。于是我就建议她根据自己多年来讲授本课的体会和经验，自编一本具有特色的新教材。怎样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呢？我为她策划了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来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理工科学生习惯于线性思维。数学中有直线、曲线、抛物线和螺旋线之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四个阶段，恰似直线与曲线的交叉发展，呈抛物线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社会主义发展史纲》，这样的书名也与众不同，显出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四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呢？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也可以说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有四个阶段，即封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社会内部孕育成长。这时资本主义受封建主义的压制，又有封建主义渗透，因此我称之为封建资本主义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尚处于工场手工业状态，故有人称之为工场手工业阶段。这时商业为之引路，尤其是海外贸易得到

大发展，于是也有人称之为重商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促进了大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地大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垄断压倒了自由竞争。20世纪末以来，我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因为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等各方面社会化的程度都更高了，还有社会主义因素在明显增长。另有人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竞争超过垄断，全球竞争与合作正在大发展，因此还用“垄断”来界定当代资本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资本主义的这四个发展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等）和弊病（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政治倾轧、军事侵略、社会犯罪等）。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旨在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消除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弊病。所以随着资本主义有这四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上述四个发展阶段。

第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进程也有四个阶段。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大量开采煤炭以取代木料做燃料，这是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第一次革命的主要标志。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以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推广使用为主要标志，这是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以发电机的发明改进和推广使用为主要标志，这是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第三次革命。20世纪末以来，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改进和推广使用为主要标志，这是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第四次革命。科技和生产力的这四次革命亦即四个发展阶段。它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它越来越大又越来越快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形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文明成果。在科技和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四个阶

段中，举凡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管理法治化、文化多元化、乡村城市化、大众知识化、思想自由化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现代化、全球化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在摒弃资本主义糟粕的同时，理应全面继承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各种现代文明成果，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因此，与科技和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对应，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

第三，社会主义本身的实践也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在16－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起初有德国的闵采尔、法国的巴贝夫和卡贝、英国的欧文等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德、法、英以及美国开始建立最早的农村公社和工厂、银行等，从事小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到19世纪中叶进入科学社会主义阶段之后，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欧美建立了一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还创建了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国际组织。在这些工人政党和工人国际组织领导下掀起了愈益强大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胜利创建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巴黎公社虽然只坚持72天就失败了，但是却积累了群众性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经验。到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阶段，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胜利进而扩展到16国胜利，在欧、亚、美三大洲进行了广泛的较长期的实验。尽管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有严重弊病，由于它积重难返，先后在11国发生了剧变，然而它却提供了丰富的正反面经验。当今还有5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有更多的共产党、社会党和民族政党、绿党等等都在以苏联模式为借鉴，努力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今阶段社会主义实践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第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起初，人们出于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不满和

愤慨，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提出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其中不免含有较多空想成分。因此最早的社会主义理论被后人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阶段。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们以这两大理论为基石，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因素，进而把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当然，在实践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难免也还含有某些空想成分，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阶段。苏联是在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设社会主义，首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由于领导上急于求成，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因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既有教条式照搬科学社会主义之处，又带有某些空想成分，更有落后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和农民皇权主义、平均主义思想的渗透，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阶段。当今在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现代化、全球化空前大发展的世界新形势下，人们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思想境界大为提高，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弊病更加洞若观火，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文明成果更会精心吸取，从而对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和未来新社会主义的胜境，必定会更加结合本国实际，重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四阶段。

从上可见，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到当今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这四大阶段，的确像是数学中的直线、曲线、抛物线和螺旋线，呈现出曲折发展和螺旋型上升的态势。

冯秀珍同志按照我为她策划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这四大阶段的框架，本着厚今薄昔的原则写出了共为六章的书稿。前三章写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前三个阶段，后三章写最后一个阶段。写当代社会主义时，除了着重反映各国共产党的新探索外，还扼要提到社会党和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关于以色列基布兹和日本山岸实显地的介绍，是颇为新颖有趣的。从

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社会主义确是大势所趋，真理所在，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就不会只有一个方案，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也不能由一元独占，一家包办，一党垄断。社会主义必将是多元互补，多家协力，多党合作，多种方案，多条道路，多样模式，异途同归，异曲同工，异彩纷呈。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应作如是观。本书书末附录有一些社会主义原始文献摘编，便于读者赏识庐山真面目。我在审读全部书稿中还作了一些必要的修饰，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深信读完这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通俗读本，一定有助于读者认清社会主义的真谛，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激发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且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审读完全部书稿，再写成这篇序言，兴许对于读者总揽全书有所裨益。

高　放

2002年4月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前　言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 so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 sociui（喜好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的、共同的、集体生活之意。最先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尼迪克特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 1753 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到 19 世纪 20—30 年代，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才在报刊上使用“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称谓。

1872 年 5 月至 1873 年 1 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①] 过了两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解释说：他们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②]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是同义语。1875 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但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1894 年，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序言中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不同的经济纲领加以区别。列宁发展了思格斯的这一思想。1916 年 7 月，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第一次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1917 年 8—9 月间，他在《国家与革命》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27、6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527、638 页。

书中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样，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作为社会制度，才有了不同的含义。

“社会主义”一词主要包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是表示一种思想，二是表示一种运动，三是表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主张，它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矛盾，要求以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它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主张。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还没有激化的时候，反映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但陷入唯心史观，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不能指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明了无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其它社会主义也多是主张社会的公平、公正、公有的。

社会主义从1516年《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算起，迄今近约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分期，本书按照大的历史时期，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或重大转折点，大体上把社会主义发展史划为4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6世纪初年至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处在空想时期。这一时期又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即16世纪至17世纪，以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等人为主要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18世纪以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为主要代表的平均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300多年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确立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也由产生、发展走向衰落。

第二个时期，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期。在1842—1848年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逐步实现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基础上，先后合写了

《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与资本》，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主义原理》等重要著作，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1848—1895 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期。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发表了《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光辉著作，系统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提出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三个时期，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末，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形成、扩展、衰亡时期。20 世纪初，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运动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大特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党的建设、战略策略等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从 1917—1953 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检验、补充、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拓荒者，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继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长达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又犯有严重错误。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起，欧亚 15 国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以苏联为楷模建设社会主义。20 世纪 50 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局部改革，到 80—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在 11 个国家衰亡消失。

第四个时期，20世纪末以来是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首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改革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创举。1956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其次是社会主义在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落后国家进行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并相继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

最后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洲出现欧洲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类典型思潮，进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探索。他们采取和平的议会的方式，利用单独执政或参政手段，进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另一类是亚洲的以色列的基布兹、日本的山岸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局部实行社会主义的试验。此外，印度尼赫鲁模式的民族民主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的典型。

由于社会主义是思潮、运动、制度，所以其历史分期只能以大致的先后顺序来安排，其中必有交叉重合之处，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

关于本书的结构特点。一是重在史与纲。本书以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史依其先后发生安排顺序，如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如从理论到现实的发展。“史纲”，即在历史发展之大要处着墨。如写苏联、中国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份量的国家，再如在写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重在叙述经济建设而对其它着墨较少，因为经济是社会、国家的基础。二是以合纵连横即条块结合安排各章结构。全书虽然以历史先后为主

线安排纵向结构，但在构筑各个章节时又以横向为主。如朝鲜、越南等归落后国家类型，基布兹、山岸主义等归资本主义世界章。三是着墨于重点、特点。如全书是以重大史实来安排结构的，在各章节中也注意突出重点、特点，如民主社会主义一节，选瑞典模式为典型，而对其它模式不作论述。四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写欧洲共产主义一节时，叙述欧共理论后选择法国共产党的实践组成章节。五是在历史分期上，叙述稍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分界，因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分水岭，给较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带来一定影响。六是本书既可为教科书，又可作通俗读物。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参考教材，书后附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想、理论、学说供学习研究探讨。作为通俗读物，中国是现存社会主义的最大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4），每个公民都应知道社会主义的由来与演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温故而知新，了解过去、理解今天，才能更好地继往开来走向明天。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书中缺陷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冯秀珍

2002年1月28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国家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祖籍福建长乐，1927年生于福州市，1946年进北京大学学习，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带头人之一，是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1985-199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证书。著有《论我国过渡时期工农联盟问题》（1954年）、《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82年）、《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94年）、《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1998年）、《高放政治学论粹》（2001年）等；主编有《社会主义思想史》（1987年）、《社会主义大辞典》（1988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1989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90年）、《社会主义学》（1991年）、《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1991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1998年）等。著、编40余部，发表文稿200多篇。

作者简介

冯秀珍，1955年11月生，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人，故居荆树楼。1969年初中毕业，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哲学本科，1983年毕业分配于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并获硕士学位，1994年获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科毕业文凭。1993年由中国信息世界杂志社调入北京科技大学执教，1996年获评副教授。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生学位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本科生专业基础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专题》、《易经文化》等课程。1996年获聘副教授，1998年成为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会员。学术论文主要有：《论腐败与反腐败》、《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浅析》、《试述儒学的人文伦理特征》、《易学思维与自我管理》、《易学与人生》等。

目　录

序言 …… (1)

前言 …… (1)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 (1)
第一节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 (1)
一、莫尔和乌托邦 …… (2)
二、闵采尔和千载太平天国 …… (7)
三、康帕内拉和太阳城 …… (11)
第二节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 (17)
一、摩莱里与自然法典 …… (18)
二、马布利与立法改革 …… (23)
三、巴贝夫与平等共和国 …… (27)
第三节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 (35)
一、圣西门与实业制度 …… (36)
二、傅立叶与和谐制度 …… (43)
三、欧文与公社制度 …… (52)

第二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 (61)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 … (61)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奋斗历程 …… (61)
二、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 …… (65)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 (71)

一、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前提 …… (71)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 …… (75)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79)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 (79)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83)
三、正确认识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差距 …… (89)

第三章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 (92)
第一节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 …… (92)
一、列宁的奋斗历程 …… (92)
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在俄国诞生 …… (96)
三、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103)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 …… (110)
一、斯大林的奋斗历程 …… (110)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 …… (113)
第三节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 (119)
一、东欧剧变及其原因 …… (119)
二、苏联解体及其原因 …… (122)
三、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 (125)

第四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127)
第一节 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 (127)
一、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 …… (127)
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 (131)
三、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 …… (135)
第二节 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140)
一、毛泽东的奋斗历程 …… (140)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 (142)

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152）
四、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157）
五、关于毛泽东的评价……（163）
第三节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5）
一、邓小平的奋斗历程……（165）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71）
三、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与贡献……（177）
第四节　江泽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184）
一、领导干部讲“三讲”的思想……（184）
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190）
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199）
第五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216）
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背景……（216）
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218）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223）
四、改革前进中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229）

第五章　朝、越、老、古的社会主义……（232）
第一节　朝鲜的社会主义……（232）
一、朝鲜的概况……（233）
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234）
三、苏东剧变前的社会主义建设……（236）
四、苏联东欧剧变后的朝鲜……（238）
五、小结……（241）
第二节　越南的社会主义……（241）
一、越南的概况……（241）
二、越南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243）
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越南……（245）
四、小结……（249）

第三节 老挝的社会主义 …… (249)
一、老挝的概况 …… (250)
二、老挝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 …… (251)
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老挝 …… (253)
四、小结 …… (256)
第四节 古巴的社会主义 …… (257)
一、古巴的概况 …… (257)
二、古巴的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259)
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古巴 …… (262)
四、小结 …… (266)

第六章 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 …… (268)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和瑞典模式 …… (269)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党 …… (269)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 …… (271)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 …… (274)
四、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瑞典模式 …… (278)
五、小结 …… (284)
第二节 欧洲共产主义和法国典型 …… (285)
一、欧洲共产主义概况 …… (285)
二、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 …… (287)
三、法国共产党及其“新共产主义” …… (295)
四、小结 …… (300)
第三节 以色列的基布兹 …… (301)
一、以色列概况 …… (301)
二、基布兹的建立与发展 …… (304)
三、基布兹的特色 …… (308)
四、基布兹的评析 …… (314)
第四节 日本的山岸主义 …… (316)

一、山岸主义概况 …… (316)
二、山岸主义的特色 …… (317)
三、结语 …… (322)
第五节　尼赫鲁的民族民主社会主义 …… (322)
一、尼赫鲁模式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323)
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 (325)
三、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 …… (327)

原著附录 …… (332)
第一章　附录 …… (332)
第二章　附录 …… (345)
第三章　附录 …… (361)
第四章　附录 …… (386)
第五章　附录 …… (417)
第六章　附录 …… (425)

主要参考文献 …… (429)

后　记 …… (431)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期，终结于19世纪30、40年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的几百年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长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对立的反映，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独立运动的理论表现。

空想社会主义在此30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3个阶段，即16和17世纪的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阶段，18世纪的平均空想共产主义阶段，19世纪初期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由于资本主义还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各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程度不同地带有小生产者的思想烙印，即程度不同地倡导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到19世纪初期，由于资本主义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开始从工场手工业时期向大工业时期过渡，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摒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发展到和以往空想社会主义有着重要差别的新阶段。

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理论，它是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到19世纪30、40年代，随着现代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发展，这种幻想以理性征服世界的空想学说，就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而空想社会主义所包含的科学成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一节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16—17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在英、德、意三国开始产生

和在欧洲开始流传的时期。

这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从15世纪末起它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从而使英国广大劳动人民最先遭受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苦难。这样英国也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在16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资产阶级开展反封建运动诱发了闵采尔所领导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独立斗争（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这样德国就在16世纪20年代产生了以闵采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意大利在17世纪初经济停滞衰落又遭外族长期入侵，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贫苦人民要求摆脱痛苦处境的愿望反映。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从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早期基督教的传说，以至当时描写海外原始公有制部落的各种著作中吸取过大量的思想素材，更从当时的人文主义著作中吸取了理性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它们主要采用文学描绘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社会理想，思想中带有宗教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色彩。此外，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不但鲜明表达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解放要求，而且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各个方面也进行了广泛探索。它带有时代的特点与局限，给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带来启迪与思索。

一、莫尔和乌托邦

（一）莫尔的生平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十六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治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

莫尔，1478年2月7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富人家庭，1492年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法律，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对他影响深刻。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律师、国会议员、伦敦市司法官、下议院议长，直至英国政界中最显赫的大法官。

莫尔生活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毛纺织业。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对羊毛需求的激增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政府制定了严厉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迫使走投无路的农民去接受资本主义的无情剥削。时为律师的莫尔接到一个叫霍尔的农民的状子，倾诉被“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逼得走投无路，希望把状子递给国王。莫尔受到很大震动，他决心利用国会大厅向黑暗的制度开火，向国王亨利七世挑战。正巧赶上国王筹措3个1/15税（财产税、王子成年税、公主出嫁税），法案宣读三次无异议则行增税。莫尔借国会大厅慷慨陈辞，提出把增税法案改为减税法案，多数议员支持莫尔，但莫尔却遭报复。国王先逮捕了莫尔的父亲，又逼迫莫尔退出国会。他留在伦敦，潜心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思考社会问题。圈地运动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引起了莫尔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向往，从而使他超越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界限，形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516年，莫尔写成并发表了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亨利八世上台后启用他为大法官。1532年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利用宗教改革谋取私利而被迫辞职。1534年又因拒绝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首领而被捕。1535年在伦敦塔中被处死，头悬在伦敦桥上示众。

（二）《乌托邦》的思想内容

《乌托邦》一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由两个希腊字组成，意思是“没有的地方”。后来，“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该书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理想社会的空想的描写，采用一个旅行家同莫尔的对话形式写成。《乌托邦》一书流传极广，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

1. 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的批判

首先是对圈地运动的批判。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莫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这一典型的原始积累过程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莫尔把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为了养羊赚钱而残暴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称作是一场“羊吃人”的惨剧。他在《乌托邦》中写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①]“羊吃人”这句长期流传后世的不朽名言，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深刻写照，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沉痛控诉。莫尔还具体揭露了圈地贵族掠夺农民的残暴行径，记述了失地农民的悲惨遭遇。马克思十分重视莫尔关于圈地运动的精彩描述，在《资本论》分析资本原始积累的篇幅中作了详细引证。

其次是对贫富现象的揭露。资本原始积累加深了贫富两极的对立。莫尔对英国社会中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极大的义愤。他说，那些只靠别人劳动养活的贵族和绅士们全都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却从国家取得极大的报偿；而农民、矿工、木匠等劳动者终日辛勤操作为国家作出贡献，其所得却不足以糊口，生活不如牛马。莫尔同时还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法律也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英国对那些走投无路而被迫盗窃的人处以死刑过于严厉，法律是富人们为了剥削穷人聚敛财富而巧立名目的东西。

再次是主张彻底否定私有制。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莫尔，同当时所有其他思想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对私有制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莫尔看来，私有制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他说：“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就不管产品多么充斥，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的人贫困”；“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

① 《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下同），第 21 页。

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①] 因此，莫尔坚决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度。他认为，如果对私有制只是加以限制，那只能减轻而不能根除社会祸害；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才能平均享有一切，人类才能获得幸福。

2. 对理想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

首先是关于经济生活的描述。乌托邦的一切财产都归全民所有。私有财产已经全部消灭，乃至居民的房屋也要每隔 10 年抽签调换。乌托邦实行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家庭虽仍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但是已成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生产的基层作业组。除不超过 500 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以外，全体适龄男女都分别从事一项手工业作为自己的基本职业，并且都要轮流下乡参加 2 年一期的农业劳动。乌托邦含有计划生产的思想。乌托邦人对粮食等物品的需求有准确的估计，生产出比需求更多的产品，并由全国最高机构调剂各地余缺。由于义务劳动的普及，以及各种技术工艺的发明，乌托邦人每天只须劳动 6 小时就可使全部物资供应绰绰有余。乌托邦人实行消费品的按需分配原则。大家把生产出来的东西交归公共仓库，并从仓库无代价地领取家庭所需。乌托邦所以能够实行这种分配制度，是因为“首先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其次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②] 这表明莫尔认识到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的高度自觉是实行按需分配的必要前提。乌托邦实行有组织的集体消费，30 户为单位在公共食堂集体进餐。家庭炊事虽不加禁止，但由于集体伙食精美丰富，从而无人愿意在家开伙。乌托邦人对病老妇幼合理照顾。但又有明显平均主义倾向，他们“在全部居民中均匀

① 《乌托邦》，第 43 页。

② 《乌托邦》，第 26 页。

分配”产品，甚至在一般社会成员中“平均地分配”饮食。乌托邦人穿着粗朴，服装除了区别男女性别和结婚与否以外，式样永远一样。他们轻视盛装华服，把丝绸看成贱品。这是一种小生产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乌托邦人在国内的一切经济交往中已经废除了商品和货币。莫尔针对当时资产者到处追逐货币财富的拜金狂，着意描写了乌托邦人对金银的鄙视；他们把金银铸成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奴隶身上的镣铐和罪犯佩戴的饰物。莫尔主张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正如他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消灭私有制一样是种幻想。

其次是对政治生活的描述。阐明了关于在理想社会中必须实行民主制度的思想。乌托邦由 54 座城市组成。每个城市每年进行一次民主选举。每 30 户选出一名官员“飞哈拉”，每 300 户选出一名“首席飞哈拉”，并由所有飞哈拉从人民提出的候选人中秘密投票选出城市总督。总督虽系终身职，但如有阴谋施行暴政嫌疑就被废黜。其他如外交使节以至专事科学研究的人，也都由选举产生。全国最高领导机关为富有经验的长者组成的元老院。城市领导机关为议事会。任何公事必须经议事会充分切实的讨论。在议事会外或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者以死罪论处。乌托邦人之所以采取这种异常严厉的规定，是为了使官员“不能轻易地共谋对人民进行专制压迫，从而变革国家的制度”，[①] 以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维护理想社会的根本制度。乌托邦人由于受到长期的民主教育，很少发生纠纷，所以毋需很多的法律。“他们中间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

再次是精神生活的描述。《乌托邦》一书关于理想社会中人们精神生活的描写，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托邦人认为人生的幸福是由正当高尚的快乐构成的。这种快乐包括与正当的物质生活相联系的身体的快乐以及精神的快乐，而

① 《乌托邦》，第 55 页。

其中精神的快乐是尤为重要的快乐。他们所说的精神的快乐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二是道德的素养。乌托邦人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高度重视。那里的儿童都努力学习，男女公民也都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和研究。他们认为把充裕的时间用于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是人生的快乐，因此对于从事智力探讨从不知疲倦。这就使乌托邦人的科学文化在许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使他们善于发明各种技术和工艺。乌托邦人具有较高的道德风貌。他们认为来自“德行的实践”的精神之乐是最重要的快乐。因此，他们要求社会成员“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要“人人相互帮助以达到更愉快的生活”，要遵守“物质的分配上的公共法令”和“关心公众的利益”。乌托邦人十分重视道德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健全的道德意识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国家，而不正当的罪恶见解则导致国家的衰败。因此，他们十分注意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儿童和青年的品德培养。

莫尔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就无情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对劳动人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描绘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反映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驱者的贫苦大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创立了反映这种愿望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莫尔对于社会历史现状和它的发展前景都不能作出科学说明，但却为后人对社会历史的探索提出了重要课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思想材料。

二、闵采尔和千载太平天国

（一）闵采尔的生平

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空想社会主义者。

闵采尔约于1489年出生在德国哈茨的施托尔堡的一个铸币匠家庭，从小勤奋好学富有才智。1506年他17岁进入莱比锡大

学和美茵兹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获自由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学期间爱好旅游，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丰富社会知识，接触下层人民。他从当时的鞋会组织“崩德舒”中受到启发，形成这样的信念：脱离苦难，必须组织起来坚决斗争。23 岁大学毕业，选定了投身工农革命运动的毕生道路。

16 世纪初德国的工商业已有显著的发展，个别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同有的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落后而分散的国家，经济上的分散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执掌大部统治权的是由高级贵族中产生的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各霸一方。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专横的封建统治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闵采尔正是在这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声中踏上了德国的历史舞台。1517 年，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以公开发表反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论纲而揭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序幕。这次宗教改革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阶级斗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闵采尔在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初就全力投入了这场革命运动。路德是市民改良派的代表，在运动形成燎原之势后走上了妥协的道路。闵采尔则在运动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平民和农民革命派的倾向，最后与马丁·路德分道扬镳，走上了领导下层人民的独立斗争。

1520 年，闵采尔来到萨克森的茨威考担任神父，参加了当地工人建立的再洗礼派的活动。再洗礼派当时正在下层社会中宣传千载太平之国即将到来的思想遭到当局迫害，闵采尔挺身保卫再洗礼派的活动，并且帮助他们以更加明确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要求。1521、1522 年，他先后到布拉格、图林根等地进行宣传鼓动。闵采尔组织了“上帝选民同盟”（也称“基督教同盟”），向各地派出密使宣传和组织革命斗争。闵采尔及其拥护者的积极活动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从 1524 年夏季开始，接踵而起的农民起义终于汇集成席卷德国大部地区的农民战争，许多城市平民

和矿工也踊跃参加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运动。闵采尔是这场农民运动的公认领袖，由许多坚定的革命分子所组成的闵采尔派成了各地农军的核心。德国人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中，给予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但是反动势力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525年4月反革命诸侯联军发动疯狂反扑，闵采尔在战斗中重伤被俘，于1525年5月27日被秘密处决，头颅被悬于竹竿上。至今，人们凭吊那座山岗称其为“战斗山”，他被俘的那座石头楼房成为对他的纪念地。

（二）千载太平天国的思想内容

闵采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在领导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空想理论散见于他的许多讲演、文章和小册子，主要见之于《对诸侯讲道》、《答路德书》和《书简》等文献。

①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理论。由于教会在中世纪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人民唯一能够领会的革命语言就是宗教的预言，这就使闵采尔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采用了宗教哲学的形式。闵采尔娴熟巧妙地用神学辞令来攻击神学和宣传与神学迷信不相容的理性思想。他自称是上帝事业的捍卫者，但他笔下的上帝不再是主宰一切的神明，而是人民或人民革命意志的化身。他抹去了基督的神圣灵光，宣称基督是和大家一样的人，不同的只在于他是先知和师表。他推翻了神学教条的绝对权威，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在他看来真正的启示应是理性，他主张把圣经同理性统一起来，实际上是用理性取代圣经。他认为，凡是有理性的人包括非基督徒在内，都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即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入天堂。这种天堂即天国，并非如教会所宣称的那样在不可企及的彼岸，而应当在此生中寻找在现世上建立。既然没有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也没有来世的地狱。地狱也在今世，这就是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现实尘世。所谓魔鬼，就是给劳动人民带来苦难的邪恶欲念，就是充满这种邪恶欲念的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十分明显，闵采尔的这种

宗教哲学，就是为消灭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千载太平之国进行论证的革命的哲学理论。

②闵采尔对私有制和剥削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说，老爷和诸侯们霸占了水中的鱼、空中的鸟、田野中的植物，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如果有人从被他们霸占的地方去拿那怕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就要被他们当作盗窃而送上绞刑架。闵采尔愤怒斥责僧侣是恶毒的蛇，贵族是狡猾的鳗，他们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都是为非作歹的恶徒。他说，正是由于老爷们自己有罪过，所以穷人变为他们的仇敌。他还警告说，这班老爷们既然不愿消除群众愤怒的原因，就休想指望安宁的幸福。

③为了把人民从苦难的世界中解放出来，闵采尔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即千载太平之国。在这个天国里，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已被废除，一切财产都共同分配，人人承担劳动义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①] 这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④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建设理想社会。暴力革命思想在闵采尔的学说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闵采尔指出，为了建立理想的天国，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振荡。他所说的大震荡就是指人民群众手持武器消灭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社会制度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当他主要还是一个神学家的时候，他就操着宗教的语言号召人民拿起刀剑来对付僧侣，要人们象拔除莠草那样毫不怜惜地消灭这些恶魔。后来他更是主张用革命暴力对付一切反动派，公开提出要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说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活着的权利。他号召一切被压迫人民要趁热打铁，不要让宝剑从热血里冷却下来。他坚信强悍的暴君一定灭亡，权力将永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页。

转归人民。

闵采尔的共产主义理论无疑是远远超出了当时历史条件的空想。恩格斯认为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是“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①] 闵采尔把长期流传的早期基督教关于财产公有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第一次用来表达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劳苦大众的要求，使之成为早期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是他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功绩。

三、康帕内拉和太阳城

（一）康帕内拉的生平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康帕内拉原名乔万尼·多米尼哥。1568 年 9 月 5 日出生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省斯提罗城附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跟一个僧侣读书识字，十四、五岁时成为修道院的僧侣。在修道院的七、八年中，他广泛阅读了古代和近世的许多哲学、神学和自然科学等著作。不懈地发愤努力使康帕内拉在青年时代就才华出众知识渊博，17 岁上就在哲学辩论会上崭露头角。

意大利早在 14、15 世纪就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在 16、17 世纪，经济衰落与入侵者的蹂躏，以及罗马天主教教廷势力的控制，使意大利人民的处境异常痛苦，反抗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入侵者的斗争接连发生。正是在这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康帕内拉不仅成了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封建教会势力的英勇战士，而且成了批判现存剥削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康帕内拉虽然少年皈依宗教，却没有成为虔诚的教徒。由于屡有异端表现，在 1591—1597 年间，他数次遭宗教裁判所逮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14 页。

囚禁，有一次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1599—1628年又两次被西班牙当局和宗教裁判所逮捕囚禁。他在狱中度过33年，坐过50个牢房，受过7次严酷刑讯，有一次刑讯时间长达40小时。一直坚贞不屈，在狱中以顽强的毅力从事写作。康帕内拉著述甚多，其中不少成书于狱中。1601年下半年在狱中写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太阳城》是他的最重要著作。同《乌托邦》一样，《太阳城》也是用对话体写成，也是通过对未来社会的空想的描写来表达作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为了回答对《太阳城》的非议，康帕内拉于1609年又写了《论最好的国家》一文，对《太阳城》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康帕内拉晚年被迫逃往法国，1639年5月21日逝世于巴黎。

（二）《太阳城》的思想内容

1. 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

首先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深刻揭露。康帕内拉尖锐地指出，意大利社会“好象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在那里，辛勤劳动的工匠受人鄙视，游手好闲的人反而受到尊崇，这就不能不产生愈来愈多的懒汉和恶棍。“拿那波利城的七万居民来说，其中差不多只有1万至1.5万人从事劳动；这些人由于逐日从事力所不及的不间断的工作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至于其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因无所事事、悭吝、疾病、淫佚放荡、高利盘剥等等而在危害着自己。那些在贫困的压迫下不幸沦为奴仆的多数人也被他们所败坏，沾染了他们主人的各种恶习。结果人们都不大愿意去履行社会义务和完成有益的工作。”[①] 这段描述不但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剥削者的厌恶，而且充分暴露了现存社会的腐朽性。在康帕内拉看来，正是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导致了意大利经济的衰落和“使国家濒于灭亡。”

其次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意大利的政治统治机构。康帕内拉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24页。

指出，这个国家总是“捧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做政府的首脑”，而它所以“认为他们适合做政府的首脑，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或者他们是由统治集团中选出来的而已。”① 这些深有见地的论述不仅揭露了意大利政治上的腐朽性，而且表明康帕内拉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是由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机构，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康帕内拉在针砭统治阶级的同时还旗帜鲜明地为被统治阶级的正义斗争进行辩护，明确指出；“国民通常是由于负责人的专横，任性，或由于贫困以及国民太受屈辱和轻视而激发叛乱的。”②

再次是揭露了现实社会罪恶的根源。康帕内拉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现象都是由贫富对立引起的，“违反誓约、卑躬屈节、撒谎、偷窃、不整洁等都起源于贫穷；劫掠、傲慢、吹牛、游手好闲等等恶习都起源于富贵。”③ 所以他说“贫与富是国家制度的主要缺点。”他还认为自私自利是万恶之因，是产生诡辩、伪善和残暴行为这三大恶习的主要罪恶根源。他强调指出，一切纷争和祸害都是由于人们把世界上的东西分成我的和你的，把万物变成自己的财产；而人有了自己的财产，就会靠它来侵犯别人的权利。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把‘我的’和‘你的’从我们的事物铲除，那么战争就会停止，和平将占优势，不会再发生纠纷。”④ 康帕内拉正是从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中得出了必须建立公有制结论。

2. 太阳城的理想社会

①太阳城是公有制经济的国度。同莫尔一样，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也幻想了一个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太阳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4 页。
②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5 页。
③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6 页。
④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75 页。

城”就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在太阳城，私有制已被彻底废除，全部生产资料和一切生活资料都归大家共同占有。为了防止私有制的产生，太阳城人每隔6个月重新分配一次居室，比乌托邦人每隔10年调换住宅的周期更短。一切公有的社会制度不仅使太阳城消除了贫富的对立，而且使人们不是“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

太阳城是由社会组织生产的。农业是受到特别重视的生产部门。全体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有参加农业劳动的义务。除农业外，畜牧业、手工业和航海业也是很受重视的生产部门。太阳城人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他们编写专门著作来指导农牧业生产，用“各种秘密方法”来改良农业，用良好方法来繁殖和饲养牲畜。太阳城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男子一般从事较繁重的工作，女子从事较轻便的工作，身有残缺的人也被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尽其所能。由于普遍的义务劳动消灭了一部分人游手好闲和另一部分人过度劳累的不合理现象，以及社会在分配工作时充分考虑到人们的不同秉赋，太阳城“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都不会危害身体，反而会发展他们的体力。”太阳城人人人平等，任何工作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精通艺术和手艺的人固然格外受人尊重，但谁也不认为炊事或为病人服务等是不体面的工作。所以，“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去完成。”[①] 明确提出一切为社会服务的劳动都是光荣的思想，是康帕内拉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由于太阳城人普遍树立了劳动光荣的思想。因此也就具有高度的劳动自觉性，都能愉快而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人们的自觉劳动以及义务劳动的普及和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太阳城人每天只做不超过4小时的工作就能获得各种丰富的产品。

太阳城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不过它实行的是有严格监督的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按需分配制度，“负责人员严密地监视着，不让任何人获取超过他所应得的东西，”① 这种有监督的按需分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配给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太阳城人都必须在公共食堂就餐，年龄和地位相同的人通常都享受同类的膳食；社会还按季发给全体男女公民以同样款式和颜色的衣服。虽然食物是讲究营养的，衣服的质料是良好的，但社会成员的生活却是单调一律的。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太阳城内部也就废除了商品和货币，金银只被用作制造器皿或公共装饰品的材料。

②太阳城实行集权政治制度。康帕内拉设计了一种“贤人”治国制度作为太阳城的基本政治制度。太阳城是个政教合一的共和国。一位被称为“太阳”的大司祭是世俗和宗教的最高首脑。“太阳”由知识渊博和十分贤明的35岁以上的人担任。他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反对他的人要被处以死刑。“太阳”有3位司祭协助工作。3位司祭对“太阳”的意见必须遵从，一切工作非经“太阳”批准不能进行。这四大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进行更换。而是由他们自己让位于更加贤明的人。由于这种更换很少发生，四大领导人实际上都是终身职务。其他各级负责人由四大领导人会同有关方面向公民大会推荐提名，并由公民大会根据提名进行选举。选拔负责人员的标准是“德行出众”和有“实际技能和学问”，而不是“根据赏识和亲戚关系”。他们对待所有公民犹如自己的兄弟、儿子或父母，因此一般公民乐意接受他们的管理，而不愿自己充当首领或司祭。太阳城虽然每半月召开一次由20岁以上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但大会只能对共和国的缺点和政府负责人员的工作提出意见，并无审查和批准政府工作等的重大民主权利。总之，太阳城是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贤人”治理的国家，而不是全体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种设想反映了康帕内拉对于实现意大利的集中统一和革新政局的强烈愿望，但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页。

是，同莫尔富有民主精神的政治思想相比，这种设想是明显的后退。太阳城中只有很少几条简明的法律。实施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对违法者进行教育改造，人们都把一般的治罪判决看作是“保证能治好疾病的药方”。对于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人，太阳城的法律也要处以死刑。

③太阳城人的精神生活。康帕内拉对于理想社会中的文教科学事业十分重视。太阳城的孩子们从二、三岁起就看图识字，学习文化，7岁开始学习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太阳城人在各个城区的内外城墙上画着各种图形或图表，设置各种实物标本，用以对儿童进行关于自然科学、生产工艺和历史知识的直观教学。他们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是如此优越，以致他们的学生在一年之内就能取得超过其他地方10年或15年的学习效果，儿童们在10岁前就能掌握各种基本科学知识。他们重视儿童的智育，也重视儿童的体育，并且十分注重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从7岁开始就要兼学一门生产技术。太阳城的成年公民也普遍重视各种科学研究，都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有益于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文化活动。由于文教事业的普及，太阳城人的科学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不但取得了能够应用于生产的多种科学成果，发明了“靠一种非常精巧的机械行驶的”大船，发明了航空术，创立了新的天文学，而且要争取在最近的将来发明用以发现新星的望远镜和接收“天空和声”的助听器。这些大胆的想象充分表明了康帕内拉对于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太阳城人十分强调人口的优生。他们认为只有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完美的“天性”和体格社会才能和谐。因此，能否生育最优秀的子女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福利和国家存亡的大事。这无疑是康帕内拉学说中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但是他又认为，为了保证实现优生，两性的结合必须服从政府的调配，负责人员要根据最有利于优生的先天条件而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来规定两性的结合。不仅如此，康帕内拉由于认为各有妻儿的家

庭是私有制形成和延续的根源，还主张实行旨在消灭家庭的公妻制。有时他又主张把不能生育的女子宣布为公妻。

太阳城人迷信宗教。他们把四大领导人看作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化身，把司祭看作神和人之间的传话人。他们还深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后他的灵魂将分别归附于善神或恶魔。他们对占星术竟然迷信到这样程度，以致认为各项农业生产和妇女受胎的时间等等都应根据星象位置来确定。

康帕内拉坚信全人类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从前曾有过”的“黄金世纪的时代”，并对这一理想社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见解，给后人很多启迪。

第二节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18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那么，“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①]

这一时期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都出现在法国。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然而这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推翻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法国资产阶级的一批革命代表人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他们运用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对封建制度以及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意识的发展，导致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摩莱里和马布利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接过了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和自由、平等的口号，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度和建立公有制度的必要性。在18世纪末法国革命结束后，法国平等派运动的领导人巴贝夫更是用理性论批判了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

制度，论证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主要采用了法律条文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社会理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所以他们的思想带有小生产者的痕迹。如果说，在16和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种倾向在18世纪有了明显的发展，以致成为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所普遍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一、摩莱里与自然法典

（一）摩莱里的生平

摩莱里（1720—1780），18世纪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摩莱里生卒月日不详。他的生平至今只知是法国人，出身贫民，当过教师。摩莱里是真名或笔名尚无法确定。

在18世纪40到70年代，摩莱里发表过不少著作，著作的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哲学、教育、美学等领域，有的匿名发表，有的署名“摩莱里”有的署M和六个星花符号。其中的《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是他两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前者是一部长篇叙事诗，用乌托邦形式描绘了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幸福国家。此书出版后，遭到国内外一些刊物的猛烈攻击和恶意歪曲。后者是为捍卫《巴齐里阿达》的思想观点而写的。书中用法律形式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共产主义原则，被称为“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他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对于18世纪末的巴贝夫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形成发生了更明显的影响。摩莱里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出现，表明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表明了法国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阶级意识的一定发展。

（二）《自然法典》的思想内容

1. 摩莱里的社会历史观

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摩莱里是以理性论的历史观来论证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但是，摩莱里的理性论的历史观较为系统富有特色，对后来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颇有影响。

按照摩莱里的说法，人在自己生命的最初一刹那，处在完全没有观念的漠然状态。随后他被自身的需求所唤醒，这种需求使他产生自爱，关心自我保全。由于自然界的巧妙安排，人们的需求和人们满足需求的能力是相符合的；但是就每一个人说来，他的需求总是稍微超过他的能力，存在着需求大于能力的矛盾。自然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为的是促使每个关心自我保全而个人能力又不足以满足需求的人互相联合起来，共同占有和使用自然所赐予的土地，平等互助共同劳动，为的是使人类产生和发展与共同幸福有关的理性观念。摩莱里认为这就是支配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自然是一个整体，恒久不变；自然法也是不变的”。[①] 这样，摩莱里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看作自然规律所要求的和合乎人类理性的社会制度。摩莱里认为人类的原始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性社会。那时的“世界是一张大饭桌，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甚至象康帕内拉一样认为那时就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后来，由于人口增长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公有制的破坏和私有制的产生。

摩莱里还提出了人类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观点：“人们经常说，王国也象人一样，有它的童年、青年、壮年和暮年时代，对于整个人类还不是一样?”[②] 他写道，原始社会虽然是符合人类理性的黄金时代。但那是人们无意识地建立起来的。人们并不认识它是最好的社会，所以易于发生一连串的理性失误，使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产生易于变质的缺点。后来由于蒙受私有制的祸

① 《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5 页。

② 《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81 页。

害，人类的理性才逐步成熟起来，并且终于发现“任何状况都不能比单纯的自然状态更美妙”，于是人们试图改革法律去逐步接近黄金时代。摩莱里深信通过这样的改革途径，人类“将会达到恒久的纯真无邪的状态”，即不再发生变质的理性社会。

2. 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

一是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摩莱里在他的著作中对私有制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母”，是造成一切政治上和道德上罪恶现象的原因；私有制产生了个人利益这个普遍的瘟疫，产生了表现为虚荣、伪善、野心、妒忌和懒惰等各种形式的贪欲；私有制使一部分人把应尽的社会义务强加在别人身上，一个或几个家族依靠对大多数人的掠夺而享受荣华富贵；私有制使穷人成了低贱的动物，遭受贫困和不幸。二是对剥削阶级的国家作了深入揭露。他说，国家迫使穷人忍受少得可怜的报酬，却让游手好闲的富人得到优厚的收入；国家的财富不是集中到国王手里，就是被有力量取得它的人所掌握。摩莱里对于这种剥削阶级的国家表现了极大的义愤。他说：既然国家对不幸的人没有什么好处，那么让国家灭亡好了。摩莱里还从剥削阶级国家对穷人没有什么好处这个观点出发，对私有制社会中包括专制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内的各种政体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切政体都或多或少以私有制和私利为基础，那是一切基础中最不稳固的基础。摩莱里还批评了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著名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理论。他说：“这种分权，在私有制和利益所造成的惊人不平等的状况下，丝毫也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不幸居民所受到的最大痛苦，这只不过是使人能够高声喊冤的可悲慰借而已。”①

三是主张通过教育来消灭私有制。他呼吁那些“以统率民族为己任的人”给予象他那样的“真正的智者”以充分的自由，帮

① 《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75 页。

助统率民族的伟人按照自然规律实现废除私有制的伟大变革。摩莱里认为这种通过教育“使人复归于善、重获本性”的办法不但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且是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说，由于人民对私有制社会已经感到厌恶，因此“无需进行长时间说理便能使甚至最愚笨的普通人了解永远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于某些立法者来说，难道比推行可怕的法律还困难吗？一点也不是。”① 摩莱里正是从这样的信念出发，在他的《自然法典》一书中制定了一部他深信能够很快实现的关于理想社会的法律，用法律条文形式对未来社会的幸福生活作了详尽的描绘。

3. 对理想社会的描绘

一是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摩莱里是用法律条文形式描绘未来的公有制社会的。共产主义法典包括作为总纲的基本法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原则规定的各种具体法。在3条基本法中，摩莱里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的规定：“社会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得单独地或作为私有财产属于任何个人，但每个人因生活需要、因娱乐或因进行日常劳动而于当前使用的物品除外”；“每个公民都是依靠社会供养、维持生计和受到照料的公务人员”；“每个公民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才能和年龄促进公益的增长。”② 这说明，摩莱里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基本生产资料公有、人人有为社会各尽其能的义务和从社会取其所需的权利的社会。

二是未来社会是个统一经济整体。社会生产基本上分为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门。农业劳动是20到25岁的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义务。年满26岁的公民除自愿留作农业部门的技师和领导者外，都转入手工业部门。40岁以上公民可以自选职业和随意支配休息时间。摩莱里对于手工业的生产组织作了独特的规

① 《自然法典》，第98页。

② 《自然法典》，第106—107页。

定：手工业的每个行业中由年龄最大、经验最多的人每隔6天轮流领导5至10名工人；每10名或20名工人中设工长一名，任终身职；这些工长每隔一年轮流出任本行业首长。这种既有终身任职又有轮流任职的规定，反映了封建行会思想和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于摩莱里的影响。

三是对社会主义劳动理论的探索。康帕内拉开始提出了劳动光荣的思想，摩莱里进一步把劳动看作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人是生来就要活动的创造物，因此就其本性来说并不是懒惰的，只是由于私有制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才使人对劳动感到厌恶。所以，在合乎人类理性的未来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认为自己不应当劳动。同心协力使劳动变成了有趣和轻松的活动。”①

四是按需分配问题。在摩莱里的未来社会中没有商品交换，社会按照需求进行有计划生产按需分配。摩莱里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生产水平不高和产品不足的社会，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摩莱里对按需分配作了这样的限制：“如果普遍使用的或部分人使用的非生活必需品感到缺乏，以致数量不敷，以及发生可能某一公民得不到这种物品的情况时，则暂时停止发放，或减量供应”。② 这个限制事实上动摇了按需分配原则，使之变成平均分配。其实，在摩莱里设想的理想社会里，平均主义不仅表现在对部分数量不足的产品的分配中，而且表现现在人们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每家各住一所房屋，而且形状划一；儿童的饮食、衣服以至教育到处一样；同行业中10岁到30岁公民的服装划一，甚至病人的待遇也完全相同，等等。为了克服供需之间的矛盾，摩莱里不但规定了许多平均主义的措施，而且积极倡导禁欲主义。《自然法典》规定：公民的衣着不得过于奢华饮食应有节制，各级首长要以身作则率先

① 《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4页。

② 《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

节俭。如果说，在莫尔和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倾向已经有所露头，那么，这种倾向在摩莱里的著作中就有了明显的发展。

五是行政体制的设想。摩莱里的平均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分配的设想中，而且表现在关于行政体制的设想中。按照《自然法典》的规定，未来社会中每个省所属的城市数目相等，每个市所属的部族数目相等，每个部族所属的家庭数目相等。全国各级的行政首长，都不是根据德才标准选举产生，而是分别由下一级首长根据平均主义原则轮流担任。此外，族长和国家元首都是法定的终身职务。由此可见，在摩莱里关于行政体制的设想，不仅有平均主义的烙印，而且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摩莱里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倾向和封建主义痕迹，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摩莱里使空想社会主义开始成为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而且在于他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富有成果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

二、马布利与立法改革

（一）马布利的生平

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1709—1785），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马布利出生于法国格莱诺布尔市一个贵族家庭，里昂耶稣会学院毕业。曾任巴黎圣·苏尔皮齐修道院院长，后在法国外交部担任要职。1740 年辞去官职，全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著作很多，死后被编辑为 15 卷的《马布利全集》于里昂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社会主义著作有：1758 年写成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1768 年发表的《向哲学家经济学家提出的对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的疑问》、1776 年发表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他的许多著作具有论战性的特色，富于理论性和逻辑性。

（二）马布利的思想内容

1. 马布利的社会历史观

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布利也是用理性论来论证共产主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的。他说，理性是“引导我们走向幸福的唯一指导者”，是自然界给人们制定的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律”，[①] 这条规律引导人们实行财产公有，“并为共同劳动而把自己的力最联合起来”，[②] 使人们“可以尽多少义务而享多少权利”。[③] 马布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社会是永恒不变的理性所产生的社会。

马布利对人类历史过程的叙述比摩莱里富有创见。在关于原始社会的叙述中，他不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私有制度和阶级差别的社会，而且认为这个社会先后经历过渔猎阶段和农业生产阶段。在农业生产阶段，身体较强的人耕地，其余人从事简单的手工业。马布利还对原始公有制瓦解和私有制起源问题提出过这样的推测：原来为公众服务的公务人员后来利用职权侵占公众的经济利益，并把公共的政权变为有利于自己的东西，最后成为统治者。在马布利对人类历史的叙述中还可看出，他已了解到继原始社会之后曾经出现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他指出奴隶制度曾经玷污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共和国，谴责封建制度使所有土地都落到了贵族手里，并且产生了君主政体，给欧洲带来了最粗暴的偏见。马布利虽然没有提出过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已经批判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社会特征。一方面是从各地获取利润，为财富而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是大批佣工的出现。马布利的这些看法虽然还不能清晰反映人类历史的真实过程，但是为后人对于历史过程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

① 《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51 页、120 页、126 页。

② 《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51 页、120 页、126 页。

③ 《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51 页、120 页、126 页。

的思想材料。

2. 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

马布利首先从道义上对私有制进行尖锐的抨击。他写道，您知道什么是折磨人类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源泉吗？是财产的私有制。私有制首先造成了财产的不平等，进而“引起利益的不平等和对立、贫富的罪恶、道德的颓废、智慧的退化、偏见和私欲的产生”，这时，“就会出现不公正和暴虐的政府，制定偏袒而具有压制性的法律，一句话，折磨人民的一切灾难都要降临”。[①] 在对私有制的认识上，马布利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他不仅看到了阶级的存在，而且把阶级的存在同私有制联系了起来。他说：“在实行土地私有制度，从而存在着财产不平等现象，公务人员和公民在完成各种福利工作中，处于类似佣工状态的社会里，能够存在大家都认为是最好的制度吗？谁能看不到我们的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级？”[②] 他认为，在这样的阶级社会里，由于富人贪婪地掠夺人民侵略邻国，必然会发生不和、倾轧、内战和革命，发生各国之间彼此攻打的战争。

其次在如何看待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布利同重农学派开展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重农学派把人的自身称作我对自己个人的私有权，把人对生活必需品的自然需要称作我对生活必需品的私有权，并认为这两种私有权就使我有占有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土地的权利，即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认为这三种私有权构成一个整体不可缺一。针对这种观点，马布利指出，在古代的公有制社会中，人虽有前两种私有权但并无土地的私有权，这就证明所谓三种私有权密切相联不可缺一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所谓土地私有制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马布利认为，来自自然界的人都有同样的需要，都是平等的。因而只有保证人们的财

① 《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95 页。

② 《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108 页。

产平等和地位平等的土地公有制才是合乎自然秩序的，而重农学派所鼓吹的土地私有制则是违背自然秩序的。马布利还驳斥了重农学派关于富人和穷人都是自然秩序所要求的彼此同样必要的部分的观点。他说：如果有富人就得有穷人，他们彼此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偏偏叫我安于可怜的穷人地位，而却叫他人居于显要的富人地位呢?

再次是彻底否定富人政权。马布利对于压迫穷人的富人政权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专制政权没有合法权力，人民有权为了恢复自由而进行反抗，甚至有权拿起武器进行内战。他说，内战是坏事，因为它破坏人的安全和幸福，但是，在社会有被专制制度毁灭的危险的时候，内战就是好事。这样公然申言对专制压迫应当实行暴力反抗，对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说来是难能可贵的。

3. 通过立法改革到达理想社会

马布利幻想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在那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人们把生产的劳动果实都送到公共仓库去，这些果实都是国家的珍宝和每个公民的财产。家长们每年选出家政管理员，这些人员的职责是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必需品，按照公有制对每个人的要求分配工作，并维护国内的道德。

在对实现理想社会的前景的估计上马布利和摩莱里截然不同。摩莱里认为毋需很长时间就能顺利实现理想社会，马布利则认为这种理想社会不可能很快实现。他认为，由于人们的心灵深受欲念的侵蚀，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无法找到诚实的人去完成实现公有制的改革。因此，要放弃“一步登天”的念头，通过立法改革到达理想社会。立法改革大致有四：

其一是改革税制。马布利认为，人们沾染恶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手中的财富过多，这种过多的财富使执政者产生了不公正的念头。因此要按照减少国库财富的原则改革税制。其具体主

张是只征收直接土地税，废除各种中间税；没有财产的人不纳税。这实际上是要求由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承担大部国家税金的反封建的主张。

其二是土地制度改革。马布利在土地法中规定，每个公民都应占有不超过一定限额的土地。如果社会已经形成贫富对立的等级，以致无法立即实行让每一农民占有一份土地的法律。那么应当规定贵族、僧侣和百姓这几个等级各自应占的土地数额，以防止土地的进一步集中。在封建贵族变本加厉兼并土地的情况下，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

其三是取缔豪华。他认为，要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应当善于有节制地享乐，在住宅、家具、服装、饮食等都应十分俭朴。为了说明节制享乐的必要性马布利对禁欲主义作了理论论证。他说有两种不同的幸福观：一种是把虚构的幸福即丰富的物质享受看作人生的幸福，这是错误的幸福观；另一种是把自然界替人们安排的幸福即有节制的朴素生活看作人生的幸福，这是正确的幸福观。按照这种幸福观，马布利要求人们到最艰难的困苦中，而不要到银行或出售舶来品的商店中去寻找幸福。艰难困苦的贫穷生活所以是幸福的，就在于这种生活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消除虚荣和贪婪。正由于贫穷生活具有这种净化道德的作用，安贫乐道的人将会得到各国的尊敬。

其四是禁止经营商业，认为商人见利忘义没有祖国，经商是败坏道德的重要原因。

马布利关于改造社会的立法主张，表明其世界观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带有平均主义和极端禁欲主义色彩。这些立法只是逐步接近最终目的最初步骤，而他的最终目的则是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

三、巴贝夫与平等共和国

（一）巴贝夫的生平

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60—1797），18世纪法国革命家，平等派运动的领袖，空想共产主义者。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改用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的名字。

巴贝夫，1760年9月23日出生在法国毕卡迪省圣康坦城的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童年时跟父亲读过一点书，15岁起独立谋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文书和地政机关档案室的地契档案管理员。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巴贝夫逐渐萌发了对剥削制度的愤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为了寻找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他阅读了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名著作。《自然法典》一书是他最喜爱的著作。

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形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中。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巴贝夫闻讯后赶到巴黎，投入群众的革命斗争。10月返回故乡，积极领导毕卡迪省的群众运动，于次年5月第一次被捕。出狱以后，他为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奋起斗争，曾被群众推举为索姆州行政长官。1793年起，他因遭受政治陷害避居巴黎，在这个革命的中心城市经历了法国革命中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雅各宾专政时期。1794年7月，雅各宾专政被反革命政变所颠覆，开始了热月党人的反革命统治。巴贝夫积极投入了反对热月党人的斗争，于1795年2月第二次被捕。1795年10月，巴贝夫获释。此时正值督政府开始统治时期，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巴贝夫趁机开展宣传鼓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推翻剥削制度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1796年3月，巴贝夫和他的战友成立平等派密谋组织准备武装起义。5月10日由于叛徒告密，巴贝夫不幸再次被捕，5月28日在刑场光荣牺牲。平等派运动宣告失败。

（二）巴贝夫的思想内容

巴贝夫没有系统阐述自己学说的代表著作。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部分散见于他给友人的书信、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在敌人法庭上的辩护词，以及平等派密谋组织制订的文献。

1. 巴贝夫的社会历史观

巴贝夫没有象启蒙运动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具体论述过私有制的起源问题，但是明确认为，最初的人类社会是自然而然地处于和平状态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后来由于自然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和平状态进到破坏，属于全人类的整个财产完全落到了少数人手里。可以看出，巴贝夫显然承袭了摩莱里的历史观点，认为私有制社会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公有制社会遭到破坏以后出现的违反自然状态的社会。

2.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由于巴贝夫主要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时期即资产阶级开始取代封建贵族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时期形成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因此，他不再象摩莱里那样只是批判一般的私有制社会，而是把主要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私有制社会。

首先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掠夺行径。18 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法国以至欧洲各国历史的发展，但是它终究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的革命。因此，它并没有象启蒙学者所预言的那样把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化为普遍的幸福。相反，随着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法国社会中的贫富对立甚至更趋尖锐，而且愈来愈表现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巴贝夫愤怒揭露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在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上存在着“极不均等”的现象。他说，占全国人口 90% 的无数劳动者，一切东西虽然都是他们手里出来的，却是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而那些四体不勤的少数人却什么东西都不短缺。他还严厉斥责少数资产者“自己不劳动，只靠大多数别人的血汗和劳动来生活，他们蔑视和奴役唯一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民群

众，他们永远要购买群众的体力、智力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要让他们饿死。”①

其次他指明了资本主义的危害性。他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以及它的危害性，指出：“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还要冒找不到顾客的危险。竞争会糟蹋大量原料，这些原料原是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的，但在加工制作后成为毫无用处的废料。”② 他甚至使用了“生产过剩”的概念，把“找不到顾客的危险”更确切地称为生产过剩的危险。在18世纪末的法国，他就这样明白地叙述竞争、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以及物质财富的浪费之间的联系，充分表现了他不平凡的洞察力。但他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但是并不了解这种剥削内涵。他认为这种剥削是投机商人在产品疏通过程中抬高物价的结果或者说是商业欺诈的产物，是这种欺诈行为造成了生活必需品的不平等分配而使广大劳动者陷于穷困。

再次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巴贝夫驳斥了资产阶级散布的所谓法国在革命以后只有一个等级的谎言，明确指出了革命以后的法国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集团。他说，一个是由“上层一百万人”即富人、剥削者和压迫者组成的集团，另一个是由“下层两千四百万人”即穷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组成的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关于国家的观念上．在关于国家未来面貌的方案上都是极端对立的。一个集团想使法兰西共和国成为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共和国，另一个集团则想使这个共和国成为人民的共和国；一个集团想使少数特权者和贵族老爷坐享丰衣美食的生活，而让大多数人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另一个集团则想让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享受一切社会权利。巴贝夫愤怒地斥责富人集团中的剥削者是一批比封建暴君“更不人道更为凶残的家

① 《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6—77页。

② 《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5页。

伙”，斥责法兰西共和国是讨好和支持剥削者的专制暴政，他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在他看来，即使是法国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它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原则也不过是骗人的幻影。

巴贝夫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只能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能限于对某些社会弊病的揭露，但是他的这种批判无疑是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思想资料。

3. 对未来新型社会制度的勾划

其一，新型社会是平等自由的。正如平等派这个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巴贝夫认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是自己的最终目的。在他看来，革命后的法国所以仍然是一个罪恶丛生的社会，那是因为富人们曲解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真正自由和平等的理性社会应当是没有剥削和没有贫富对立的社会，也就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把这样的社会称为未来的新型社会，这个新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国民公社，这个社会的国家是实行真正民主政体的人民的共和国。

其二，新型社会实行财产公有。他说，人既然是绝对平等的，就不应该独自占有任何东西，而应该能够共同支配一切。他设计的未来社会完全消灭了财产私有制度，从土地到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了公有财产。这样，在这个社会中也就消灭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消灭了高踞于别人之上的暴君和投机诈骗的商人。针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巴贝夫明确提出公有制社会应当“为广大群众谋得尽可能大的幸福”，应当把“全体人民的福利”作为自己的目标。鉴于法国的资产阶级立法由于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实际内容而使自由、平等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强调指出未来社会中的宪法对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直接用物质资源加以保证”。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要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宗旨贯彻于生产之中，使全部社会生产都具

有以为大家庭的利益来进行”的目的性。巴贝夫这些关于要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作为未来社会的社会目标和生产目的的论述，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仅有的卓越见解。

其三，新型社会实行计划经济。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生产的危害，巴贝夫阐述了未来社会的计划经济思想。这种思想在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但是在巴贝夫的学说中才得到较为具体和明确的叙述。他指出，“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社会将按照当前的需要和可能的人口增长，要妥贴地安排每个生产部门和每个人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并且迅速地供应任何地方的一切真正的需要。为了计划经济的顺利进行，巴贝夫在他的未来社会中还设立了相应的管理和调节机构。

其四是新型社会使用机器的必要性。在18世纪末以至在19世纪初期，由于工人群众对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能加以正确区别，曾经发生过破坏机器的自发运动。巴贝夫比同时代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已经开始了解到机器这一新的生产工具对于社会生产的重要作用，了解到机器的使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具有不同的后果。他说，在未来社会中，机器的使用不会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产生不幸的后果，不会引起灾难性的失业，不会有人会因此挨饿”。相反，机器的使用将使人们减少劳苦和节约时间用来休息。但是，巴贝夫对机器使用的意义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巴贝夫只看到机器的使用可以减轻劳动和节约时间，而没有看到它将引起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正因为如此，尽管巴贝夫提到了机器的使用，但他的未来社会却是保持着和现社会同样的生产面貌的社会。不仅如此，巴贝夫和他的战友甚至设想大城市将趋于消亡，整个新社会都将变成农村。

总的说来，巴贝夫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很少探讨生产方面的问题，他所着重考虑的是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巴贝夫的未来社会中，每个

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社会则对所有成员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他认为，“福利必须让大家普遍享受，必须均等分配”，给每个公民分配“社会总产品中同等的一份”，实现“各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巴贝夫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可以说是16世纪以来空想学说中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顶点。但巴贝夫虽然把平均主义思想推到了顶点，却不再宣扬由马布利发展到极端的禁欲主义思想。他虽然说过原始社会是人人过着愉快幸福生活的自然状态的社会，但是他并不主张再过那种原始社会的生活，而是主张在未来社会中把现代社会生活的舒适同自然纯朴生活的优点极好地结合起来。然而，巴贝夫既然倡导绝对平均主义，也就不能克服禁欲主义。因为那种只能对生产力造成破坏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禁欲主义。

4. 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新型社会

巴贝夫不仅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而且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根据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了必须通过革命的道路实现没有剥削和没有压迫的新型社会的任务，阐述了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的思想。

首先是人民革命的思想。巴贝夫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革命。在热月政变以前革命是向前迈进的，但是后来倒退成了一场富人的革命。因此，对于新统治者和新剥削者来说革命已经完成，对于人民来说革命并未完成。他号召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它成为人民的革命。巴贝夫关于“富人的革命”和“人民的革命”这两种范畴的革命的区分，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关于“富人的革命”，巴贝夫也称之“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革命”；关于“人民的革命”，巴贝夫也称之“为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确保人民世世代代幸福和真正人民统治的革命”。这就是平等派试图实现的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革命。他指出，由于少数人霸占一切社会财富而使广大群众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财产关系的变革乃是不可避免的，那时穷

人奋起革命反对富人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他认为只有这样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其次是用暴力革命变革社会。巴贝夫认为财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他称颂法国革命中巴黎的人民起义是崇高而伟大的行动，强调说明了在人民革命中实行群众起义的必要性。他深信人民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伟大力量，认为只要把群众动员起来，“私有制这个万恶的制度的根不是不能剥开予以铲除的”。

再次是人民专政的思想。巴贝夫还在雅各宾专政历史经验的启发下形成了人民专政的思想。他赞扬雅各宾专政时的“专制政府制度是极好的”。认为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民必须坚决地表现出当家作主的意志和自己的全部威力，实行人民专政的制度，以保证人民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根据巴贝夫的这一思想，平等派密谋组织在它的有关文献中制定了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和镇压敌人反抗的一系列法令，规划了逐步消灭私有制度和建立公有制度的过渡措施。巴贝夫强调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仅要消灭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罪恶现象，而且要铲除使它复活的根源，“否则就要冒一切都得从头来过的危险。”

巴贝夫是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由于他仍然生活在没有大工业和由此产生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仍然明显地带有小生产者的思想烙印和平均共产主义的特点。另，由于他开始看到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使他能够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其中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思想是巴贝夫学说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继承了闵采尔的暴力革命思想和马布利关于人民有权发动革命和内战来推翻暴君的观点，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这些思想在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第三节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期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法国刚刚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状况的产物。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法国建立起来和工业革命正在英国迅猛发展。法国的启蒙学者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将是普遍幸福的理性社会。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是劳动者更加穷困。正当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加速了它的发展进程。工业革命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然而带来的是劳动者受到更惨重的削剥和日益失去生活的保障。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不同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一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是这一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已突破了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限制，摒弃了前辈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三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比前辈空想社会主义者丰富得多的含有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因素的许多深刻见解。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6页。

一、圣西门与实业制度

（一）圣西门的生平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19世纪初期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圣西门1760年10月17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著名的启蒙学者达朗贝尔曾是他的老师。在达朗贝尔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对宗教迷信持批判态度，并且怀有献身伟大事业的抱负。13岁时他拒绝去教堂参加第一次圣餐仪式，而只有参加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15岁时他要求他的仆人每天用这样的话来唤起早床："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正等着您！"17岁按贵族传统他应征入伍。1779年，他以志愿军少尉身份奔赴北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战争中立功并被华盛顿授予辛辛那提勋章，那是当时共和国的最高奖赏。在那时他就为自己规定了"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的奋斗目的。[①]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他返回国内，放弃伯爵爵位投入革命。由于反对暴力革命他最终退出革命，从事金融活动。但他"追求财富，只是把它看作一项建立巨大的实业机构创办完善的科学学派的手段"。

法国资产阶级建立了政治统治以后，新的社会矛盾重新唤起了圣西门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的热情。1797年，他放弃经商活动，决心为人类的理智开辟新的里程。圣西门认为这首先要从科学研究入手作好必要的准备。因此，他在1799年到1802年先后到巴黎工业大学和医科大学听课，向学者名流求教，又去英国、瑞士和德国旅行考察。这一时期对自然科学的勤奋学习和刻苦研究，对于圣西门的哲学思想以至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

①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终于使他成为当时象黑格尔那样博学的人。圣西门在进行了几年科学研究后开始著书立说。1802年他写成并于次年自费出版《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8年发表《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初步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时他已经由于科学研究和出国旅行而耗尽了全部资财，不得不白天到当铺当缮写员，晚上从事写作。1810年后的几年中，他更是一贫如洗靠变卖衣物度日。但是贫困、劳累和疾病都未曾稍微动摇他为人类探索通向幸福社会的道路的坚强意志。此后10年中，他又写成了《人类科学概论》、《论万有引力》、《给一个美国人的信》、《论财产和法制》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成熟的社会主义著作完成于19世纪20年代。1821年，他出版了《论实业制度》，系统阐述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和以理想社会代替现存社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1823—1824年出版的《实业家问答》一书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论实业制度》的基本思想。1825年，圣西门出版了他最后的也是代表作的《新基督教》。马克思认为圣西门在他的这一著作中直接以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宣告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825年5月19日，圣西门与世长辞。

圣西门是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思想家。恩格斯说："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①] 他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二）圣西门的思想内容

1. 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

圣西门的哲学思想是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在自然观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继承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0页。

法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理性论。圣西门在其社会历史观的阐述中，提出了不少包含着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萌芽思想的深刻见解。

其一，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人类历史犹如不断发展的数列："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① 在他看来，在这些前后发生的各项数列即前后出现的各个历史阶段之间，存在着因果的联系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对已往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的研究，预见人类历史的未来。

其二是他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人类"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和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目前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之后将是实业制度的社会。

其三，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上升的过程，并指出每一历史阶段的更替都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他充分肯定了以奴隶制度代替原始社会的进步意义，指出由于人们在奴隶制社会中不再象在原始社会中那样杀害俘虏，"拯救了数十亿人的生命"；由于奴隶制使统治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发展智力的工作，"促进了教化的进展"。针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把封建社会看作历史的倒退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了封建社会大大推进了人类的文明。他坚决反对"今不如昔"的悲观论调，认为应当树立振奋人心的思想。

此外，至西门还明确宣布"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② 恩格斯对圣西门的这一论断给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不但包含着关

①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页。

②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9页。

于经济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的思想萌芽，而且明白地表达了“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①

圣西门在他的社会历史观的阐述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宝贵见解，表明他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2.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一是认为资本主义是新式奴役制度。圣西门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对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它依旧是少数人奴役大多数人的不合理的社会。他说，法国革命本来应当为人类建立自由的制度，但是“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他认为这种新形式的奴役制度是这样的一种“金字塔结构”：盘踞在最上几层的是少数游手好闲者，被压在最低层的是广大劳动者。

二是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对于被压在社会低层的劳动者，特别是对“人数最多的最穷苦阶级”，圣西门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指出，“穷人没有工作”，工人“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农民的劳动收益很少”，他们的物质生活十分悲惨，而他们精神方面的状况还要悲惨。圣西门对少数游手好闲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他们不仅残暴掠夺穷人，大量贪污国税，而且腐化堕落庸碌无能。他说，法国如果失去3000名科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这些“法国社会之花”，这个民族便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相反，法国如果死去3万名王公、贵族、主教、元帅等这些游手好闲者，不会对社会带来任何损害。但是，法国的现状却到处是没有才能的人治理有才能的人，是道德败坏的人支配善良的公民。这表明“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

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特征的揭露。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占着支配地位的社会："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① 利己主义驱使新旧贵族千方百计恢复和获得特权和财富，驱使少数人贪得无厌地吞噬别人的劳动果实，驱使统治者发动掠夺他国的侵略战争。利己主义是社会分裂和瓦解的祸根，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3.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关于实业制度的论述，是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最主要部分。所谓实业制度，就是圣西门所设想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就是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黄金时代。实业制度中有两种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前者由实业家组成，掌握行政、生产和财政等"世俗权力"；后者由学者组成，掌握科学、文化和教育等"精神权力"。这里的实业家就是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在圣西门看来，实业家和学者是民族的真正骨干，只有他们才有领导和统治的能力。圣西门曾说他的实业制度是一座"人民金字塔"，实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即工人和农民是它的基础，实业阶级中的少数人即实业家和学者居于这个金字塔的上几层。

圣西门还创立了一种"新基督教"作为"实业制度"存在的基础，认为它将作为实业制度下每一个人的信仰、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基督教的最高道德原则"人人应当兄弟相待"，而"新基督教"的最高道德原则则是"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圣西门试图通过宗教的组织和道德力量，使穷人和富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平地结合起来，实现其理想的未来社会。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有以下特点：

---

①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6页。

（1）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实业制度把“满足人们的需要”、“为民族造福”规定为唯一而长远的目的，把“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看作满足人们需要和造福民族的手段，这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思想，也是全部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仅有的精辟思路。从这一思想出发。圣西门预言，在实业制度下“国家的繁荣昌盛将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发展，人们将会享有只有人的本性才敢想望的各种个人幸福和公共幸福。”①

为了实现满足人们需要和造福民族这一目的，圣西门认为必须建立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财产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要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而不象目前的政治制度那样只有利于社会成员中的一个阶级。他还更明确地指出：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

（2）计划生产的原则。圣西门提出了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应由社会机关主持，生产不再由各个企业主指挥。也就是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把富有的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吸引到实业制度中来。他认为保留私人企业主的最大益处就是可以利用私人利益的引诱力去推动开凿运河、铺设道路和架设桥梁的一切活动。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与马克思的计划生产是不同的，后者是完全消灭了私人企业主和私有制，而圣西门的计划生产是指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使各个实业家的活动服从于统一的计划，并把它们纳入一定的轨道，以满足人数最多和最贫穷阶级在物质上、精神上的需要。圣西门认为，这种条件下的协作制既有利于私人企业主，也有利于劳苦大众，也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从而促使科学、艺术和实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

---

① 《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0—71页。

(3) 反对特权坚持平等的原则。圣西门主张在家庭出身方面实行尽可能大的权利平等的原则，并把真正能力的优势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因此，他提出打破传统的政治世袭权，反对特权及因出身而得到的权利，实行择优任用原则，让在科学、实业、艺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去管理国家大事，而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如何。

(4) 关于分配的原则。圣西门认为个人收入应与才能贡献成正比，这一思想是对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平均主义的否定；包含着按劳分配的思想萌芽。圣西门把企业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与工人农民一样都看作是劳动者、并进而认为社会在对消费资料进行分配时，除了按劳动、能力、贡献外，还应考虑个人所占资本的数额，这实际上承认个人获得劳动收人之外并获得利润的合理性，事实上保留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按资分配，这与后来马克思的废除剥削，个人收入实行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同的。

(5) 人人劳动的原则。圣西门认为有益的活动是一切美德之本，而游手好闲则是万恶之母。他把实业活动看作是使社会得到幸福的主要手段，他指出：只有人们满足了自己的身心需要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唯一的和多少比较直接的目的，就在于满足这种需要。一切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劳动，都属于这三个部门，而且也只能属于它们。由此他强调“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最有益的劳动应当最受尊重”。

(6) 民主选举的原则。圣西门认为掌握管理权力的人都应当由选举产生，都应当成为为公众利益服务和为社会所信赖的人，甚至认为这些人除了得到公众的尊重以外不应得到其他报酬。总之，未来社会的领导者应当是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造福，特别是为人数最多的最贫穷的阶级谋利的人。这就是说，掌握管理权力的实业家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他说，直到目

前，人类两个不平等的部分由于经常以绝大部分力量进行统治和反对统治的冲突，浪费了力量。实业制度消灭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而联合起来去共同影响自然界，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成了社会组织的主要职能。这就是说，实业制度的社会是废除了国家的社会。

(7) 一切人都应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原则。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所实行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改进所有成员的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处境，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的主要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地建立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统治是不同的。圣西门认为一旦这一原则得以贯彻，那么，广大劳动阶级，将智力发达、热爱劳动，法律就应当承认保护他们的社会权利，政府就不必耗费大批的经费以维持人数众多的常备军、警察等一系列官僚军事机构，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和作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权力由对人的统治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社会生产的领导，人们不再无益地浪资一点力量，而是联合起来共同影响自然界，这种条件下的社会必然走向繁荣，政治学的目的不再是研究统治人、统治秩序，而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其目的就在于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的科学。

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是文明民族一直向往的目标，是即将出现的“文明的王国”。他深信这一文明王国可以通过宣传而和平地建立起来。他曾向国王和资产者一再陈述实业制度的优越性，呼吁他们帮助建立这种理想社会。在圣西门逝世以后，他的学生在某些问题上发展了圣西门的观点。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张，还提出了“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新公式。

二、傅立叶与和谐制度

(一) 傅立叶的生平

沙利·傅立叶 (1772—1837)，19 世纪初和圣西门齐名的法国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傅立叶，1772年4月7日出生在法国贝臧松的一个富商家庭，早年丧父，中学毕业后就从事商业。他当过商业雇员、推销员和经纪人，到过里昂、巴黎、卢昂、马赛和德国、荷兰、英国等许多地方经办商务。30余年的经商生涯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有较深的了解，对资本主义商业中的投机欺诈等种种罪恶现象尤为熟悉。傅立叶从一个商人到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发生的。革命以后日益显露的新的社会矛盾，使他感到新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令人极度失望的社会。他认为，这种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证明那些曾为法国革命提供过哲学理论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找到一条能够医治社会疾病的正确道路。这就要求人们开辟一条造福人类的新道路，发现能够指明这条道路的新科学。傅立叶认为发现和创立这种直到目前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的新科学是他莫大的光荣任务。

早在学生时代，傅立叶就爱好自然科学、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和文学艺术。他爱好数学的精确性、科学的幻想性、音乐的表现力和讽刺诗的幽默感。参加工作后尤其在立志创立新科学以后，他更是勤奋攻读古今名著，尤其是伏尔泰、卢梭等法国启蒙学者的重要著作。他很注重调查研究，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各种社会现象。经过长期的刻苦研究和探索，他终于发现和创立了他所说的新科学，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曾说傅立叶在1799年就奠定了他的理论基础。1803年，他发表重要论文《全世界和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理想制度所代替。1808年，他发表重要著作《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简称《四种运动论》），阐明了他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叙述了关于未来社会的见解。1822年，他出版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亦称《宇宙统一论》），此书除包括《四种运动论》的主要内容外，着重描述了未来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1829年发表的《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

（简称《新世界》），是傅立叶全面系统和通俗地阐述自己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成文于1837年并在后来作为遗作发表的《论商业》一稿，是一篇批判资本主义商业的杰作。

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傅立叶40年如一日地坚持研究和著述。1832年，他还在法国进行了建立未来社会组织"法郎吉"的试验。傅立叶的赤诚打动了一位法国众议员议员、富翁博德·杜拉利，他把自己的土地拨出一块，进行傅立叶的"协作移民区"试验。该试验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预定资本为120万法郎，可是实际上只募到48股，计有31万8000法郎。利用这些资金建立了一个农场，吸收了150名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和组织不健全，同年该试验就夭折了。他期待社会上层支持他实施建立新社会的计划，刊登广告宣布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自愿帮助他创办法郎吉的富人，但是数年之间无一人问津。晚年，曾和学生们创办《法郎斯特尔》杂志和《法郎吉》杂志宣传其学说。傅立叶以卓越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学说。1837年10月10日，病逝于巴黎。

（二）傅立叶的思想观点

1. 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

同圣西门一样，他认为永恒的人类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研究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理性。他自命自己是第一个发现了这种理性从而使"三千年来的幻想和愚蠢化为乌有"的天才。这种唯心主义的理性论和天才论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是一种空想的理论。但他的社会历史观中含有甚至比圣西门更为丰富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

其一，宇宙运动四种论。傅立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所提供的材料，认为整个宇宙运动可以分为社会运动、动物运动、有机运动和物质运动。"引力规律"是这4种运动的共同规律，"情欲引力规律"是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他说，社会运动是4种运动中最主要的运动，其他3种运动都是它的"象形文字"。

因此，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即情欲引力规律也就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情欲引力是一种来自人类本性的永恒的东西，人们一旦认识了情欲引力规律，也就找到了通向幸福社会的道路。可以看出，这种情欲引力的理论就是傅立叶用以论证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理性论。这种唯心主义的理性论当然不能揭示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但是，傅立叶在这些论述中认为社会运动是一切形式的运动中最高级的运动，认为社会运动有其特殊的规律，却是值得肯定的卓越见解。

其二，社会运动四段论。在对社会运动过程的描述中，傅立叶充分显示了他不平凡的辩证思想。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过程可分为童年、成长、衰退和没落这四个阶段。其中，童年阶段占5000年，包括7个时期；成长阶段和衰退阶段各占3.5万年，各含9个时期；没落阶段占5000年，包括7个时期。在这4个阶段中，前2个阶段是波动上升的两个阶段，后2个阶段是波动下降的两个阶段。在经历了这8万年的4个阶段以后，人类便和动植物一起宣告自己的终结。他还把这种辩证发展的观点用于各个历史时期，认为32个时期中的每一时期也都可分为童年、成长、衰退和没落时期，也都有其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并且都有前一时期的残余和后一时期的萌芽。傅立叶对于他所说的32个时期没有逐一加以说明，只是对其中前8个时期，即童年阶段的7个时期和成长阶段的第一时期作了具体的论述。他把这8个时期依次称作原始时期、蒙昧时期、宗法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其中的文明制度就是人类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文明制度又划分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以“商业科学”为特征的阶段以及形成商业封建主义的阶段。后两个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文明制度已经处在下降发展的阶段，必将为更高的历史阶段所代替。

其三，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在傅立叶看来，男女两性关系的性质是每个历史时期比生产更为重要的特征。他认为，原始时

期的主要特征是男女的自由结合。在蒙昧时期，由于家庭经济的出现，妇女降到了从属地位。宗法制度使妇女处于半奴隶状态。野蛮时期的妇女就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文明制度下，侮辱妇女仍是这个制度的本质特征。在未来社会中，由于家庭失去了经济单位的性质，妇女将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从而使两性的相互爱慕真正成为婚姻关系的基础。傅立叶的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学说中又一珍贵的思想，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赞扬和肯定。恩格斯指出：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①

2.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是傅立叶学说中最为出色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恩格斯在 1845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评，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是傅立叶对现存社会的全部批判中的最精彩部分，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达到了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能相比的水平。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有四：

（1）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反社会的工业制度。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时期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强调指出，文明制度虽然有种种生产的功绩，但它没有为人类创造幸福而是给人类带来千万种祸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每个人都在拼命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幸福建立于别人的痛苦之上。他讽刺说，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发大火使城市的 1/4 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人希望下一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11—412 页。

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甚至法院也有自己的打算：为了维护和增加刑事法庭的经费和法院人员的收入，法国每年就得发生多加审理12万件犯罪案件和违法行为。灾难的渊薮来源于分散经营的经济制度，正是这种制度造成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制度是反对社会大众的个人所有制的暴政。

(2) 资本主义制度是巧妙掠夺劳动者的社会制度。通过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的考察，傅立叶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制度。他说：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一种巧妙地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富人和穷人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划分。他以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为例，指出工人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6小时，所得的收入却难以糊口，而工厂主还要竭力缩减工人的工资，使工人的生活日益贫困。傅立叶敏锐地观察到劳动者的贫困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长的，并且深刻指出，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

(3) 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经济危机。他认为，文明制度虽然创造了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这一制度下的分散经营却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这样，文明制度就使自己处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恶性循环之中，就为自己制造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在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以后，傅立叶第一个提出了这是“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恩格斯对傅立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一论断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一论断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

(4) 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罪恶。傅立叶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对资本主义商业中的罪恶了如指掌。他列举了当时商业中诸如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贩卖黑奴等等36种罪恶，又把每种罪恶列为多种形式，其中有的罪恶形式也多达36种。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采用囤积居奇或故意毁坏一部分社会产

品以便减少社会产品提高社会产品的价格。为了个人私利，不惜生产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来坑害消费者。傅立叶挖苦道，在巴黎既找不到没有掺着甜菜的糖块，更找不到一杯纯牛奶和一杯纯白酒。傅立叶痛斥黑奴买卖的罪恶。他说贩卖黑奴的商人往往当黑奴快要死时，就把他们当作不合格产品处理，在黑奴还有气息的时候就活活地抛入大海中。此外，文明制度中普遍存在着寄生现象。文明制度中只有1/3的社会成员是真正从事生产劳动，其余2/3的人都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者。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是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批判中也有重大的缺陷。他没有指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错误地认为文明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分配制度问题。但傅立叶明确宣布：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

3.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是按照他的情欲引力理论构思出来的社会制度。按照他的设想，这将是人类情欲的自然引力能够不容阻碍地发挥作用，人类情欲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的社会。

（1）和谐制度是人类情欲共同作用的结果。傅立叶把人的情欲分为3大类、12种。第一类是5种物质的感觉情欲，即和人的5种感官相适应的情欲。第二类是属于精神方面的4种依恋情欲，即友谊、爱情、爱虚荣和爱家庭，这4种情欲推动人们去组成集团。第三类是属于精致的和复杂的精神方面的3种分配情欲，即竞赛情欲、多样化情欲和创造情欲，这是趋向社会统一的最高的情欲。和谐制度就是人类固有的永恒不变的这3类情欲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在这些情欲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实现了和谐结合的社会。这种和谐社会，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文明制度所创造的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实行与文明制度的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协作结构的完善的统一。傅立叶认为，分散经营的文明制度不能立即跨入这种和谐

社会，而是要先后经过实行半合作结构的保障制度和实行简单协作结构的协作制度，才能进入实行复杂协作结构的和谐社会。

(2) 和谐制度的基层社会组织叫法郎吉。“法郎吉”来源于希腊语“队伍”一词，是指严整的步兵队伍的意思。傅立叶用它表示和谐制度下有组织的生产，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法郎吉是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这7种劳动在内的综合性生产消费协作组织。在法郎吉内部，设有许多称为“谢利叶”的专业劳动队，其下又分若干小组。傅立叶认为法郎吉应当包容所有不同性格的人，以便每种工作都能由性格适宜的人去做。他说人的性格共有810种。为了使每种性格的人各有一个副职，法郎吉的理想规模应是1620人。这些成员全部居住在一个叫做“法伦斯泰尔”的宏伟的建筑群里。法郎吉按自愿原则组成，凡自愿以资金入股者都可参加。傅立叶还认为，农业生产是最诱人的生产，应当在法郎吉的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工业生产的时间不能超过全部生产时间的1/4，否则就会破坏引力的平衡。此外，为了使任何一个居民都不把工业生产作为主要活动，和谐社会中的工业生产将不象现在这样都集中在穷人麇集的城市中，而将遍布全球乡村和法郎吉中。可以看出，傅立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将不再存在城乡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3) 在和谐制度里劳动成为人们的爱好。对和谐社会中的劳动问题傅立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劳动是每个人天生的爱好。但是在文明制度下，由于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情欲都受到了压抑，劳动成了痛苦的事情。在和谐制度下，由于人的各种情欲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劳动就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真正成了人们的爱好，成了一种享受。傅立叶还提出了劳动权的思想，指出劳动权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傅立叶还对劳动竞赛作了论证。他认为在人类固有的竞赛情欲的吸引下，以及在这种情欲和其它情欲的共同作用下，和谐社会中的各类社会成员、各个生产组织之间将广泛而持久地开展热烈的劳动竞赛。和谐社会还将

消灭分工。他认为文明制度中那种使劳动者终身束缚在一种职业上的旧式分工不符合人的多样化情欲，因此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将不复存在。在法郎吉中，劳动者可以自由变换工种，一天内可以先后参加几种以至30种工作。法郎吉中各种符合人类情欲的制度的建立和人们劳动热情的空前高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和谐社会中，人们将削平山头排干沼泽，把沙漠变成良田，让运河纵横大地。社会产品将比文明制度增长3倍、10倍以至100倍，人们的收入也将增加3倍以至50倍。

(4) 和谐制度实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在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上，傅立叶对平均主义作了彻底的否定，认为在和谐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他用按比例分配来代替平均主义原则。傅立叶的按比例分配，就是按劳动占5/12、资本占4/12、才能占3/12这样的比例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制度使资产者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一般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在生活上也处于比一般劳动者远为优越的地位。

(5) 和谐制度中的社会政治生活。政治上，国家政权已不复存在，“法郎吉”内设立的领导机关称作权威评判会，它由“法郎吉”属下的根据不同种类劳动划分的组织的领导者构成，其中也包括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资本家以及德高望重的人。权威评判会不能颁布任何章程和规则，不能发布命令，不能干预分配。它的职能更多的是咨询性的，评判委员会对“法郎吉”的计划等进行评判并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供其参考。社会生活中，家庭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妇女完全从旧式家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与男子平等地参加各种劳动。社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事业，如公共食堂、育婴堂等。和谐社会对儿童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重视人们的科学教育，这是繁荣文化科学事业，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途径。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方案，是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内容最为充实和思想最为丰富的理想方案之一。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

张，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在以情欲理论为基础的傅立叶学说中，禁欲主义完全失去了立足余地。傅立叶认为凡是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各种情欲都是健康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这些情欲得到满足。他指责马布利等关于“贫穷就是幸福”的说教是对人性的歪曲，认为和谐社会中的人们应当享受比文明制度中的显贵富人更为富裕的生活。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也有自己的一批拥护者，他们在傅立叶生前就开始宣传傅立叶学说，并在宣传中发展和加深了傅立叶的某些观点。但是总的说来并无重大建树。

三、欧文与公社制度

（一）欧文的生平

罗伯特·欧文（1771—1858），19世纪初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1771年5月14日出生于英国蒙哥马利郡纽塘镇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读完初级小学9岁就开始独立谋生。在此后10年中，他先后在纽塘、斯坦福、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地的商店中当学徒和雇员。在艰苦的雇员生活中，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1789年，他与人合办一个有40人的小厂，不久又自办小厂。1791年，这位才能出众的20岁青年受聘担任一个有500名工人的大纺纱厂的管理工作。

1793年，欧文参加了当地的“文学哲学协会”，逐步形成了通过改造环境来改造人的性格的理论。他开始在上述工厂中开始试行改造理论并获得成效。为了扩大这种试验，4年后他又与人合伙开办由几个工厂组成的“查尔顿公司”自任经理。1799年他从曼彻斯特来到苏格兰，1800年1月1日起成为有2000名工人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并在这个工厂中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改造环境和人的性格的试验。这个工厂中的工人原来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工资微薄。欧文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减到

10.5小时并提高工资，同时大力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他特别关心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他们开设学校创立最早的幼儿园。经过他对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一系列改造，新拉纳克大棉纺厂成了人口增加到2500人的完善的模范移民区，酗酒、诉讼、警察、贫困救济等在这里全部绝迹。欧文的这种试验还为企业增加了资产，也为企业的股东们带来了大量利润。这一切成就使他赢得了下层社会的尊敬，博得了上层社会的赞许，使他成了名闻全欧的慈善家。

但是，欧文对他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感到满足。1824年起，欧文和他的一些学生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新和谐公社”的试验。[①] 他斥巨资在印第安纳州购买了30000英亩的土地，创建新和谐公社。公社吸纳了1000多名社员，公社实行财产公有自给自足。公社社员必须“诚实”、“勤奋”、“追求知识”，培养智、德、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是公社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儿童义务教育，社员享受公费医疗。公社创办有学校、幼儿园、农场、果园、工厂、商店提供社员一切必需品。公社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行理事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它管理公社的所有工作。下设农业部、工业机械部、文学、科学和教育部、经济部和商业部，分别负责管理生产、产品分配以及文化教育工作。起初，公社一派生机，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这种情况仅有两年就发生了变化，公社内部暴露出许多矛盾如信仰问题、管理体制问题等，每次纷争都引起了一部分人退社。而对四分五裂的公社，欧文只好于1828年宣布解散公社，欧文为此几乎耗尽全部财产。1829年他从美洲回国。1832年在英国又创办了“劳动产品交换市场”，目的是为了体现“公平的劳动原则”，避免商品经济下生产者可能遭受的损失，帮助人们避免商品经济下因竞争产生的失业。劳动者将生产的产品拿到交换市场来，市场专门的估价人员

① 《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4页。

按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加原料价格确定产品价格，发给劳动者与其产品价格相适应的“劳动券”，他们凭“劳动券”在市场上换取其所需要的物品，“劳动券”只限于内部通用。这种帮助工人生活的制度在开办之初取得很大成功，英国许多工业城市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交换市场，如在伯明翰、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但是，随着劳动产品交换市场的发展，内部的矛盾日趋严重。人们拿到“劳动券”后争相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市场上出现了两种物品：一种是抢购的畅销品，一种是无人光顾的滞销品。一些人手中的“劳动券”无法兑现物品，“劳动券”开始贬值，一些劳动者不肯将自己的产品再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劳动券”。劳动产品交换市场，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对拿来产品的劳动者付一半现金，付一半“劳动券”，把滞销货拿到劳动市场之外的市场去变卖，再用现金将脱销货买来。劳动市场的管理费用来自通过“劳动券”进行的产品交易，而这种市场之外的交易增加了经济负担，严重威胁了市场的生存。劳动产品市场办了3年，就关了门。虽然如此，欧文的这一实践还是受到马克思极大的重视，马克思提出的用“劳动券”取代货币这一思想多少受了欧文的启发。在这一时期，他还积极领导了英国工会运动，主持了1833年的英国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总工会的主席。1839年到1845年间，他和他的学生又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名为协和大厦的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再告失败。欧文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直到1858年87岁临终前不久，他还发表演讲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晚年著书立说。

欧文一生发表许多演讲写过不少文章，也写过比较系统地阐述自己理论的著作。他在1813年发表的《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一书中，阐述了关于人类性格形成的理论，在1817年的《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中，提出了包含着共产主义思想萌芽的关于劳动公社的思想。在1820年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

在从1836年起分篇发表的《新道德世界书》、1839年的《罗伯特·欧文论婚姻、宗教和私有财产》，特别是在1849年发表的《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著作中，他进一步系统化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

（二）欧文的思想观点

1. 欧文的社会历史观

欧文没有象圣西门和傅立叶那样系统地阐述过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进程，只是粗略地提出过关于历史发展的零星看法。

一是关于私有制的产生。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最初的渔猎时代经过游牧时代而进入犁耕时代的。前两个时代，是人人享有自然权利的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到了犁耕时代，人们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谁在土地上耕作劳动，谁就应当占有他耕作的土地。这样就产生了私有制，就使人为权利代替了自然权利，人类社会也就进入了没有理性的时期。但是在欧文看来，这种没有理性的私有制社会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他认为，由于他发现了关于人的性格的形成这个“不论在什么时代、对什么人以及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适用”的永恒真理，人类即将进入文明幸福的理性社会。总之，欧文一方面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二是人的性格是由环境所决定的。欧文关于人的性格形成的理论，是对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爱尔维修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著名论点的继承和发挥。恩格斯指出：“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①] 欧文所说的人的性格，是指人的德、智、体这三个方面的状况。所谓先天组织，是指人在母胎中形成的官能或天赋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2页。

力。他所说的人在自己一生中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主要是指社会环境。欧文认为，各人的天生官能或天赋能力是不完全相同的，这种不同的官能或天赋能力会产生各人不同的才能和各人对外界事物的不同感情。但是，他又认为各人的天生官能或天赋才能的差别是不大的，所以人的性格主要是由他出生以后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特别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得出了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恶的环境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善的环境，从而把社会成员都“变成善良、有用、聪明、知足的人”的革命结论。

2.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欧文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从道义上谴责资本主义。欧文是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引出社会主义结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817 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欧文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 1820 年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他认为既然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那末劳动者就应占有由他们创造的全部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恰好同李嘉图的理论相反：创造了很少价值或完全没有创造价值的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创造了很多价值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欧文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没有根据理性原则作出适当的安排，是由于出现了万恶的金钱，以及在采用货币以后在流通领域里发生了不道德的贱买贵卖。而如果人们能够按照理性原则思考和行动，摆脱金钱对自己头脑的统治，“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将不复存在，每个人都能公平地取其所得，并且对其他一切人都将公平行事。”[①] 欧文不是把资本主义的剥削看作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

① 《欧文选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9 页。

有，而是把它看作在流通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以及由于不等价交换而造成的不公平分配。

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他说，由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机器本可以成为人类最大的福星，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却成了人类最大的祸害。这种祸害就是大量的工人被机器所排挤和大量的女工和童工受到繁重劳动的折磨，就是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工资的下降，就是劳动者陷入贫困的深渊。欧文指出，这种祸害的根源在于“主人掌握了权力和资本”，而拥有资本的“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占有工人在机器生产中创造的果实发财致富。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富有与贫穷、豪华奢侈与忍辱受苦这样“两种极端现象的反常结合”。和傅立叶一样，欧文主办的《危机》杂志也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看作“生产过程所引起”的危机。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和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欧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看来，私有制、宗教和现行的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位一体的祸害”。他指出：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根源，它使人产生利己主义，使富人变成“衣冠禽兽”，它引起专横和虚荣，产生仇视和战争。欧文对一切传统宗教也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在他看来，人们所以实行反自然的社会制度，就是由于受了宗教的荒诞观念的影响。因此，为了使人类树立理性思想，就应该废除僧侣制度，销毁神学著作。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欧文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各国现存的政府都是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压迫和掠夺生产阶级的机构，任何一种政体都没有为人民创造过幸福，而现存的法律都是强者欺负弱者的工具。

再次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欧文认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对现存制度进行极其彻底的社会改造。他满怀信心地

指出,一系列的征兆已经表明,实现社会改造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他说,一百年来所造成的新生产力保证人们有可能象取水那样容易地生产财富,以满足人类的一切合理需要。这是改造社会的时代即将到来的特别重要的标志。象欧文这样明确地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看作新生产力本身的要求,看作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在他看来,对现存社会实行彻底改造的时刻所以即将到来,理性社会的实现所以"胜利在望",是因为关于人的性格形成的伟大真理已被找到,是因为已经有一批有健全思想的人开始认识到必须消灭在无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存社会。

欧文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耐心的教育逐步实现改革。他认为,通过对各国政府的说服,由它们来开始实行和平过渡,是最合理的方式;为了实行合理的平等制度又不引起紊乱,必须依靠为数不多的成功地领导和管理过大企业的人士;为了顺利和迅速地实现改革,劳动和资本应当联合起来。

3. 欧文的公社制度

欧文从他的关于人的性格形成的理论出发,并且针对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设计了他认为能够培养人的优良性格的未来理想社会"公社"。公社(或称新村、协作社或联合家庭)是未来理想社会中的基层组织。它是一个由2000人左右到3000人组成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公社的特点如下:

(1) 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公社这一理想社会中,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欧文指出:财产公有制较之于引起灾祸的财产私有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财产公有制实现了人们之间利益的一致,从而将"促进人们为普遍幸福这一神圣的目的而每天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财产公有制使人们可能在生产中联合起来,从而将使人们在时间、劳动和"资本"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将使人们的生产活动提高效

率。在财产公有制度下，人类面前还将展现出发明和科学发现的新可能性，而且其数目要超过迄今存在的数百万倍。总之，在欧文看来，财产公有制度的建立将促进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从而将使人们可以在每天不到4小时的有益而愉快的劳动条件下，拥有丰裕的质地优良的产品。在欧文的劳动公社里，取消了特权、贫富差别、阶级、剥削和压迫，这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的社会制度。

（2）公社是农商学结合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单位。劳动公社里已经取消了城乡差别，公社设施完备，拥有各种文化设施和幼儿园、食堂、医院等。欧文形象地描绘了劳动公社的布局，说公社由500—3000人组成，占地800—1500英亩。公社的建筑布局呈四边形结构，中间为建筑物，四周是花园，花园外围是农场、工厂。欧文甚至还在技术上勾画出平面图和鸟瞰图。在劳动公社里，人们义务劳动，实行计划生产，公社社员为获得全面发展，既要从事农业劳动，也要从事工业劳动，还要进行科学研究。这样，公社旧消除了城乡对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谋取个人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不复存在。

（3）公社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公社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行个人消费品的按需分配。欧文认为劳动公社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广泛采用工业大机器和技术发明，家务劳动也为机器所代替，在科技成果的基础上，人们根据科学原理组织社会，并以合乎平等和正义的原则管理社会，人们就有可能在每天不到4小时的有益而愉快的劳动条件下，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由于货币已取消，一切人可以无忧无虑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就不会产生私有观念或超过自己的需要而积累财富的现象。

（4）公社的管理机关属于全体社员大会，它也是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员大会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废除了国家机器如军

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公社的日常事务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的公社理事会和专业委员会来管理和领导。欧文还根据人的不同年龄段分别论述了不同年龄组的社会职责，他认为根据年龄段划分为8组，1—3组主要是指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他们属于生长发育和学文化科学知识阶段。15—20岁的人是公社的主要劳动力，同时负责前3组的学习指导。20—25岁的人既是劳动者，又是各个部门的管理者。25—30岁的人主要负责保管和分配社会财富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30—40岁的人负责整个公社的管理工作和维护和平秩序。40—60岁的人负责公社的对外事务，保持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往。60岁以上的人负责保卫公社的宪法和组织制度。

(5) 公社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公社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使公社成员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并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欧文主张教育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实行德智体全面发展，以此培养诚实、勤劳、正直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新人，建立新的道德风尚。欧文还要求人们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此外，由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实现了普遍的平等，男女的结合不再会有人为的障碍，旧社会的不平等婚姻和与之相连的一切罪恶现象都将绝迹。那时人们除了纯洁的爱慕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作为结合的动机，因此两性的婚姻将普遍成为白首之盟。

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欧文把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方案看作绝对真理的体现，深信它将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因此，他断言他的公社制度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普及英国，普及欧洲，普及全世界。欧文在世时也有一批学生。他们积极宣传和实践老师的思想，并且在某些方面对欧文的观点有所发挥。但是，他们未能超过老师的水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后退。19世纪30、40年代，欧文主义者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投入了宪章运动，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反动的宗派。

第二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社会主义历经300余年空想阶段的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时期。

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到大机器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充分暴露。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无产阶级具备了科学的世界观，掌握了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从此，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由自发斗争进入自觉斗争阶段，开创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因此，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包含有空想成份，从而又导致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差距。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奋斗历程

1. 马克思的生平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马克思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犹太人律师家庭，先后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学法律。1841 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842 年为《莱茵报》主编，投身于政治斗争。1843 年迁居巴黎，同德、法工人团体领导人建立联系，1844 年初与卢格共同出版《德法年鉴》。在该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表明他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1844 年 8 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从此开始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共同战斗。1845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马克思被逐出法国，迁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6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在工人中反对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1847 年发表《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主义。同年参加并领导了共产主义同盟，受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草拟纲领，即 1848 年 2 月 24 日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它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1848 年 8 月 11 日马克思在巴黎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848—1849 年欧洲革命期间，同恩格斯一起回德国参加并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科伦创办并主编《新莱茵报》。欧洲革命失败后，1849 年被逐出普鲁士，先到巴黎后又被逐，尔后定居伦敦。为总结 1848 年革命经验，他先后写了《1848 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及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不断革命等理论。1867 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把社会主义学说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1864 年 9 月第一国际建立。马克思起草了成立宣言、共同规章，成为它的实际领导者，曾先后当选为临时委员会委员、常务委

员、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活动期间，与恩格斯一起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斗争，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1875年写《哥达纲领批判》，除对拉萨尔主义清算外，还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原理，进行阐述。70到80年代初以主要精力写《资本论》第二、三卷。贫困的物质生活，紧张的理论活动，繁重的实际工作，严重地损耗了马克思的健康，1883年3月14日，65岁时与世长辞。葬于伦敦海格特公墓。

2. 恩格斯的生平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亲密战友。

恩格斯生于普鲁士巴门市纺织资本家家庭。中学还没毕业，就被其父逼迫经商。1841年去柏林服兵役同时到柏林大学听哲学课，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小组。1842年写了《谢林和启示》一文，批判了谢林的反动神秘主义。1842年9月服役期满去英国曼彻斯特经商，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同宪章派活动家来往。1844年3月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由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

1844年8月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见，从此开始了终生的并肩战斗。1845年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能争取自身最终解放。1845年他与马克思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1846年恩格斯与马克恩一起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同马克思一

起加入并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同盟起草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后改为与马克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 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回国创办了《新莱茵报》，并亲自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经瑞士前往伦敦。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论著，总结 1848 年革命经验，对城市武装起义做了重要论述。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帮助，1850 年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直到 1870 年移居伦敦。在此期间，他研究军事学、语言学，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它报刊发表文章，支持意大利、爱尔兰、波兰、美国、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参加了国际领导工作，并与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斗争。在 1877 年至 1878 年写了《反杜林论》，第一次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特别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有精辟的论述。1879 年他同马克思合写《通告信》，批判德国党内的苏黎世三人团。70 年代初至 1883 年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逝世后辑成《自然辩证法》一书）。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了整理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1889 年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阐明了阶级、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89 年恩格斯亲自指导建立第二国际，同“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1891 年初经过斗争，他公开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3 月发表了《法兰西内战》导言，6 月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批驳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谬论。1894 年写《法德农民问题》，批评了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晚年在给各国工人活动家的书信中对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指点。因患喉癌，1895 年 8 月 5 日恩格斯 75 岁时逝世于伦敦，遵照遗嘱骨灰撒入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大海中。

二、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程，也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

1. 共产主义同盟的建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2—1848）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于1842年在德国创办莱茵报因得罪当局而被驱逐出国，来到法国创办《德法年鉴》，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逐出境，于是与爱妻燕妮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侨居。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次年改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任务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共产主义政党。当时欧洲各国出现了不少秘密或半公开的工人革命团体。其中，有巴黎的正义者同盟，虽小却最富于国际性，它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性的团体。它成立于1836年，是一群遭受德国反动政府迫害而流亡西欧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聚首巴黎而建的。该组织的宗旨是实现财产公有制，口号是“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同盟建立之际，受主要领导人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魏特林反对私有制主张公有制，但在实践上主张搞集体食堂、交换银行之类的试验，在策略上依靠流氓无产者，在革命道路上主张少数人密谋行动24小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受其思想影响，同盟参加了1839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四季社”的暴动。起义失败后，同盟的另一些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以伦敦为基地壮大组织，使盟员由清一色的的德国人发展到有十多个西欧国家参加的当时唯一的国际性工人组织。马、恩看准了同盟的有利条件，决心对同盟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改造，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组织。首先是战胜了魏特林主义。马、恩多次与其面谈或写信，希望他接受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魏特林不但不听反而蓄意挑起争端，最后马、恩不得不与他决裂。其次是战胜了蒲鲁东的

改良主义。蒲鲁东是改良主义者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一生摇摆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他幻想建立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并说这种社会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共产主义的“不自由”。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作了《哲学的贫困》，批驳了蒲鲁东的谬论，肃清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再次是战胜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克利盖、格律恩，他们是蒲鲁东的信徒，主张用超阶级的性爱和人道主义来代替阶级斗争，其思想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恩合写了《反克利盖的通告》，恩格斯还与格律恩分子展开面对面斗争。思想上三个回合的胜利，驱除了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对同盟的影响，从而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后，改组同盟的时机成熟了。1847 年 6 月 2 日至 9 日，来自英、德、法等国“正义者同盟”支部的代表汇集伦敦，举行同盟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同盟进行改组。为表达共产主义这一的伟大奋斗目标，与会者一致同意马、恩的提议，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共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取代原来的旧口号。大会通过了恩格斯与沃尔弗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章程》规定共盟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建立公有制社会，规定共盟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共盟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诞生，这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共盟约有 400 个党员，主要是德国人，还有英、法、比、荷、瑞典、瑞士、美国 7 国人士参加，并在欧美 8 国建立了地方组织。

同年底共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党纲问题，大会决定委托党的思想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正式的党纲公诸于世。大会结束后，马、恩一连 4 天深居简出，商议党纲的主要内容和观点。1848 年 2 月 24 日《共产党宣言》首先用德文在伦敦公开出版，这一划时代的光辉文件，既是国际共运的纲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袖珍百科全书。这本约 2.5 万字的小册

子具有无限永恒的魅力，它博大精深流光溢彩。它解释了当时欧美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种种弊端，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科学真理和美妙光辉的社会理想。

《宣言》是国际共运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被喻为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和国际共运的正式开始。

2. 第一国际的建立与巴黎公社革命（1848—1871）

共盟建立、《宣言》发表后，迎来了1848年欧洲革命。在法国二月革命与德国三月革命中，400多名盟员参加了革命，马、恩一起回德国参加并指导人民进行革命。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一度回国后又赴法国，最后又被反动政府驱逐出巴黎，于是与燕妮举家迁往英国，开始了常达30多年定居异邦的流亡生涯。

欧洲1848年革命打击了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50年代工人运动低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无产阶级队伍也趋壮大。60年代初，共运重新高涨。于是在1864—1872年间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次大发展；建立了第一个带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政权——巴黎公社。

60年代初期各国工人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俄压迫的民族起义促成了第一国际的建立。1864年9月，在伦敦有英、法、比、意等国2000多名工人代表集会声援波兰，大会同意法国工人的倡议，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第一国际，马克思抱病写下《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后国际所发表的一切文件，几乎全部出自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建立了民主制的组织原则。第一国际在欧美16个国家建立有联合会组织，包括成员约40万人。第一国际存在的1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参与了国际的领导工作，同形形色色的

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76年第一国际宣布解散。第一国际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国际主义原则的最初组织形式。第一国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支援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尤其是为支持巴黎公社革命作了大量工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进行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1870年7月，法国为缓和国内政治危机及与普鲁士争夺欧洲霸权而对普鲁士宣战，被普鲁士反攻入法国，法国被迫割省让和。此时，法国国内出现两派对立的意见，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会主战，以政府军为代表的国防政府主降。主降派于1871年3月18日偷袭主战派的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趁机起义并占领政府大楼。3月28日举行公社成立的盛典，选出委员64名，公社下设10个委员会，并颁布了法令。为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公社确立了两项意义重大的规定：一是对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和撤换制，不称职者人民随时可以罢免；二是所有公职人员都不享有任何特权，其工资最高不得超过熟练工人。选举罢免和取消高薪，这是铲除官僚特权阶层的两个有效办法。恩格斯晚年指出：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了上述“两个可靠的办法”，这使得它能够成为“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①] 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于5月30日发表了《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马克思对公社的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指明：“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②] 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是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早的雏形，是19世纪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8—59、81页。

共运的最高成就。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又陷入低潮，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较为和平发展的时期。

3. 欧美建党高潮与第二国际的诞生（1872—1895）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美工人运动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期。随着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欧美工人运动经过10多年沉寂之后，到80年代中后期又活跃起来。欧美许多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纷纷建立了工人政党。这时建立的工人政党都称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虽然在科学上很不确切，但“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①] 1869年建立的第一个工人政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后建立的有1874年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的葡萄牙社会党，1876年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劳动人民党，1878年的捷克—斯拉夫人社会民主工党和墨西哥社会党，1879年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法国工人党，1881年的荷兰社会民主同盟，1882年的意大利工人党，1884年的英国社会民主同盟，1885年的比利时工人党，1887年的挪威工人党，1888年的瑞士社会党，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

在70—80年代，马克思主要忙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同时与恩格斯展开对第一国际后期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首先是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反对党、反对斗争、反对一切权威，提出13无：无政府、无政党、无军队、无资本家、无领导、无社会、无法律、无监狱、无父母、无婚姻制度、无家长等。马、恩发表《论权威》等著作，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各个方面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予以坚决批驳，迫使巴枯宁不得不公开声明退出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在德国开展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拉萨尔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任主席，鼓吹改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77页。

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在经济纲领上主张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变成企业主，在政治纲领上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来建立“自由国家”。以爱森纳赫派为主体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放弃原则与以拉萨尔派为主体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合并。马克思于1875年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进行清算。随后，马、恩协同作战批判杜林的修正主义思潮。杜林是柏林大学哲学、经济学讲师，自诩为社会主义的行家。他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三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提出“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的口号。由于马克思忙于《资本论》的写作，批判杜林最终任务落到恩格斯身上。恩格斯于1877至1878年用2年时间写成反杜林论，批驳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30年的发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继而批判德国党内的左右倾思潮。70年代末德国发生了两次刺杀德皇事件，为此反动政府实行禁止工人党活动的“非常法”。反动政府的淫威吓坏了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出现了赫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的“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主张取消党的最终目标，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恩挺身而出挽救党挽救工人运动。年已六旬的马克思不顾病魔缠身挥动如椽之笔揭露“三人团”投降主义本质。与此同时，德国党内还出现了以莫斯特为代表的“左”倾无政府主义集团，该集团主张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合法斗争。马、恩通过信函来批驳左倾盲动主义，号召德国工人党适应“非常法”新形势采取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指引德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德国工运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斗志，工人运动的再度高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正在此时，马克思于1883年因病逝世，领导重任落在了恩格斯身上。

19世纪80年代中期，各国工运重新高涨，各国工人政党纷纷成立，呼吁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恩格斯一边忙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一边忙于第二国际的建立。1889年7

月14日，来自22个国家的393代表欢聚一堂庆贺第二国际的诞生，并把每年的“五一”定为国际劳动节。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参加第二国际的约有30个社会主义政党，党员数量约300多万人。新的工人国际始终未有正式名称，偶尔称为”社会民主国际”，或者笼统地称作“国际社会民主党”。到1907年才自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是较为松散的国际组织，它不曾发表过成立宣言或共同纲领，主要是通过几年一次的国际代表大会就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议，作为各国党行动的依据。后于1923年解散。

90年代，德国实施了12年“非常法”宣布解除，新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用“糖饼政策”代替“皮鞭政策”，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一次引起了德国党内的思想混乱，出现了新的左右倾思潮。以恩斯特为首的“青年派”鼓吹“左”的策略观点，反对党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恩格斯严肃批评了“青年派”的错误，指出他们的策略会葬送党的事业。与此同时，恩格斯开展了对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拉萨尔主义的继续，他们主张放弃暴力手段，在议会中争取选票和席位，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于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15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写作《法兰西内战·导言》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三颗“炸弹”沉重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捍卫了国际共运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正当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之际，1895年恩格斯逝世了。此后，俄国的列宁继续领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一、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只能在资本主义大

工业充分发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在前人提供的科学文化基础上产生出来。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

1.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

19世纪4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在英国，产业革命接近完成，机器生产已经逐步取代了手工业劳动，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837年—1847年10年间，煤的开采量增加了47%，生铁冶炼增加了67%，造船增加了23%。1840年—1850年，蒸汽机的总动力增力了108%。1836年—1848年，铁路的长度增力了2268%。1830年—1849年，外贸出口增加了3倍多。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在法国，产业革命正迅速扩展，工业中已广泛采用了机器生产。1820年—1847年，蒸汽机的数量增力了6466%。1831年—1847年，煤的开采量增加了178%，铁路的长度增加了4900%。在德国，产业革命起步较晚。但在这时大工业生产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工业中，蒸汽机的数量从1830年的625台增加到1847年的4853台，织布机从1835年的600台增加到1844年的12000台，铸铁产量从1818年的2万吨增加到1847年的52万吨，铁路长度从1840年的950公里增加到1850年的6000公里。毗邻法国的莱茵区，此时已成为工业最发达的区域。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其他各国，如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以及远离欧洲的美国，资本主义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社会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1825年，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普遍性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此后，经济危机大约每隔10年左右爆发一次。到1847年又爆发了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使广大劳动

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着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使得人们有可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有可能找出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以上是科学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2.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前提的。产业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随着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形成，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也同时形成了。无产阶级从它诞生时起就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初期，他们还是处在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阶段。在斗争中，无产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他们逐渐认识到，没有政治权力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处境，19 世纪 30—40 年代，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群众性罢工、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特别是法、英、德等国无产阶级几次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法国，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纺织工人两次武装起义，他们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在英国，1836 年至 1848 年出现了持续 12 年之久的人民宪章运动，这是一场工人阶级独立开展的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在德国，1844 年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为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而举行的起义，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发动、直接反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一次起义，具有“论理性和自觉性”，“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上述的工人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创造了无产阶级独立阶级斗争的最初经验，为科学地揭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规律性，奠定了阶级前提和实践基础。同时，斗争屡屡失败的教训又说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要求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以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政治条件。

3.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这是一切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必然规律，19 世纪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首先是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尤其是 19 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学说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准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家在社会历史观上总的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从而不能指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找不到改造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在革命的力量上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找不到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但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方位揭批却提供了启发无产阶级觉悟的思想材料，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测和积极主张则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社会轮廓。马、恩从社会主义前辈那里得到很多启迪，如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消灭三大差别等等未来社会的主要原则和根本特征，最终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构筑。

其次是对人文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的继承。产生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材料和论据，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构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石。产生于 17 世纪下半叶完成于 19 世纪初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马克思吸取了他们的劳动价值理论构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基石。

再次是对 19 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许多重大成果的吸收。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水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某些成就直接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找到了自然科学依据，如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物种可变理论的发现。

总之，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具备了。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

如上所述，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具备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自发地形成。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还需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在参加工人运动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社会主义先驱者的理论成果，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总结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通过亲身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通过各自艰苦的探索和认真的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1844年8月底他俩在巴黎会面，开始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们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块基石；他们共同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块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最终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1. 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哲学基础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他们合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唯物史观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1）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社会变动

的最终原因不应当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活动，而应当到社会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这个原理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现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绝对真理”、“永恒正义”，不是什么理性观念的实现。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理性”和“永恒正义”的根本缺陷，使社会主义摆脱了空想的性质从而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2)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动力。生产力包含劳动者、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科学技术三要素。其中劳动者是第一要素，因为没有人，则没有后二要素。而科学技术在三要素中则占重要地位，因为，劳动工具的改进是由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的劳动者运用改进的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才能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才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这就使社会主义摆脱空想的臆想而筑基于科学的现实之上。

(3)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这个原理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发现它能实现生产力的革命，所以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是进步的合理的，同时它的基本矛盾又是自身不能解决的。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为它自身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了物质前提。这就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人们的主观臆造，从而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4)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原理出发，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才能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人民群众中最杰出的阶层，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创立者。这样社会主义就摆脱了“救世主”，找到了实现它的社会力量。

(5) 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从这个原理出发，就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那种试图通过典型示范和富人的帮助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社会主义就摆脱了依靠“有产者”恩赐的幻想，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

2. 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分析过程中，从哲学领域的研究很快转入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1)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过猛烈抨击，但由于忽视经济问题的分析，因而不能揭露其本质，“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剥削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是雇佣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创造出比劳动力本身价值大得多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这部分价值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学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剖析科学地说明了，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一部分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空想社会主义只能咒骂资本主义，却不能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因而不可能从经济角度说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剩余价值学说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公道”、“平等”的虚伪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

(2)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通过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则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

级斗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不剥削无产阶级就不能生存，无产阶级不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不能解放。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奠定了基础。

(3) 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在剩余价值归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社会制度下，工人阶级不可能富裕起来，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拥有资本的富人手里，他们操纵着国家机器统治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是资产阶级，而其天然的敌人就是工人阶级。这种经济的对立也表现为政治的对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从而消除剩余价值的私人所有，消除整个雇佣劳动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同情无产阶级，但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剩余价值学说则科学地指出，一方面无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而被剥削，确实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另一方面，它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肩负着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4)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主观地想把资本主义抛弃，剩余价值学说则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危机周期爆发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真正限制是资本主义本身，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就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5) 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阐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提供了依据。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主要靠天才预测，因而不可避免陷入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科学预测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总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基石，从而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系列缺陷，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1）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原理。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贯穿《宣言》始终的基本思想，《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一小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和压迫别人，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丧失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受剥削和压迫。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就必然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这种矛盾和斗争有它的一系列发展阶段。这就是：在奴隶社会彼此对立的阶级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在封建社会则是“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阶级斗争各有特色，但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社会制度的更替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宣言》通过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析，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

阶级同归于尽。”阶级斗争之所以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因为，决定社会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是自发解决的，而是通过反映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来解决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斗争的结局也与先前各个历史时期根本不同。《宣言》提出一个著名的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斗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其结局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2) 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宣言》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 当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新的生产力发展时，资产阶级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这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是雇用劳动，雇用劳动完全是建立于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但是，工业进步却使工人阶级日益由分散状态走向联合和团结。资本正在铸造着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因此，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3）关于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原理。

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联系大机器工业，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和阶级特性，从而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第一，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和先进的经济形式——大机器工业相联系的阶级，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有极强的战斗力，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第二，无产阶级是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的阶级。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制财产的一切。他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第三，无产阶级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代表，这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它只有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它才能够代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团结和领导他们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4）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宣言》在总结人类社会全部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特别是国际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一同产生、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这种斗争起初是自发的，尔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斗争发展到了自觉斗争的阶段。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运用一切武器，特别是国家政权来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面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无产阶级仅靠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达到自己的

目的。因此，“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当时，虽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而是表述为：“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应当说已经相当明确的了。《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①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向共产正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只有“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利就失去政治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消亡。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根本方式。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把资产阶级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实现阶级和国家的消亡。

（5）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宣言》从理论上阐明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 它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部队，“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的结果”，是“各国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①] 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把共产党人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共产党必须支持一切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同时在这种联合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能领导无产阶级未实现历史使命而斗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根本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公开的纲领文件，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是一部划时代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曾被翻译成一二百种语言，出版过一千次以上。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许多传世名著，但没有哪一篇能够像它这样牵动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心魄。这不仅是因为它那磅礴气势和犀利笔锋所具有的强大的震撼力，更根本的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如此切中要害，具有如此深刻的科学性，因而就使它能够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像恩格斯所说的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为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成为全世界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语。他们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们做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些预测，其主要点是：

（1）生产高度社会化、生产力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仅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而且将为新社会的诞生创造物质条件。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历史上其它社会形态一样，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具体说明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他曾概括地指出，只有在直接形式的劳动已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而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活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思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断言，在未来的新社会里，生产力将获得迅速发展。社会将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中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并保证他们的智力也能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

（2）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占有的公有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社会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或者把它称作“财产公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除直接使用“公有制”以外，还使用过“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一词。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把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有制并不是基于某种平等观念而设想的社会制度，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是

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经济关系。他们所设想的“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是要“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消灭了贫富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①

财产公有制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个基础是“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另一个基础是“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这些原理就是指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②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从而根本改变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结成了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共同以主人的身份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共同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它为社会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表现。

（3）社会将按照预定计划自觉地组织生产，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取消商品和货币。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未来的社会里既然生产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不存在任何团体或私人的占有形式，因此，实行计划经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调节所代替。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拟订计划用以调节生产，就可以消除失业、危机和避免劳动力的大量浪费，从而促使生产力迅速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因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既然社会可以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安排生产，不存在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既然社会成员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劳动者不需要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来取得社会的承认。因此，劳动者之间虽然仍需交换劳动，但已不需要采取交换劳动产品这样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货币就成了多余的了。

（4）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

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圣西门认为，个人的收入应当同他们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论及，但讲得最详细的则是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尽管没有使用“按劳分配”这个词语，而是用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来表述，其含义则是一样的。马克思指出，由于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带着资本主义的痕迹，而在分配方面通行的仍然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于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即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以每个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作为分配尺度，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剩余产品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形成社会公共积累，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个人消费品的主要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是对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起着积极的作用。按劳分配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每个劳动者都有平等的劳动权力和劳动义务，都按照劳动这个共同的尺度领取个人消费品。这种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与贡献大小结合起来和建立社会公共积累的分配制度，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使之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最终实现按需分配创造条件。

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形式虽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们的道德和精神境界极大地改变，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按需分配才真正符合人的本性，他认为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实现按需分配，劳动就不再是民众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社会成员的一种习惯、需要、乐趣和自觉行动。

(5) 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也随之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在于消灭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废除私有以实行了公有制，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人人都是劳动者。因此，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

差别。

此外，“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①] 也即是说，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或者说具有政治职能的“政治国家”也就不再需要了。但是，“非政治国家”还将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所谓国家消亡也就是指镇压职能的消亡，而不是指管理职能的消亡。国家将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强制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才会完全消亡。

(6)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由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存在，由于受阶级关系制约的不合理分工的存在，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甚至被扭曲。只有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不合理分工，人才有可能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这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 年恩格斯在给意大利人卡内帕的信中，认为上述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未来社会的发展完善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全体成员将获得全面发展。未来的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②]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未来社会里，生产的社会管理要一种全新的人，而且它能够造就出这种新人来。但是，这种新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73 页。

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历史过程。全面发展的新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现世界。共产主义不仅是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高度精神文明的基础上。

三、正确认识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差距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为前提，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推论出来的。而当今世界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是不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或非常落后。此外，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包含有空想的成份。从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非常大的差距。

（1）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政权后，实行的是联盟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民主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专政是广大人民群众以社会主人的身份对那些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实施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确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人翁地位和参政议政、共同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由过去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被统治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一种形式，他同样也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2）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事实上，至今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如在中国现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还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等等的存在和发展。即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3) 马克思、恩格斯预测，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和剥削，实行按劳分配。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如在中国现阶段则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4)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不再存在商品经济了。实际上，商品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以这种商品经济形式为依托。

(5) 马克思、恩格斯预测，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就会变成非政治国家。但是，至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政治国家。并且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外部原因，首先是由于内部原因。

上述矛盾或差距的出现，症结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不同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空想成份所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产生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都是从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度中脱胎而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具有其本身的特色。例如中国，既然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所当然要坚持公有制。但是，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而且发展又极不平衡，因此就必须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又如，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当然要实行按劳分配。但同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相适应，就得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还允许非劳动收入的存在。如果各国不从各国的实际出发，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就不能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就谈不上逐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现实

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这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科学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预测未来社会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严格的科学态度。他们一再声明：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了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思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分析而做出的推论，不是现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其个别论断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预测未来社会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今天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决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折射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

第三章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这一时代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并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随后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形成了过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尔后，苏联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领导。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苏东的解体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诞生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同为20世纪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最为震撼的历史事件。

第一节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

一、列宁的奋斗历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1870—1924）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学说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他创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它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朋友。

列宁1870年俄历4月10日（公历22日）出生于伏尔加河岸的辛比尔斯克城（现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的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进步观点的中学教师，后晋升为省国民教育总监，并曾获得贵族称号。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她勤奋好学，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品德教育。

列宁从5岁就开始学习文化，9岁进入辛比尔斯克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品学兼优曾获得金质奖章。列宁很敬爱他的哥哥并受到他哥哥的影响，因而很早就萌生了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满。1887年列宁的哥哥因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杀害。列宁从血的教训中增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决心，并坚定地说："我们不走这条路"。17岁的列宁在探索着一条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新的道路。1887年6月底列宁全家迁居喀山，秋天他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入学不久，他因反对大学里的警察制度而被开除，并被禁止在喀山居住。一年后列宁回到喀山，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资本论》。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在萨马拉城列宁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8月，列宁移居彼得堡（现列宁格勒城）。从此，揭开了他革命生涯中的新篇章。

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者。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列宁为建设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1895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并命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斗争协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它只活动了不长一段时间，以列宁为首的一批骨干就被逮捕了。列宁先是被监禁，后被流放西伯利亚。1898年3月初列宁还在流放地时，俄国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

会，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以列宁为首的流放者集会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事实上一大并没有把党真正建立起来，在委员会中经济派占据了优势。一大后，组织上更加涣散、政治上更加动摇、思想上更加混乱，经济派成为建党的主要障碍。1900年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和1901—1902年期间他写的《怎么办?》一书，粉碎了经济主义。1903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在讨论党章时党内产生了尖锐分歧，诞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二大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推行的机会主义组织路线和策略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驱逐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为日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广泛开展，这些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俄国爆发了3次革命。列宁不仅投身于这些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斗争，而且亲自指导革命的发展并在理论上和策略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随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对这次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特点和前途作了深刻的揭示并全面地论证了党的战略和策略。列宁指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这次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又不同于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些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而1905年革命中领导力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是列宁策略路线的核心，列宁认为要实现领导权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11月上旬，列宁从国外回到了彼得堡，以加强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05年

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列宁赞扬了工人们的壮举，并号召彼得堡的工人支援他们。莫斯科工人起义失败后，列宁又及时帮助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鼓舞他们的斗志。1906到1907年列宁仍在国内坚持斗争直到1907年的12月才被迫离开俄国。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于4月3日（公历4月16日）回到了俄国。针对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为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革命和平发展的策略路线。从4月到7月列宁先后写了150多篇文章和几本小册子，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方针，从而武装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七月事变”打破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已经断绝。列宁也被迫转入地下，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继续指导着革命斗争并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为了加强领导，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他起草了由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武装起义的决议，指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领导十月革命获得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变为现实。在这样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新课题。然而建设的步伐刚刚迈开，1918年发生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围攻苏维埃的战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白匪的叛乱，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制定了适合俄国国情和符合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坚信俄国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的领导下，拟定了纲领性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拟定了通过农业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以改造分散的小生产者，并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列宁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把发展文化教育，进行

文化建设视作“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列宁还经常提醒党的组织和干部要充分发挥教师和专家的作用。

列宁极端厌恶个人崇拜。他坚信：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列宁十分谦逊质朴，极端关心党的事业，模范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经常作自我批评，随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向反对突出他个人。他多次拒绝艺术家为他绘制和塑造肖像，也反对人们为他祝寿。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党的地步”。列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不知疲倦长期紧张的政治活动以及社会革命党暗杀造成的创伤，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从 1922 年上半年起身患重病。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与世长辞。

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在俄国诞生

历史进入 20 世纪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也由科学的理论、革命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它是社会主义划时代的伟大胜利，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一）社会主义诞生于俄国

1. 社会主义诞生于俄国的背景

①社会经济客观条件

20 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大力开展。当时俄国已拥有一支约 3 百万人的产业工人大军，他们身受双重压迫，富有革命的彻底性。1900 年发生罢工 550 次，参加罢工的有 86800 多人。在罢工运动中，工人提出了“民主”、“自由”和“打倒沙皇”的口号。1901 年彼得堡奥布哈夫兵工厂发生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反抗沙皇军队的流血冲突。这表明工人运动已从经济罢工

转向政治罢工，无产阶级已经奋起同沙皇政府搏斗。在工人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农民也起来进行革命斗争，1902 年仅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发生的农民暴动就达 340 次。在工农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学生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也加强起来，1901 年至 1902 年初，全国实行了总罢课，参加的学生达 3 万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使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雪上加霜，也使俄国出现了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成熟的革命形势。当时，除军火生产外，工业生产连年下降（1917 年比 1916 年下降 36.4%），造成工业产品严重不足；通货膨胀严重，1917 年商品平均价格比 1913 年上涨 24.8%；农业生产更加落后，生产不景气，造成全国粮食危机。广大人民陷入贫困、饥饿的深渊。在最困难的时候，面包每天的配给量从一磅半减为一磅、半磅、1/4 磅，最后有一个星期根本没有半点面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特别是给参战的俄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俄国有 1400 万青壮年被赶上前线，由于装备落后、短缺（三个人使用一支枪）加上饥饿，战事屡遭惨败。到 1917 年秋季，俄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毁灭性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纷纷起来反抗沙俄的统治。全俄出现了强大的罢工浪潮。农民也燃起了革命烈火，欧洲部分 90%以上的县发生了农民抢粮的斗争。在前线，士兵纷纷赶走反动军官，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士兵委员会。少数民族也掀起了民族解放的斗争。上述表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②列宁与俄国共产党人的主观努力

列宁从 19 世纪末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同俄国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理论上的准备。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践相结合，在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

理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关于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尤其是列宁在1915年第一个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批国家同时取胜的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胜，并且取胜的国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这样的国家恰恰可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这一科学的论断，极大地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动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新飞跃，如果没有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发动和胜利。

其次是组织上的准备。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公开叫嚷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针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态度，第二国际迅速分化为左、中、右三派。第二国际各国党从一个主张社会变革的政党变成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改良主义的党。面对20世纪新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根据列宁的建党思想，在1903年正式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分化成两派，即布尔什维克革命派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到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才形成为统一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一个对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态度，对机会主义持不调和态度的党，是一个团结坚强和组织统一的党，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没有一个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英明领导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2. 社会主义诞生于俄国的历程

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是二月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次是十月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是俄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和阶段。

1917年1月9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2月23日即国际妇女节那天，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工人用政治罢工来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有50个企业的近9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后来，罢工人数增加到20万并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的工人会同起义的沙皇军队，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者，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首都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俄国各地和前线，引发了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行动，至此，封建专制王朝终于覆灭。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临时政府。前者是工农性质的政权，后者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反映了俄国革命正处在一个过渡的不稳定的阶段，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在新的形势下，俄国向何处去，全党缺乏一个明确的方针。列宁在国外给党中央写了5封《远方来信》。提出党的任务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进一步武装工农，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列宁从瑞士回国，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人员会议上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随着两个政权的斗争、冲突的加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由多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他们针对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革命行动，查封布尔什维克的报刊，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员，并强行解除工人武装。布尔什维克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第6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方针。列宁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于1917年10月20日（公历）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迅速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负责起义的政治领导，并于1917年11月7日（公历）取得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当晚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成立。随后短短几个月中，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

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成功的理论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欧亚两洲十几个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上述经济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战略预想，同时证实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经济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新论断；而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实践也表明其历史必然性。

1.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恩“多国胜利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同时取得胜利。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一定要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成功，而当时的英、法、德正是这样的典型国家。与此同时，马、恩还强调三国的同时胜利。“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①] “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②] 这就是马、恩的多国胜利论。马、恩多国同时胜利论的依据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假如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势必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7页。

家的围剿而失败。例如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便是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得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支持而造成的。

到了列宁时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自相矛盾乃至发动世界大战。列宁根据新时代下的新情况而提出新理论——一国胜利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只能首先在经济不很发达、但矛盾尖锐，又具备了一定主观条件的国家取得胜利。列宁这一论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列宁该段话的含义是，经济政治不平衡导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领土，这就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矛盾激发了战争，在战争中相互削弱，造成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从而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一国先胜。与此同时，列宁还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有三：一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不下去了，二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三是各阶层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并表现为革命行动。主观条件是要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突破了马、恩多国胜利论的局限，是在新时代新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与此同时，列宁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了其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俄国社会现实，认为它是欧洲各交战国中受战争影响最大且受害最深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主客观条件皆备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领导俄国人民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理论指导下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成功建设的带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一系列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证明了社会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主义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2. 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如前所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给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创造了客观前提即外部条件。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偏偏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国先胜而在经济落后国家先行成功，则与落后国家的内部条件有关，此即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取胜的历史必然性。

(1) 落后国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加上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破坏，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起来革命就没有别的出路。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政府则往往采用恩威并济的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平息革命运动。

(2) 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和入侵，造成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甚至叛卖性，他们不可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失时机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使之胜利。例如俄国 1917 年的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便是如此。

(3) 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具强烈革命性同时又有农民同盟军的支持，还有各种群众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配合，更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政府有意培育工人贵族阶层，因此这些人在党内推行改良主义路线而不能领导革命胜利。

(4) 落后国家虽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发挥工农政权的革命作用，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

上述原因促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先行建立，这并不违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纵观世界发展历史，后起的不发达的国家先

行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的，因此，带给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三、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俄国社会主义的初步建设

1. 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联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

首先在政治上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各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各人民委员部，人民法院和工人民警，并开始组建红军。为体现工农政权的性质，布尔什维克党选拔输送了大量优秀工人、士兵到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还特地通过法令，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直至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工资每月最高不能超过500卢布，这相当于当时俄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

其次在经济上摧毁资本主义经济，组建社会主义经济。苏维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绝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收归了国家，其中包括银行、铁路、海运、对外贸易。同时，在资本家的私人企业里实施工人监督制，即工人组成监督机关监督企业主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加工、购销以及财务活动。为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还设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全俄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

此外在文化方面，取缔了资产阶级报纸和文化机构，取消地方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贵族学校，建立国家的学校，颁布了扫除文盲的法令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到实处。

2.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苏联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从取消商品经济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恢复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1918年夏，14个帝国主义国家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国内哥萨克白匪趁机叛乱，颠覆了3/4的政权，包围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切断中心城市与燃料、产粮区的联系，苏维埃政权在危急之中。为应付战争，苏维埃政府把国内一切工作纳入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国民经济完全服从战争的需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一是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后，对中小企业也全部收归国有，同时推行中央集权的管理总局制，由52个总局来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二是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粮食贸易，规定余粮收集制，收集农民全部剩余粮食来供给军队和工人；三是在经济关系上以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每个居民入编消费公社，发给生活必需品，以物易物成为经济关系的主要方式，货币作用削减，银行功能衰退，还在1920年初宣布取消银行并实行遍及一切阶级的义务劳动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是余粮收集制，政府机关先确定农民生活所需的粮食，然后按国家固定价格向农民征购全部余粮。征购过程中按阶级原则区别对待，富农最多、中农次之、贫农一般不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苏维埃政权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平息国内叛乱的胜利。到1920年春，国内战争基本结束。

②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战争结束后，苏联仍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认为可以趁势消灭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1920年粮食总产量从43亿普特减为22亿普特，只及战前1913年的一半，牲畜头数减少40%。1920年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6/7。燃料、粮食极端缺乏，工厂停工，铁路运行车辆减少，轻工业品严重不足，社会动荡不安。这种严重情况固然同战争破坏有关，但同布尔什维克当时实行的直接向不要商品货币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也是分不开的。面对困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措施。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较长时期并存，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得到增长和巩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市场和商业，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经济联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具体措施有三：一是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行处理；二是将雇工在20人以下的小企业退还原主并对国内外资本家实行租借制和租让制；三是在国营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列宁称此为“退却”，退向国家资本主义，其根本目的是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就获得显著成效。农民生产热情被调动起来了，农业形势迅速好转。列宁这样说到：“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满意他们目前的境况，这一点我们是有把握肯定的。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①]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成功，可以说又一次挽救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政策转变的成功也影响了国家的体制，同时也对列宁及苏维埃政府中的共产党员产生了不少的震动。列宁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企图绕过商品货币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苏联这一时期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二）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列宁尊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并从实践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4页。

再认识。他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认识。列宁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了"。[①] 他在最后几年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宝贵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认为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客观估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列宁在 1921 年 10 月 17 日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的任务》的讲话中有这样一个标题："我们的错误"。他说：当国内战争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按照余粮收集制会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但是"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②] 列宁这里是讲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时期。1918 年初列宁还说过：在欧洲发动革命是无比困难的，而在俄国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③] 他认为俄国的特点使得向社会主义过渡更加复杂，这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认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

(2)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特别强调解决经济任务不同于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如果还是按照老办法只靠热情、靠英勇精神解决经济任务，必然要犯错误。列宁多次指出：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46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182—18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294 页。

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劳动纪律，采用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要使劳动者从个人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实施奖金制度；还必须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团结和利用科学家、技术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等。

（3）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想不通过商品交换实行直接的产品分配。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行不通的。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就是用商品交换代替产品分配。在实践中，列宁一步一步感到商品货币交换的重要性。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说：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所以，“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①] 不过，这时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观点，还只是限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至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商品经济的命运如何，当时的社会实践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列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4）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列宁根据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经过长期考虑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的关键是吸引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个体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两重性，对农民不能驱逐也不能镇压，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长期、缓慢、谨慎的组织工作来改造和教育他们。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实行新经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8页。

济政策以来农村合作制发展的经验，写了著名的《论合作制》一文。列宁指出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使俄国居民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巨大的、不可限量的意义。“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① 列宁还规定了合作化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强调实行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依靠实际例子，向农民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从而吸引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合作化必须逐步前进，国家在物质、财政、组织等方面给合作社以大力支持帮助。

(5) 要正确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必须继承、吸收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这个思想列宁一直是明确的。还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就谈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应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站。他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但是比起俄国当时大量存在的小生产状况来说是一个进步。因为这不象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样，而是国家能够控制的经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更明确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如租让制、合作制等，进一步发展生产增加产量，同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列宁还写过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 = 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①]

（6）要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这是列宁一贯的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说过：“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②] 十月革命后，列宁发觉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有一个过程，它只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他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敏锐地谈到俄国民主制度的矛盾。他说：“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③] 这就是说，俄国十月革命前是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小生产占优势，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直接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采取逐步发展的方针。为了解决“飞跃”中的矛盾，列宁在逝世前几年写的几篇重要论文，如《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中，提出了两项划时代的任务：一是改革国家机关，发动群众参与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二是进行文化建设，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同时，列宁还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及晚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思想，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1—292页。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

一、斯大林的奋斗历程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斯大林（原姓朱加施维里）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下同）生于高加索地区梯弗里斯州库拉河畔的哥里镇。父亲是格鲁吉亚人，是当地农民出身的皮鞋匠。母亲是当地一个农奴的女儿，家庭妇女。斯大林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同年入中学读书。1899年6月斯大林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正教中学开除学籍到观象台当观测员。1901年斯大林住所被搜查，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

1901年11月斯大林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1903年3月斯大林缺席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大约在1904年初，斯大林与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婚。斯大林积极参加了南高加索1905年革命。1905年12月出席了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出席党中央举行的会议，第一次会见列宁。1906年4月至5月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07年5月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12年，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从1902年起至1913年的11年中，斯大林曾6次被捕入狱又6次遭流放。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才结束了他最后一次的流放生活。1917年3月25日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和《真理报》编辑部。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斯大林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助列宁组织和领导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11月8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918年与娜佳·阿利卢耶娃结婚。1932年娜佳逝世。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斯大林任共和国革命军委员会委员，在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922年4月3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时起斯大林始终是总书记，而且总书记的职权越来越大。1924年1月24日列宁逝世。在列宁病重和逝世以后，斯大林进行了捍卫列宁主义反对各种不同思潮的斗争，1924年4月至5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5月在党的十三大上作了中央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1924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委员。1925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此时起直到1943年止始终是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宁逝世后，他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

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坚信苏联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1927年12月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并提出了“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作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议。由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展，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30年6月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说，这是“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1931年2月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斯大林提

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在国民经济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内（1933年7月）完成了。1934年1月召开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说，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十七大决定采取第二个五年计划。1935年5月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即在1937年4月完成了。1936年11月，斯大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作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列宁逝世后，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使苏联在12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变为现实。

1939年3月，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提出，“在最近10—15年之内”在经济上，即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从1941年起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领导了1941年至1945年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打败了疯狂的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挽救了欧洲文明，支援了东方人民，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超过战前水平。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总结了苏联3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1953年3月5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3岁。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但是，在苏联取得一系列灿烂的成就和辉煌的胜利的过程中，作为

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而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犯了许多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例如：实行个人专断，党和国家中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摧残，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在肃反问题上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善良的公民，他们被扣上“人民公敌”，“暗害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监禁和杀害。对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倾向，甚至干涉某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出过错误的决定，还怀疑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所谓“铁托式”的胜利等。斯大林的悲剧在于，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仍相信那是在捍卫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看待斯大林，对他的功绩和错误作出恰当的评价。纵观他的一生，他使苏联在短短30年之中由一个用木犁进行小农生产的国家变为拥有核武器的强大国家，他是功勋卓著的国务活动家和苏维埃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但是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却有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他虽然功大于过，但是从长远来看又是功不补患的。由他建立的过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之一。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长达约为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是拥护的，但他没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长远的政策，而是看作临时的措施和暂时的退却。列宁逝世不久，斯大林就采取了向城乡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方针，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代表联共（布）中央在总结报告中向全

党提出了以下任务："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①] 从此开始了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

从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三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国民经济计划化。到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表明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经济实力是美国的1/2，相当于英法的总和。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近30年的时间里，苏联形成了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形成的，因此，我们又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

1. 经济模式方面

首先，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特征。苏联在30年代就形成了9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由国家占有的体制，具体又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所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是仅仅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实现的公有化，其公有化程度低于全民所有制，因而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最终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从1926年开始，苏联就采取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力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到1936年苏联就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强大的工业基础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了物质基础，但是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做法又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例如1923—1927年的工业投资中，轻工业占74%，重工业占26%。但是工业化开始不久，重工业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1918—1933年，农业的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28%，轻工业占10%，重工业占62%。到了1933—1937年，农业占18%，轻工业占19%，重工业占63%，片面发展重工业给日后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再次是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的特征。革命前的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显然不能超越商品经济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所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重新提倡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然而斯大林时期则认为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商品生产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全民所有制企业是非商品生产单位。管理国民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于国家手里，企业完全按照国家的统一号令进行生产经营。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盈利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这种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特点有三：一是过度集中性，即主要的计划指标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集中地制订；二是全面性，即囊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三是强制性，即国家集中地制定出来的计划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后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种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违于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

2. 政治模式方面

首先是国家行政权力凌驾于立法权力之上。在苏联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36年改称最高苏维埃），拥有立法权；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改为部长会议），它对最高苏维埃负责。但是从实践上看，最高苏维埃的实际权力逐渐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却日益扩大，这种状况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利的。其次是苏联共产党独掌政权。苏

联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存在与之合作的政治党派。各级行政机关的干部都是由党输送，形成了党政不分的局面。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党指挥一切包办一切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最高领导人指挥一切包办一切。再加上个人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使得个人专断、一言堂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司空见惯的事情。再次是个人专权。在党内，列宁时期就已形成了党中央或少数党的领导人过多地集中了日常行政权力的体制。到了斯大林时期，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被认为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正常原则而肯定下来。到30年代，国家最高领导的权力更加集中，领导干部实行实际上的终身制。到40年代，斯大林更是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掌党、政、军大权。此外，还有干部特权、对外霸权等特征。

3. 文化管理方面

文化方面苏联也实行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一是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说了算。例如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都由斯大林审核。斯大林还曾多次组织学术批判，把不同的学术观点视为异端加以排斥。二是对各种文艺作品和作家，不论小说、戏剧、音乐、诗歌等，长期以来也是乱加批判无限上纲，甚至迫害作家。三是盛行个人崇拜，把领袖奉若神明；社会科学常常限于讲解、注释经典著述，学者难以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种过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不利于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原因与是非功过

1.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原因

在客观原因方面有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影响深，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等等；在主观方面同斯大林的的社会主义思想分不开。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既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又有教条主义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

的东西，甚至有扭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地方。对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可从如下几点来认识。

（1）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对于俄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对“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斯大林认为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这又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犯了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毛病。

（2）斯大林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思想，领导苏联人民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他又认为商品生产只限于消费资料，价值规律只限于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以及过早地消灭私人经济等，又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犯了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

（3）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领导苏联人民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此同时却又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歪曲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为斯大林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是非功过利弊得失，因此，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2.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是非功过

如上所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斯大林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因此我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作具体分析，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其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使俄国实现了工业化。俄国在斯大林手下建立起了大工业体系，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6000多个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到1936年苏联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到1938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英、德、法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仅次于美

国。苏联仅用了短短的10年的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强大的工业基础，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保卫了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

(2)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利于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使原本就很衰弱的国民经济遭受到更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到1925年国民经济才刚刚复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可以在短期内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从而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巩固了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3)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榜样的力量。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搬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对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初期工农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榜样的作用，从而也就间接推动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然而，利之所在也是弊之所由，这种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随着经济建设由粗放走向集约，它将暴露出更大的弊端。过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1) 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治危机。危机的具体表现是30年代的肃反与大清洗，一大批优秀党的领导人被错误地说成是阶级敌人或者外国代理人而被处决或下狱。联共党的理论家布哈林被开除党籍后又以间谍、叛徒、凶手的罪名被处决。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理论错误主要是：第一，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根源仅仅归结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没有看到国内也还存在阶级斗争和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第二，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规律的概括缺乏科学根据；第三，处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方式一味强调暴力镇压，不经正常的法律程序，一有嫌疑就逮捕、监禁甚至流放、杀头，甚至把党内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丑化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2）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违背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形成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的不合理经济结构，这种的经济结构的主要错误是：第一，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例如，到1953年，重工业比1928年增长了29倍，轻工业增长了6.3倍，农业产值增长了0.17倍，1953年的粮食产量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第二，发展重工业是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即利用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买进工业品的办法，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这种“剪刀差”的办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第三，农业上不去必然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导致消费品严重不足，市场供应长期紧张，商品荒越来越严重。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得不到满足，大大挫伤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3）苏联模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良影响。苏联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要求它国它党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造成它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例如中国50年代经济建设中的“一大二公”，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表现在政治上的党内外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或多或少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上述三大弊端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社会主义剧变的部分原因。

第三节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一、东欧剧变及其原因

1. 东欧剧变的经过

东欧是指二战后除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以外的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后，东欧8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以及苏联的帮助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后它们大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济上是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政治上是过度集权、一党揽权、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外交上是跟着苏联走共同对抗西方。因此，导致了经济的滑坡和政治的没落，在80年代末发生了战后40多年来空前的动荡和急剧的变化。

剧变首先从波兰开始。波兰由于在80年代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出现了经济形势恶化的迹象。1989年，波兰共产党开始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方针，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进行议会大选等协议。在6月份的大选中波党失利，团结工会获胜组织政府。团结工会上台，标志着波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剧变。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面临严重社会经济矛盾的形势下，实行多党制，造成党内分裂而丧失政权的。1989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强大压力下实行多党制，10月份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不久党内发生分裂。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匈牙利举行大选，民主论坛等反对党获胜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政局动荡是围绕着“布拉格之春”平反而展开的。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改革运动，后被苏联武力镇压。正直的捷共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但捷共领导人却认为1968年事件是反革命事件。1989年11月，由反对派组成的“公民论坛”组织群众示威，并于12月上台执政。保加利亚于1989年11月举行保共中央全会把日夫科夫驱逐下台，标志着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民主德国从1989年9月开始出现全国性动乱，大量公民外逃的浪潮使长期保持稳定的民主德国政局出现大动荡。这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更换，随后改变党的方针：承认反对派组织“新论坛”为合法组织；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

拆除“柏林墙”；决定实行多党制。1990 年 3 月，被称为“德国联盟”的三个反对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原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下台成为在野党。新政府上台后，即要求与联邦德国合并。10 月 3 日，联邦德国吞并了民主德国，实现了两德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消失了。罗马尼亚采取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暴力冲突形式。1989 年 12 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因抗议解除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神父职务举行的群众示威演变成骚乱。不久，布加勒斯特也开始了骚乱，军队倒戈。外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赛斯库被捕，并被秘密处决。救国阵线委员会取代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成为罗马尼亚执政党。东欧 6 国变化速度之快出乎人们意料。大体上，波兰、匈牙利的变化经历了 7 个月；民主德国 70 天；捷、保两国 7 个星期；罗马尼亚只有 7 天。6 国剧变急剧、剧烈，具有戏剧性和悲剧性。这场剧变真是变得太快、太大、太离奇、太令人难以理解了。在东欧 6 国出现的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影响下，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也无法幸免。东欧各国的先后剧变大多数是采取游行示威方式迫使共产党政权进行多党制的改革，反对派通过大选上台夺取国家政权。从 1989 年 6 月至 1990 年 12 月，东欧 8 国先后发生剧变，由于这场剧变大多数未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因此又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反对派在夺取政权后，无一例外地都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上用资产阶级思潮代替马克思主义。因此，东欧的剧变实质上是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严重倒退，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

2. 东欧剧变的原因

东欧的剧变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国内原因是主要的。国内原因有三：第一，70 年代下半期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东欧各国解放后照搬苏联模式，形成了过度集权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极大地阻碍了各国的经

济发展。在加上70、80年代经济决策上的失误，如盲目实行高积累、高速度、高消费的“三高”政策和大量借外债等，使东欧各国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第二，政治上矛盾重重。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这些国家受苏联影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破坏法制，影响恶劣，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领导人独断专行甚至搞家族统治；各国共产党没有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党组织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核心，结果在政治斗争中被反对派轻易击败。第三，改革失去方向。对于长期存在的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实行行之有效的改革，甚至偏离社会主义倒向自由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变颜色。

国外原因有二：第一，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加速了东欧剧变进程。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向东欧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70、80年代，他们利用东欧各国面临的种种困难，多方施压力促东欧各国演变为资本主义。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推波助澜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从控制东欧各国到放松甚至纵容东欧各国“自裁”；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又引导了东欧国家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

总之，国际国内原因里应外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国家的解体。

二、苏联解体及其原因

1. 苏联解体的经过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苏联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经济体制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已不能适应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历届领导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进展缓慢收效不大。政治体制上，斯大林时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使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弊端进行一些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形成了领导者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个人过度集权。在对外关系上，50年代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已初露端倪；自60年代起，又进而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经济滑坡。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被迫加紧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然而收效甚微。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1988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并在实践中全面实施“民主化”“公开化”方针。公开化、民主化对斯大林错误的全面揭露和苛刻谴责，造成了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1990年3月，苏联修改宪法第6条，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确立多党制总统制，致使党派林立局势混乱。1991年8月，《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公布，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把它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这激起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党内外的斗争急剧尖锐化。就在条约即将签署的时候，爆发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企图控制局势的8·19事件。8·19事件改变了苏联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乘机夺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全面崩溃和瓦解。8月23日，叶利钦签发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迅速掌握了国家大权。苏联共产党被排挤出政权，国家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协定，宣布

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此后，俄罗斯等 11 国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阿拉木图宣言》，独立国家联合体扩大到苏联绝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独联体”是国家的联合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苏联完全解体。8·19 事件发生后 5 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或宣布脱离苏共，或更改党的名称，或宣布停止活动，或被禁止活动。执政 70 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在组织上顷刻瓦解。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剧变和解体最终完成，存在了 74 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版图上消失。

2. 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的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新思维的要害在于以社会主义改革为名，鼓吹“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现实社会主义，鼓吹人道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此对苏联进行彻底改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其次，苏联过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苏联过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在建设初期曾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缺乏内在动力机制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全民的积极主动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深入后的集约化经营的需要，这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体制造成了苏联经济的落后与停滞。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庞大、官僚滋生，既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又成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再次，苏联共产党外交内政的失误是其解体的又一原因。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横行霸道，在第三世界到处扩张，如此外政，既耗费强大军事开支增加国民经济负担，又使自己孤立甚至声名狼藉。在内政方面，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一党专政，既无

党外民主又无党内民主，加上党的高级领导专权特权，部分不良分子违法乱纪败坏党誉，如此造成苏共日益脱离人民群众，人心冷漠社会不满。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导致解体。

三、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6国缩小为5国，陆地面积由占全球的24%缩小为7%，人口由原来占世界人口32%减少为25%；共产党组织由180个减少为120多个，党员人数由9100万减少为7000多万；美共党员从2万人减为0.5万人，加拿大共产党员由3000人减为600人，英共党员从7600人减为1000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渺茫、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右势力则是弹冠相庆，宣称历史已经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现在的任务是要扫除共产主义残余。苏东剧变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1.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不是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如果本末倒置，势必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落下来，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要根据本国国情，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教条主义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2. 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改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体制。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与生机之所在，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前进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推移经济的发展，苏联东欧原有的过度集中经济政治体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为此必须

积极改革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把更新和转换机制的任务提到前面，同时还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然而，苏东国家或者拒绝改革，或者有所改革但决策失误，或者“彻底”改革把改革变成改向。种种失误导致剧变解体。

3. 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官僚主义严重，社会生活缺乏民主，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个别领导人甚至腐化变质遭受人民群众的唾骂痛恨。执政党丧失了应有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在多党制的浪潮中失去政权，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中落。因此，我们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巩固。所以，党一定要加强理论、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民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苏联东欧的解体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正在东方的大地喷薄。

第四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有19世纪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19—20世纪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他们吸收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在20世纪20—70年代上半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新时代，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问题，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

第一节　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一、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

（一）洪秀全的生平与社会思想

洪秀全（1814—1864），广东省花县人。7岁入私塾读书，16岁辍学务农，后来当了私塾教师。早年希望通过科举走向仕途，屡试不第。外国的入侵、清朝的腐败加上个人坎坷的经历，推动他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1845年到1846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3篇著作。他吸收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的有益成分，把儒家中的大同思想、历代农民的平等意识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

1. 反对封建制度

一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称“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他在《原道觉世训》中把清朝皇帝看作是与皇上帝作对的“阎罗妖”，他认为“皇上帝乃帝也”，历代君王“他是何人，敢靦然称帝者乎！”在这里，洪秀全号召人民消灭封建皇帝，反对奴役，打倒各种偶像。二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洪秀全从虚拟的皇上帝出发，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②] 这些思想反映了洪秀全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等级制度、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三是反对封建私有制。洪秀全认为私有制是造成人类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他说“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③] 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现实。

2. 主张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

① 罗尔钢编著《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1页。
② 罗尔纲编著《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③ 罗尔纲编著《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他描绘了一个人们之间互助合作、和谐平等、互敬互爱的理想蓝图，在这里“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在这里“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可见，洪秀全的理想社会中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洪秀全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基本贯穿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里面。《天朝田亩制度》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它反映了贫苦农民要求获得土地，追求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愿望。

3. 太平天国农业社会主义的特点

一是土地制度方面。《天朝田亩制度》从“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即社会一切财富都归皇上帝所有、人人在皇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一前提出发，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不论男女，16岁以上都可分到一份数量相等的土地。二是政治制度方面，建立兵农合一、政教合一的乡官制度。这种乡官制度是根据太平军的编制，把农民组织起来。每5户为伍，设伍长1人，每家有1人为伍卒；5伍为两，设两司马1人。两以上四两为卒，设卒长1人；5卒为旅，设旅帅1人；5旅为师，设师帅1人；5师为军，设军帅1人，每军大约有1万多人。军帅以下各级官员称为乡官。两是社会基层组织，两司马平时管理生产、分配、教育、行政、诉讼、警卫等，战时则统率伍卒打仗。三是分配制度方面。太平天国在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农副产品“除留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农民所需的各种用品，由国库按统一标准支付，“凡25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由国库。”至于鳏寡孤独、疾病残废，均由“国库”供养。四是其它制度方面。婚姻制度上，太平天国主张废除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平等。妇女可以参政担任官职，可以参军等。文化教育上，在

农村设立教堂，少年儿童每天要去受教育，成年人则每个礼拜日去听讲座。此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奖勤罚懒的措施，“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为恶为顽，或诛或罚”。

（二）洪秀全社会思想的评析

洪秀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学习借鉴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而成就自己的理论。16世纪初德国的闵采尔借助上帝的声音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暴君建立地上的天国，是为千载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也是扬起反封建的大旗，号召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二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历代农民起义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大同思想早在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中就已出现。其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被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引用，并声称这种“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世界就要到来。而平等、平均思想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基本旗帜，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不例外，继承了这一传统。三是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色彩。与早期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不同，洪秀全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正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时代。太平天国向封建制度举起讨伐的大旗，客观上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四是带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洪秀全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使其社会主义理想中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如洪秀全一方面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方面又在现实中确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它自己自封为天王；一方面要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社会，一方面又规定封建的世袭和特权。显然，农民阶级因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其理论和实践不能不带有这个阶级所特有的历史局限性。

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一）康有为的生平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康有为读书刻苦，博览群书。1876年，开始拜名儒朱九江为师，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并产生“以经营天下为志”的抱负。此后，他游历了北京、上海、香港，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历史、政治、地理方面的书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日本逼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在京城应试的康有为闻知极为激愤，联合18省1300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从1888年到1898年10年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阐述了他变法的政治主张，终于促使光绪皇帝采纳了变法维新的主张。1898年6月至9月，光绪皇帝颁了几十条诏令，推行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后又游历美、欧、亚、非诸国十几年。

在流亡生涯中康有为完成了《大同书》，这本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同”二字，起源于《礼记·礼运》，原话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康有为以“大同”作为书名，反映了空想主义思想的中国特色。《大同书》以进化论为基础，阐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顺序，即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从而达到最理想的大同社会。《大同书》详尽地描绘了大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社会道德等状况，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美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画面。

（二）康有为大同社会的特点

康有为目睹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在腐朽的清政府的

统治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他认为只有实行大同社会人们才能脱离苦难。它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政治制度方面，大同世界里没有君主、军队、战争和国家。

康有为考察了古今中外各种战乱，认为其根源是由于划分国界引起的，“诸国并立，则强弱相并，大小相争，日役兵戈，涂炭生民，最不宁哉！”“及有国，则争地争城而调民为兵也，一战而死者千万”。[①] 因此，他主张去除国界，将世界联合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这一过程的完成，须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实现各国之间的平等联盟，如同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的晋楚联盟，近代的德奥同盟、俄法同盟等。康有为称这种政体为“大同基始”的据乱世。二是实行联邦自治，设立统一的公议政府。公议政府由各联邦国组成，不设总统只设议员，议员由各联邦国选派。公议政府负责议定各国公律，裁决各国交涉，平衡各国关税，统一度量衡和语言文字。并设公兵公律用以平息和制裁各国的战争。各国必须将武器数目上报公议政府，各国之间不得缔结秘密条约。同时，各联邦国政府应发展地方自治，使政府的权力逐渐向下分移。这就是康有为说的升平世之制。三是完全削除邦国疆界，把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体，建立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公政府。如同美国联邦那样，各国改为州郡统一于公政府，公政府下设民部、农部、工部、商部等，负责管理全球各项行政事务，行政官和议员均由公民选举产生。全世界都以大同纪元。从此，人类没有了军队和战争，没有政党，没有刑罚，没有监狱，“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就是太平世。

2. 经济制度方面，大同世界实行公有制，实行公农、公工、公商。

---

① 《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4—55页。

公农是指“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公政府下设农部总管全球农田，各国设立农曹、农局、农分局管理。农业中已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接受农局培训，实行科学种田。凡农产品留足本年度之用外剩余部分上交农部，由农部移交给公政府的商部。公工就是“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公工具体由公政府设立的工部和各国设立的工曹进行管理。工厂规模宏大，“用人可至千百万，亘地可至千百里”。政府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对卓有成就的发明人“给人宝星之荣石，赏以千万之重金”。工人象天上的神仙一样快乐。公商就是“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商部下设商曹，管理各国商务。物价低廉，没有赋税。大同世界按劳分配，实行10级工资制，目的是为了禁止懒惰，反对不劳而获。工资级别划分依据才能、资历、品行、勤懒等标准进行。此外，还实行奖金制，用以鼓励创造发明。

3. 社会结构方面，康有为规划出一个没有等级、没有家庭、男女平等的社会组织。

康有为认为等级制度是人类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欧洲号称文明然而贵族与平民的争峙历经千年而难以消弭，这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人类平等。在大同社会里，人无贵贱之分，也无智愚之别，民族平等，种族融合。康有为鲜明地提出了废除家庭的思想。梁启超评论说这一点是《大同书》最主要的思想，“全书数10万言，……其最关键在毁灭家庭。”康有为主张男女各自独立相互平等，惟其如此，才能消除家与家的隔膜，消除私有财产，消除战争和种族隔离。要实现男女各自独立，必须解放妇女。他提出了实现妇女解放的11条措施，其中有设立女学，优秀者可以参加选举、应考、为官，废除缠足、细腰等摧残妇女的陋习，婚姻自由。大同之世，男女具有同等的机会获得受教育权、名誉权、

管理权。所谓废除家庭，就是在此基础上，男女结婚只订岁月交好的和约而不为夫妇，这样只要 60 年，全世界就没有家庭了，也不会再有夫妇、父子之私了。妇女生的孩子由育婴院集体抚养，同时公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生老病死等事宜。

大同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生活在一个自动化、电气化和空间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物质生活极为丰富，城乡差别已不复存在，衣食住行已不仅仅具有生存的功能，而且有了养生、美学、享受的功能，每天只需工作 3—4 小时，其余时间自由支配，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不再是养家糊口的需要。

4. 文化教育方面，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熏陶良好社会风尚。

康有为提出教育应从胎教开始。为此，公政府专门设立胎教院，孕妇享受良好的教育，接触的是和平、友好、安乐、仁慈的事，以此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及至婴儿出生，即移到育婴院实行优育，在这里重点养育儿童健康的身体和仁爱之心。6 岁后儿童进入小学院，在这里养体开智。11 岁进入中学院，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16 岁开始进入大学院，进行专业分科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兴趣选择专业。大学学习重视实验，重视发明创造。在大同世界里，不仅人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人心为公、善待他人、和平相处，过着美满和谐的生活。

（三）康有为社会思想评析

（1）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比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前进一步。他周游列国，亲身体验了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这表现在他的大同世界里，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鼓励人们合理享受，这就使他的大同社会建立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同时，他还设计了奖金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这就克服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这一以往空想社会主义难以摆脱的缺陷，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

(2)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既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又吸收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还不时闪烁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光华。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痛恨和对平等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他的反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妇女解放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

(3)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包含有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糟粕。如他认为大同世界里无国家、无君主、无政党、无军队、无婚姻、无家庭等明显受到19世纪70年代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十三无"的影响。

(4) 作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康有为也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他幻想通过国家之间的联合、通过裁军来使国家消灭，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无法等同。除此之外，他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由低级向高级的社会进化顺序，也并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上。其大同思想与其它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一样，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三、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

(一) 孙中山的生平

孙中山（1866—1925），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流亡日本时，化名中山樵，人称中山先生。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78年5月在哥哥孙眉的帮助下，进檀香山的小学、中学读书，接受西式教育。后赴香港学医，1892年毕业。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建议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同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确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

治纲领，后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1907—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组织了8次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1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孙中山为了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又进行了不懈而艰苦的反袁斗争。1924年，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专门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设计的三民主义理论，就是要吸收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避免其种种弊端。他认为采用民主主义的方法，就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最集中地体现了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主观社会主义指主观思想上向往、追求社会主义，但在客观实际上只是要实行民主主义。列宁于1912年7月15日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为“主观社会主义”，说“他们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

（二）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1. 民生主义的实质

孙中山曾在国民党内多次讲民生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924年8月，他专门给民生主义做了一个注释：“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①] 他认为用“民生”这个词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更为适当。他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只不过存在着范围大小的差别罢了。孙中山高度评价马克思及其学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页。

说，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之大成。他赞成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消灭阶级、剥削、生产力高度发达，但却不赞成马克思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民生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说“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他强调“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方法则不可”。[①] 认为民生就是用一种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避免社会贫富不均的大问题。

2. 民生主义的内容

民生主义的内容大致为二：

其一是平均地权。孙中山考察了欧洲社会，他认为欧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随着产业的发展，地价上涨达十几倍，地主坐食其利。中国也会出现欧美的问题。因此，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方法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增价归公。具体可以由地主报地价，国家按价抽1%的税。核定地价后，土地增价部分全部归国家所有。这一做法主要是针对城市及近郊的土地问题，并没有涉及到广大农村的土地关系。为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以农立国的中国，农民是社会各个阶级最贫苦的阶级，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大都集中于农村的地主手中，农产品大部分都缴给了地主。对此，孙中山很推崇苏俄的做法。认为十月革命后，苏俄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地主再无权向农民收租，农民只对国家纳税，这是最公平的方法。

其二是节制资本，孙中山认为如果听任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下去，就会拉大贫富差别，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引发社会革命。这样中国也会象西方那样出现大资本家，因此必须限制私人资本，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1页，第803页。

避免出现大的资本家，从而消除社会革命。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达到节制资本的目的。一是限制经营范围，对于那些具有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银行、铁路等，应由国家经营；二是实行累进税，国家开征高额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用于减少贫富两极分化，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快扩张；三是发展国家资本。孙中山曾提出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迅速发展公用事业，还能够增加财政收入。

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的实质在于“民有、民治、民享”，即“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也是民生主义的真正目的。而民生主义的实现，有赖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贯彻，贯彻了这两项内容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

（三）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评析

1.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是理论基础不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两大理论基石构成，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生产力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发展进化的原因。因此，从人类的公共利益看，人类应以互助为原则。他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态现象，原因是民生问题没有解决。而马克思却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其次是内容不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揉合了中外很多有关民生问题的理论家的思想，其中包括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平分土地的思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关于发展工商业走向富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19世纪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思想。乔治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对土地征收单一的累进税，废除其他税

收，实行公用事业公有化，使社会财富分散化，减少贫富两极分化，以此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弊病。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

再次是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不同。孙中山反对马克思的发动人民群众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地主的土地。他认为，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便用不着。

2.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不同。孙中山立足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期，整个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而马克思则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工人阶级已经壮大并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孙中山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文明，同时也看到了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希望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善果”，而避其“恶果”；不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一条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要国家富强，又要人民幸福，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除无产阶级领导权外，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体相同。他的思想完全剔除了小农经济的狭隘社会主义观点，其解决土地问题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符合的。

3.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民富国强。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旨为中国人民的主体——农民富裕起来，其“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又是为中国国家的强盛，这也是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反对闭关主义主张开放主义，直到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始终不离开人民生活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

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①] 正是由于孙中山念念不忘民富国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②]

第二节 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一、毛泽东的奋斗历程

毛泽东（1893—1976），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1914—1918 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同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 年"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 年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一大"，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 年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 11 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 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后率部进军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与朱德率领的起义队伍会师，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 年 8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 年 1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3 年 1 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 年 12 月至 1933 年 2 月领导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804—805 页。

②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 120 周年》，邓颖超在 1986 年 11 月 12 日在首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20 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革命根据地的4次“围剿”。1934年10月领导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中央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2年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抗日战争胜利后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他在蒋介石撕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3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直到逝世。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战略和策略以及政党建设等理论。主要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但是，晚年由于威望的提高，逐渐骄傲起来，赞成和接受个人崇

拜，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此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并赞同与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1966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内乱”，使中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阻碍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是使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进入第二阶段的革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提出了推翻、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等原则，但没有指明当时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毛泽东通过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这时中国革命既不同于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他在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

中的巨大作用作出有力论证的同时，着重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为党在后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表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初步结合起来。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

①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成功，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为什么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成功、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呢？这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容许。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①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得到它们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袁世凯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的。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此而抱终天之恨。”①

其次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发生100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刚发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一是外国资本的压迫。它们在中国倾销商品和直接投资经营企业，致使中国的市场为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二是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它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三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村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购买力极其微弱，致使国内市场显得非常狭小；四是封建官僚政府的压榨。它们所实行的苛捐杂税等政策，使民族工商业获利变得十分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的。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②“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弱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成功，革命的前途将是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之后，中国兴起了新民主主义，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它们的动力也是相同的，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领导权的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毛泽东指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①

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呢？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具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② 主要有三：一是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二是中国无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里，集中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举办的大型企业中，有利于他们集结为强大的统一的力量，显示斗争的声势和扩大斗争的影响。三是中国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易于同农民结成政治上的联盟。“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①

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是经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而它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将不时机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80年期间中国人民的历次斗争虽然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归根到底还是遭到了失败的话；那么，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的斗争虽然也还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经过28年的时间，中国民主革命终于赢得了全国性的伟大的胜利。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论断。

3.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且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就是终结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②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其国体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不仅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济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一方面，由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含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而且它们在这个共和国的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① 根据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性质的认识，1947 年 12 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②

③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需要相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共同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服务。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60－10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3 页。

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既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反帝反封建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精辟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间里，党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工人运动上，认为党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立在工人阶级上面，党的工作应以大城市为出发点。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革命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1927年革命失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反革命相当牢固地控制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都相继失败了。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首先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指向了农村，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历程。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在全部工作的指导上仍然囿于“城市中心论”，要求不顾一切地加快城市工作步伐，举行城市工人暴动。

为了坚持党在农村的工作，为了弄清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毛泽东等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概括。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文章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该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初，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红军游击战争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经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毛泽东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①] 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工作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革命首倡精神。

②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根据有三：

(1) 由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决定。

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他们是封建势力的主要压榨对象和帝国主义者的主要掠夺对象，因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村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利的战略基地。中国的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地控制的地方。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的。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首先开始、首先胜利。

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着乡村。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基本可以自给自足，革命的乡村在脱离城市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相对独立地生存下去的。一旦乡村革命化了，反革命占据的城市却由于人力、物力的供应来源被切断，要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问题。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予反革命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的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性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分别扶植不同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样，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就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纷争。这就为农村斗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一种机遇。

(2) 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所决定。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反革命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背叛了革命的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

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3) 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决定。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要求党在农村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而要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必须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农民没有或缺乏土地，农村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贫困，广大农村无力提供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市场和资金等，成为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根本性限制。在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不但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许多地方还形成了封建式的军阀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和一项基本任务。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使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解放，才能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开辟道路。

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践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丰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4、635页。

与发展。

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

1.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革命推翻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存在着广大的农民及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商品经济，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它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即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开始了。但是，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经过 1949—1952 三年的土地改革与国民经济恢复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已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既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中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了。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 1952 年底、1953 年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全面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即完成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社会主义革命。

2.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特点主要有三：

①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一方面

又要求把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利于进行技术革命，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因此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之直接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比如，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发展农业社，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看质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重要推动力量。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也仍然是逐年上升的。

②对个体农业的改造：走合作化道路

在推动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我党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经过几个过渡性的经济形式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首先，是组织互助组，即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和对某些牲畜、农具的共同使用，并有少量的公共财产。然后，是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并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再后，是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将土地及其它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指出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恰当的、有效的。这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新创造。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还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逐步限制以至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路线。由于土改以后许多贫农上升为中农，农村在某种程度上中农化了。为了解决依靠大多数的问题，党将贫农和新下中农、老下中农（相当于贫农）作为依靠对象。在实行合作化时，首先引导具有较高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这三部分人分期分批地加入合作社，这样做，可以避免对中农采取冒险政策。上中农有轻微剥削，他们不愿入社，是为了向富农方向发展。但是当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以后，他们要发展雇工剥削、高利贷剥削等等已经变得极度困难，不仅是发展富农经济，就是维持原有的轻微剥削也很不容易，倒是入社才对他们比较有利。这样，他们为农业合作化的大潮所裹挟，也先后要求入社。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一个胜利。

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平赎买

中国资产阶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党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加以打倒，在经济上实行没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在团结他们的同时逐步地改造他们。没收官僚资本，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用和平方法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而用和平方法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则有利于争取民族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减少他们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阻力。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和平赎买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第一步采取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多种形式，把私人企业的经营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采取由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

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大特点，列宁曾设想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完成这种转变，最终未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它“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这种经济主要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为资本家私人利润而存在，为资本家提供的利润大约只占全部利润的1/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即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即把资本家从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在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为资本家在企业中安排了一定的工作，为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

党和国家所以能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平赎买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有接受这种政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这就是：第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第二，“国营企业的优胜”，“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第三，国家“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来制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第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使得资产阶级除了接受改造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赎买的方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设想，是马克思、列宁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了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带领党和人民在中国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是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新证实和新发展。

3.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意义

建国初期的7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凯歌行进的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意义有三：

①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已经建立。1952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合作社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72%，资本主义经济7%。就是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7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1957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33%，合作社经济56%，公私合营经济8%，个体经济3%，资本主义经济0.1%。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7%，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这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②它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

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功应以它对社会生产力是否起促进作用作为衡量的标准。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41%，平均每年增长19.2%；农业和家庭副业总产值也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52年增长了42.8%，全国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长了30%。社会主义改造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

③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造成功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社会主义。中国原本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有严重争论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和俄国的孟什维克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就是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作为唯一的论据来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俄国搞社会主义的。中国的陈独秀也是依照类似的根据，认定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后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的认识根源。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印证了列宁这一科学的论证。

四、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1956年是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如同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正确地、系统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1. 国家政治生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

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同年，东欧国家因受苏共二十大影响，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9页。

举行了罢工和学潮，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国际影响也波及到中国，自1956年冬—1957年春，中国一些城市先后大约1万工人罢工、1万学生罢课，甚至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与旧制度下相比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

第二，毛泽东对社会矛盾作了区分，认为社会主义存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敌人是指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人民是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是，这两类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人民内部矛盾在现实中有很多表现，主要是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以及在分配关系上的利益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2. 经济建设中处理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某些建设经验不足为法，他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十大矛盾。《论十大关系》中的前5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

第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做，不仅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要避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问题。

第二，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积极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同时要争取和利用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这样使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对发展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害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第三，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国防不可没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但是，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因此，加强国防就一定要先加强经济建设。

以上三条对于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第四，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提出必须坚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原则。要避免苏联过去的做法，把农民的东西拿走的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同时，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们不能

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总之，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3. 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政策

在科学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认为，对待科学文化，“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他反对那种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的“收”的方针，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这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个方针正确地反映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①

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又提出了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是非的6条政治标准：一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是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这种领导；六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并认为这6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毛泽东还多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主张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他提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外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

4.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多党合作发展而来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永远不变的。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除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参加了政协会议。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施政方针。新政协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政权。《共同纲领》中有关的法律性条文的制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基本建立，也标志着我国各民主党派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毛泽东在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思考了关于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① 基于对苏联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严重教训的认识。他强调：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不好。毛泽东很重视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他说：“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②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并由此确定了今后将“采取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这一开创性工作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这种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第一，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前提是承认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承认中国必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0页。

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而不至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那样互相倾轧，而至抵消力量。第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三，多党合作也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毛泽东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是同他高度重视处在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建设问题紧密相关的。同时，民主党派的监督，也有助于防止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危险倾向，使共产党能够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旺盛生命力。

五、关于毛泽东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命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算起，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他生前经过了整整20年曲折发展的历程。他在20年探索中的成功与挫折、正确与失误，都为以后的继续探索和前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长征中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

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 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伟大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三项伟大的事业：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二是采取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地确立起来，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三是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基本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原先那种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3. 毛泽东的历史局限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一是理论上照搬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忽视了马克思提出这些设想以及实现这些设想的客观条件。在民主革命时期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没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过早地实现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实行单一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张。二是政治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服从政治。错误地将马克思依据经济标准划分阶级改变为依据思想标准划分阶级。由此强调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构成了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始终没有真正把工

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是经济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突出地表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限制商品经济，取消个体经济，片面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农业上“以粮为纲”，不注意综合平衡，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

第三节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邓小平的奋斗历程

邓小平（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回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于6、7月间转赴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邓小平。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以后，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出任第七军、第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时，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

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处分。后来，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1934 年 10 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担任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 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 年 8 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即“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 38 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 500 余次。1942 年 9 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 年 10 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 年 6 月，邓小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 月，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晋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1945 年 9 月，邓小平和刘伯诚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947 年 5 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 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 年 5 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即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1948 年 11 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指挥中原野战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1949 年 3 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 月 21 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解放了南京。

194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 年 7 月，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4 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 4 月，在中共第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 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 10 年。1962 年 2 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有 7 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66 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1969 年 10 月，他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1973 年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 年 1 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在短时间内，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后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 年 1 月

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他一出来工作，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非常重视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他当选为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三大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现代化，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高瞻远瞩，为中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政体改革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在

他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成为现实。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邓小平审时度事，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都要反对腐败。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的谈话为开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1993年，

邓小平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适应当今时代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

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解决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面对的历史难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危难中挽救了社会主义。

1.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条件大致有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44页。

（1）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这一时代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是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革命和战争是这一时期的主题。在这半个世纪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在一些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社会主义在战争引起革命的形势下得到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获得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了发展，战后欧亚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战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大的增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却开始进入低潮。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出路何在？这一问题严峻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促使人们去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2）改革开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年来，中国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理论原则、战略思想和根本指导方针，正确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构成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过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过严重的曲折。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

重失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失误，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本国实践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式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作绝对原则，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付诸实施，把将来才能做到的事情当作现实目标。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没有准确地把握本国的基本国情。脱离本国实际，不加分析地照搬别国的做法和模式。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超越现实，把苏联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共同规律共同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正是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①酝酿提出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转折。它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①] 随后，邓小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① 这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决议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10条主要之点，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框架。

②轮廓勾划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1987年十三大）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现代化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建设；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确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还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十二大以后，改革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从经济体制进入到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为了适应改革全面展开的需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排斥的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从而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再一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这次大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了全面阐述。这次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认识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作出了概括，提出了12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③系统总结阶段（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总结了

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把十三大提出的12个理论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新的论述和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年，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从9个方面作了论述，使这个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成为严谨的思想体系。

1997年10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在理论上又有许多新的突破：一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科学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五大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深刻论述了什么是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二是深刻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针对长期来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在所有制问题上仍然存在的种种疑惑，党的十五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

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有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公有制经济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等等。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是对传统所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至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渐臻完善。

三、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与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而不是零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个别问题），提出了观察、分析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从而构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

1.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 年党的十四大将其概括为“九条”。1995 年中央决定印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又将其扩展为“十六条”。但“十六条”是以“九条”为基础和根据的，是源于“九条”又展开“九条”，因此，这里以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所作出的概括来介绍其主要内容。它们是：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在文化方面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上，提出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渐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加强自身建设的执政党的党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它在中国的实践，既没有

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没有让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是多方面的，最具突破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和毛泽东都从当时的时代特征出发，把革命和战争作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了科学分析，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党的十三大报告，把这一思想正式表述为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这个判断，从总体上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大体上也持这种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阶段上，都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导致犯"快过渡、穷过渡"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理论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在实践上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

三是"改革是一场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是革命，但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一种社会形态的自身发展也是改革。恩格斯当年虽然有过社会主义社会应当

改革的认识，列宁晚年也有过改革的思想，但都未形成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毛泽东纠正了斯大林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失误，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变革，但他离开生产力来谈变革，最终也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邓小平坚持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改革思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改革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要有领导地进行，改革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完整理论。这些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而且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

四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出的是否定的回答。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列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势不两立。邓小平大胆突破传统观点，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相剥离，摒弃了把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理解为带有基本制度属性范畴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两者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这一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找到了正确道路。

五是从价值的角度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往人们都是着眼于生产关系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探索什

么是社会主义，把生产力、生产关系、根本任务、根本目的和发展手段等融合在一起，深入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最终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这个论断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一下子从旧的僵化认识中摆脱出来，形成了“坚持基本制度，改革具体制度，选择灵活政策，实现本质要求”的基本理念，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积极推进社会本义改革与创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问题。

六是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当是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后来各国的实践，突破了这个设想，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但仍然没有摆脱所有制“越大越公越优越”的思想束缚，并在实践上急于过渡，结果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受到束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地打破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水火不容的观点，取得了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优势互补、互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低级形式要向高级形式过渡的观点，提出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没有高低之分，都要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观点；改变了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加区别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观点；打破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量上占优势的观点，提出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的观点；打破了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偏见，提出了股份制是资本组织方式的观点。这些重大突破，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有了崭新的面貌，使社会主义出现了勃勃生机。

3.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先后揭示了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律。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又揭示了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又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是时期定位，“中国”是地域定位，说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继承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创新，是适应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①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后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②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即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③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进行正确分析并做出科学判断。当今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改变当代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看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对外战略的，它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节 江泽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198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交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面对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了领导干部讲“三讲”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方略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抓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着眼于执政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保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向前发展。

一、领导干部讲“三讲”的思想

1.“三讲”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不断进步的。但也有相

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及其精神实质，甚至断章取义，搞实用主义；有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跑；有的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甚至不择手段，争权夺利；有的违反民主集中制，无视组织纪律，放弃党性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和庸俗的关系学，甚至庇护犯罪；有的当官做老爷，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贪图享受，挥霍浪费，以权谋私，纵容亲属胡作非为，甚至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情况和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放弃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的结果，都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当前工作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损害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作风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进入攻坚阶段，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能否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鲜明；能否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诚执著奋斗不息，从思想上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能否在作风和行为上严以律己拒腐防变，将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因此，1995 年，江泽民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鲜明地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由此开始出现在报刊和文件中，逐渐成为党对全体党员进行教育的重要教材。1996 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提出“三讲”的现实和深远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97 年，党的十五大决定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8 年 11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明确“三讲”集中教育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和方法步骤。“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

分级分批进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直属机关在试点基础上展开，上半年结束，地、市、县、下半年基本完成。一个领导班子开展学习教育的时间一般为两个月左右，安排活动时可以有分有合。大体步骤和基本方法是：

(1) 思想发动，学习提高。动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以积极认真的态度搞好学习。这是开展好“三讲”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要深入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有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论述，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树立正确的态度，真正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来参加“三讲”教育。

(2) 自我剖析，听取意见。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反思，找出领导班子特别是本人在党性党风和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世界观的深处进行剖析。个人总结材料形成后，印发同级领导班子和下级主要领导成员征求意见。同时，发动和组织本单位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及每个成员进行畅所欲言的民主评议，并将评议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如实反馈给本人。有违法违纪问题的干部要自觉向组织交待清楚，主动讲清问题的可以从轻处理。

(3) 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在领导班子内部开展谈心活动，有话讲在当面，不搞自由主义。经过充分准备，党委（党组）集中几天时间召开会议，开展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增强团结，共同进步。对确有问题不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或者讳疾忌医、拒绝帮助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上级要及时指出，促其改正。

(4) 认真整改，巩固成果。针对反映出的主要问题，集中分析研究，落实整改措施，系统总结经验，完善相关制度，巩固学

习成果，促进“三讲”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要在适当范围向干部群众通报结果。

党中央以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逐步把“三讲”教育活动推向全国，因为，这是一次全新的自我教育活动，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创造性探索。一场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在全国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2.“三讲”的内容

“三讲”第一讲是讲学习。学习即读书、学理论，原原本本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著，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三讲”教育规定了读书时间，指定了读书篇目，促使大家坐下来认真学。有了理论的武器，心明眼亮，对剖析自己、认识社会更深刻、更透彻、更清醒了。

“三讲”第二讲是讲政治。讲政治是“三讲”的核心，也是“三讲”教育的落脚点。许多同志说，平常我们看不到政治，不知道政治在哪里，其实政治是具体的、实在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和日常工作中，关键是要从政治上观察处理问题，提高政治的敏锐性。

“三讲”第三讲是讲正气。讲正气，是“三讲”的重要内容，是讲学习、讲政治的重要体现和保证，是个重大的问题。讲正气，江泽民讲得最多最集中最突出的，是党的正气是党员干部的正气。他指出：“要消除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首先要在党内真正造成一种浩然正气”，“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树立和发扬的最大的正气”，“不讲正气，胸中没有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就抵御不了酒绿灯红的诱惑和糖衣炮弹的袭击，就可能成为腐败现象的俘虏”，“讲正气，就是要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讲正气首先是坚定信念爱党爱国，就是始终为党的理想和目标努力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其次坚持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三是勤政为民，鞠躬尽瘁；四是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五是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三讲”的三个方面不是任意组合，而是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讲学习”是前提和基础，“讲政治”是其核心和保证，也是整个过程的灵魂，“讲正气”是其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既规定和制约其它方面，又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党的领导职能正是这三者的综合体现。

3.“三讲”教育的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党中央采取过多次以整党或整风形式加强自身建设的措施。历史的经验变成了党的宝贵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自我剖析开展批评，发扬民主开门整风，成为“三讲”教育的重要措施。它防止了过去政治运动中那种“左”的做法，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搞急风暴雨，不留后遗症；自我教育和风细雨，又不草草收场敷衍了事。中国共产党以她的智慧，找到了在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建设的法宝。

在整个“三讲”教育的全过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周密指导，稳步推动着教育活动健康深入开展。在“三讲”中，几十万名领导干部和几百万名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参与进来。他们严肃认真地剖析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及时地制定出整改的方案和措施。

在“三讲”教育过程中，根据江泽民的倡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也进行了“三讲”。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今后认真加以整改的措施。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三讲”教育，体现了“三讲”教育的彻底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三讲”材料，既是“三讲”教育的教材，更是我们党的重要的

文献。

县（市）级党政组织，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而由党的总书记带头，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同志在一段时间内直接深入县（市）抓党的建设，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少有的。在县市“三讲”教育中，90%左右的县级领导干部都深入到农村、企业、街道、学校等基层单位，特别是那些贫困落后、矛盾较多、群众意见较大的乡村，和群众同吃同住，了解实际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一批批省、地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驻村入户体察民情，群众说当年的老八路老土改又回来了！而这些领导干部同样受到巨大的震动和教育，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和群众的要求，使干部意识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这是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又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世纪之交作出的富有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这一场举世瞩目的在领导干部中进行的自我教育，又一次显示出共产党人甘于揭露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和魄力。

4. 讲“三讲”现实意义

(1)“三讲”教育厘清了干部的风气。“三讲”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增强了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坚定了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弘扬了正气。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一类腐败分子，都被坚决及时地清除出党绳之以法，并且在全国县以上干部中进行了警示教育，从而使全党干部的风气得到整肃提升。

(2)“三讲”教育提高了领导干部素质。“三讲”以集中教育为起点，把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我，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体现在以务实创新的精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上，体现在不畏困难勇对挑战开拓进取的工作状态上，体现在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密切联系广大群众，从而使领导干部在“三讲”教育中的思想收获和党性锻炼的经验，转化为履行岗位职责、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行动，保证了领导

干部素质的提高。

(3)“三讲”教育增强了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把“三讲”教育中摸索的解决党内矛盾、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经验制度化，落实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经常性工作中去，即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风，切实改进领导干部的学习和培训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推动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走群众路线；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从而增强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把“三讲”集中教育中形成的一套党委管党建、书记带头抓党建的领导责任制和规范的工作方法，运用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经常性工作中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运行机制，从而使领导班子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发挥其领导纲领作用。

“三讲”教育活动，只是中国共产党强化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水平的一役，只是一次阶段性的胜利。通过“三讲”，党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中国共产党将在不断地学习和提高中壮大自己，中国的社会主义巨轮将迎着新世纪的太阳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

在中国历史上，法制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严格，公民守法程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德治”是国家治理的另一个方面。一个有着良好道德风尚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法制与德治，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也必将对我们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积极的影

响，从而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1. 依法治国的方略

①依法治国的方略的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以来，我们党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了不懈努力。但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以及我们有关体制本身的不健全，使得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生活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现象大量存在，影响和阻碍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96年2月，江泽民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五大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要求，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的基本纲领之中。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把“依法治国”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

②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

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3件，年均16件；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800件左右行政法规，年均40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6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年均立法300件；国

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30000余件，年均1500件。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为20年来中国社会稳定而高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司法的公开增强了司法公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赋予了人民监督国家公务人员行使职权的权利和义务。

2. 以德治国的方略

①以德治国的方略的提出

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竞争、民主、法制的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维和效率观念。同时，由于市场的趋利性、排它性和商品交换的原则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法则，容易腐蚀到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人们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见利忘义，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削弱，甚至腐蚀人们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诸如坑蒙拐骗、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等丑恶现象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欺诈赖账等道德败坏行为，以及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明显存在的信用危机，已经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严重的挑战。事实告诉我们，除了法制手段以外，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也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此外，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决定着他们执法和遵守法律规章和法律条文体系。再有，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目的是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如果没有道德共同作用，那么遵守法律只能停留在强制的阶段，很难转向自觉，势必导致法典越来越重，最终很难达到“天

下大治”的局面。因此，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因此，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制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整个战略思想的最新和高度概括，是对党的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扩展与延伸，法律与道德成为引导全社会积极向上、打击邪恶、保障人民民主权益、遵守社会正常秩序的硬件与软件，共同支持着社会的健康发展。认真实践这一治国方略，对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和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②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贯彻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贯彻实施中央确定的以德治国方略，必须坚持两个“紧密结合”，“法治”与“德治”并举，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实际，全党、全民同心协力，保证以德治国的方略的真正实施。

(1)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加强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

国必会正确有效。”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和“德治”的实施是通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党内出现了一些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现象，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理想淡漠，信念动摇，私欲膨胀，有的违法、腐化堕落，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不能做到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基层、为人民群众服务，甚至不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和形象，对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主市场经济要求、健康文明的道德规范至关重要。所以，实施以德治国，一定要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就要遵循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时时刻刻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持把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好人民的好公仆；切实解决好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成为道德示范的群体，形成以党风带民风、以政风促行风、以官德促民德的良性机制。

为更好地使身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六中全会于2001年9月26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阐述了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决定》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

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决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决定》强调，全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进步，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

(2)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是实施以德治国最广泛的社会道德基础。为此，中共中央于2001年10月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纲要》以江泽民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了江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在指导思想方面，《纲要》提出了“一个牢固树立”、“一个大力提倡”，即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在方针原则方面，提出了“六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在

主要内容方面，提出了“一个核心”、“一个原则”、“一个基本要求”和“一个着力点”，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三德”共15句话60个字。社会公德：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家庭美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在实施的方式方法上，提出了“四个教育环节”，即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五类实践活动”，即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学习先进典型活动、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庆祝纪念活动、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活动；“两大社会氛围”，即舆论氛围和文化艺术氛围；“三项保障条件”，即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还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全面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3)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重在德治根基

以德治国，必须着眼现在把握未来。要特别重视对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引导，努力夯实德治的根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加强社会的道德教化，培育公民的道德情感，提高公民的道德情感，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要注意从孩子抓起。

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总的来说是好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有的人生态度趋于利己化，个体意识增强，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减弱，重

视个人索取，忽视互助、奉献；有的生活消费趋于享乐化，吃比高档，穿讲时髦，把艰苦朴素视为不潇洒；有的人际交往趋于庸俗化，唯利是图，唯权是交，个别的甚至拉帮结伙，把结交流氓不法分子看成是有能耐、有本事；还有的文化品味趋于低级化，看不健康书刊，涉足不健康场所，寻求所谓的精神刺激，等等。

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质量，关系到以德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关系到未来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为此，首先要改革教育制度，解决好“摆位不正”的问题。走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坚持把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从指导思想上重视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个性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引导他们分清是非美丑、真假善恶，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切实打牢立身做人的思想根基。其次，要营造良好环境，解决好“拒腐不力”的问题。社会、家庭和学校既要为青少年学生深入实际、接触社会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又要切实负起责任，尽可能减少各种消极因素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尤其要注意把好大众传媒、文化场所、精神产品的关口，使其真正成为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阵地。再次，家长和教师要以身作则，解决好“表率意识不强”的问题。家长和教师与学生接触较多，对他们的影响最直接、最广泛。为此，要加强师德建设、提高全民道德水准，给青少年学生以优秀表率，使青少年学生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到的风气熏陶。

③以德治国方略的意义

(1) 以德治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一贯重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马克思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时指出，这是一个“刚刚从资本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因此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就成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消除旧社会痕迹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明确提出，对于因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要“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继续完善执政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进行思考，将邓小平用法律和教育两个手段解决问题的思想，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对我们党治理国家方略的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方略的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2)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德治

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就提出了“明德慎刑”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的道德教化，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一套道德体系，有作为的君主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往往会收到国泰民安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德治国与中国古代的德治有着不同的意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德治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建立在建立君主专制广义基础上、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德治，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只有50年余年的历史，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还缺乏经验。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还要对传统的德治经验加以改造，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体系，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治国方略更加符合当今中国的实

际，确保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3）以德治国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逐步建立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特别是一套完备的商业道德和行政道德规范。在一个缺乏道德建设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生活中大量败德行为的出现和普遍存在的非信用现象，使市场经济中竞争的规则遭破坏。法律的作用被瓦解，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受到阻碍，最终会葬送经济改革的成果。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呼唤，将有助于市场主体加强自身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等道德修养，有助于形成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有助于建设一个信用完善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有序、协调、健康地发展。

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1.“三个代表”的提出

告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历程。21世纪是充满机遇和希望、充满风险与挑战的世纪，是决定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又一个关键性的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将在21世纪完成。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关键在党，希望在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变化进行了新的思考、判断和概括，总结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新论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

80年奋斗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①“三个代表”提出的背景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到20世纪末，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遇到了严重曲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什么解体？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失去政权顷刻间瓦解？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从思想理论的深层次上精辟地回答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这个大问题。苏东解体最根本的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能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没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丧失了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的身份。

其次，“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鲜明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锋芒直指束缚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桎梏，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

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全社会范围内，经济成份、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已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如何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历史任务。

再次，“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两大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我们党只有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因势利导发展自己，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种种影响，给我们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总体上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但是，在新形势下党内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严重腐蚀着党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成为十分紧迫的时代任务。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总目标的同时，郑重地提出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回答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

②“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

2000年世纪之交，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江泽民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着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先进性以及建党近80年来的历史经验，作了新的阐述和科学总结。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围绕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两个题目进行了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此次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强调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跨入新世纪，中国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经受着严峻挑战。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

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至此，“三个代表”，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辩证统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纲领性的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根本原因的深刻揭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行动指南。能否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出现于新世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2.“三个代表”的内容与内涵

①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三个代表”当中，首要的即是党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代表。任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从来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关系的单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广阔前景，而新的生产关系确立起来之后，如何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高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改变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

面貌，这是实现民族独立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要解决好这个课题，必须充分认识生产力本身具有的革命性和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自觉地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不断发展生产力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一辩证运动过程中，党的领导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条件，使生产力的发展合乎规律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加速前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只有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创造和推进先进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也才能更好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核心就是要集中全力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硬就硬在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硬就硬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抓好现代化建设，千方百计增强综合国力，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的差距，使人民群众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的伟大飞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继续完成"治贫"的历史使命。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被历史反复验证了的一条客观真理。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必须以新的思维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必须努力调整产业产品结构，都应当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惟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人民不断前进。

为实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号

召全党注意把握“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就要调整和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必须在全党牢固树立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坚持把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切实保护并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第一要务。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工人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农民阶级和其他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三是坚持把大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党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给经济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敏锐把握这一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在思想上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自觉性；在体制上要鼓励创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工作上要切实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快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

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①

先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同时也离不开精神、文化的发展。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反作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适应，文化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又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集中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即两个文明的积累和进步。因此，一个政党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推动历史进步还是阻碍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要看它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必然要使自己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党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核心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先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人的功底。缺少先进文化的功底，即使一时富裕了，也是昙花一现不会持久。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它包涵着思想道德和科学艺术两大部分。只有代表先进思想道德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观；只有代表先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前进方向，才能清除愚昧破除迷信，提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倡美学普及艺术，确立高品位的审美观人才观科技观，最终达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在继续完成前辈所没有完成的“治愚”的历史使命。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培育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又大胆吸收当代人类科技文明成果的精神文明，发展壮大东方优秀文化之根，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魂。唯其如此，党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全国人民向着新的目标迈进。

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要把握“四个必须”：一是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发展先进文化，指导思想要鲜明，要先进。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是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要保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质和正确方向，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二是必须坚持发展先进文化的正确方针，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作为根本任务。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先进文化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倡导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三是必须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正确的行为规范。要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四是必须把改造、抵制和吸收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必须借鉴外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进行文化创新，增强感召力。

③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它的规律不是自发地起作用，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活动来实现。人民群众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自己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要从历史规律实现的特殊性上理解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从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历史规律性和历史主体性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的结合上，深刻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申明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人也有个人利益，但这种利益必须融入党的事业存活于民众之中，因为任何执政者的利益都来自人民，没有人民的利益就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必要时还要牺牲个人利益。代表人民利益，最重要的是为人民争取更大的利益。不能把关心群众利益代表群众利益当作空洞口号，必须十分具体地落实到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上。创造财富赢得利益，是一个政党发展进步的最终目的，它比分配利益更为重要。如何分配利益体现着共产党人的利益观，如何赢得更大的利益，则体现着共产党人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经济建设，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共产党人的天职，也是党的先进性根本之所在。代表人民利益，涉及个人正当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涉及有关价值取向和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它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更是能否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党运用政权和政策的力量，扶正祛邪惩恶扬善，保护和支持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坚决打击并不断清除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因此，要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必须把人民的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个基本问题搞清楚，对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并不断为人民争取更大的利益。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就是要始终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执政，都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走向胜利，最根本的一

条就是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壤之中，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而不被困难和敌人所压倒的立党之本、力量之源和生命之基。但是，在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少数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颠倒了公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官念”强化，民心淡薄，当官混事，作威作福，有的甚至陷入腐败堕落的泥潭，在政治上变成为党的对立面。如不彻底铲除腐败这个毒瘤，确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所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在完成“治贪”的历史使命。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都要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要坚决同党内的腐败分子作长期不懈的斗争。惟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党和国家的政治本色，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为实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要正确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邓小平同志曾经用“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来强调党和人民不可分割。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巩固执政地位，才能无往而不胜。二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党的所有政策措施和工作，都

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要把最大多数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根本依据，自觉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忠实代表。三要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人走上了富裕之路。要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社会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党员干部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3.“三个代表”的辩证关系与重要意义

①“三个代表”的辩证关系

“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纵向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和实现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党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是否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来检验。

从横向看，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可以说，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灵魂和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主体和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

“三个代表”的着眼点在人民群众。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其主体推动力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要更好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之所以要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经典作品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与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坚持了贯穿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要求，赋予这些基本原理以新的思想内涵，更为鲜明、更为集中地揭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党的建设的各

个方面和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过程中的新概括、新创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②“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

(1)“三个代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发展史上，“三个代表”思想的概括是一种新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以往在界定党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时，比较多地强调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即比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论述。“三个代表”的概括，使我们对党的认识更加全面了，它不仅从政治方面，而且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全面地阐述党的任务和目标。

“三个代表”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它使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思路更加明确和清晰了。我们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三个方面去思考问题，去努力工作。虽然说，以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也曾涉及到党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人民群众的利益等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像江泽民这样，把三个方面的意思概括为三个命题，又把这三个命题连在一起作出一个论断，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的确是第一次。这是考虑党的建设问题的一种新的角度和新的高度。“三个代表”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逐渐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内涵的阐述中，我们既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坚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能体会到其中包含

着很多新的经验、新的理解、新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把它的基本原理和新的实际相结合，形成既有基本理论又有新的实践经验、既坚持解放思想又做到实事求是、既没有离开老祖宗又敢于说新话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论。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沿着邓小平理论的轨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新发展。这个思想为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提供了典范。

(2)“三个代表”为新时期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面对着许许多多重大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故党的建设与新的实际要求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更清楚一些、理论更系统一些。然而，同党在新世纪肩负的历史重任和面对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目前党的建设的现状还不完全适应，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甚至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腐败变质。这些问题的滋生与蔓延，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怎样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指针。在新世纪，党的建设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二是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在着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先后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

风教育；坚决贯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农村干部中开展“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等等。这些措施，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更加巩固和坚强，不断增强应对任何风险考验的能力。

(3)“三个代表”将保障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与20世纪相比，21世纪具有许多新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要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要在21世纪前50年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更艰巨，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需要艰苦努力。对中国在新世纪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江泽民作出了一系列十分深刻的预见，从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在新世纪肩负的时代重任和面临的风险挑战，有着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

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宏伟目标。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未来很长时期它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靠不断深化改革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世纪，发展任务很重。这包括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运用科技革命成果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搞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继续扩大对外开

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实现这些任务既有难度又有风险，具有很大的艰巨性、挑战性。新中国5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成功地带领人民经受考验和挑战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展望未来，用“三个代表”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世纪将要面对的各种考验和挑战，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应对能力，完全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经受住任何风险的考验和挑战，达到既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五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背景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代工业极其微小，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人口众多，80%以上是农民。要把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也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性的社会工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发生过重大失误。

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运用唯物辩证法，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八大所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未能

坚持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又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二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从1956年到1958年农村实现了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三级跳”。三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急于求成。发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重大损失。1966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偏离了经济建设的轨道，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纵观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既有成绩又有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社会局势。主要表现为：

(1) 国家政治生活中家长制现象严重，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盛行，官僚主义泛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2) 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落后。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国民经济处于徘徊甚至停滞状态。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78年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78年只占日本的1/4。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水平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20年甚至更长，“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①] 在农村还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即使在受教育的人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要占70%以上，真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只占总人口的0.6%。

(3) 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体现，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村生活水平长期以来没有多大提高。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从73元增长到133.60元，平均年增长不到3元，一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也仅从235元增加到316元，平均年增长不到4元，商品匮乏，各种票证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护身符，社会主义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疑问不断增多。

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局势，邓小平指出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②]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③]

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在已经进行半年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全会的胜利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起点，中国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 改革的初始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

这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984年9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高潮首先从农村兴起，而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也在农村。当时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举，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曾在部分地方实行过，随后被作为“资本主义”受到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重新提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要求，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到1984年，全国569万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联产承包。与此同时，从1979年开始，国家陆续提高了农产品价格，逐步调整了农产品购销政策，这就进一步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这里所说的统分结合，家庭联产承包是统分结合中的“分”的层次，各种服务体系合作社、供销社和乡镇企业是“统”的层次。这种体制，既保证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是“统”的部分还是“分”的部分，都是不

同层次的集体经济。这里所说的“双层经营”，是指集体经济和劳动者自主经营。这样一来，8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在这一阶段，城市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改革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7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崭新试验。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把“坚持对外开放”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措施之一规定下来。1984年4月，又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形成完整的对外开放格局方面迈上了新的步伐。

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理论探索的最重要成果集中体现在1980年9月邓小平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讲话指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都统管统揽起来的过分集权的体制，它的主要弊端是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阐明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目的、任务和方针。这篇讲话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篇指导性文献。在实践方面，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制定了1982年宪法等多部法律；加强党的集体领导，1980年设立中央书记处，1982年增设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精简党政机构，

仅1981—1982年间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就裁并了2/5，同时从1982年起推行国家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从1981年起进行县级直接选举，等等。

2. 改革的继续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城市

这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谈话（1984年10月—1991年12月）。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从此，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改革逐步全面推开，进行了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物资、商业、外贸、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改革，股份制等也开始试验。与此同时农村改革也进入了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为中心的新阶段。从1985年开始，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把许多农产品放开经营，结束了延续30多年的统派统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及完善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这些改革使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又有新进展。1985年，国家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7年决定海南建省并作为经济特区，1991年又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逐步推开的对外开放格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拓展，这一阶段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85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了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决定，把这些领域的工作也推入了全面改

革的热潮中。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且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有新的探索和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与开放）”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还深入地阐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1989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之后，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等，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东欧、苏联连续发生剧变，西方加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由于受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曾经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调整了党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3. 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向纵深发展

这一阶段是从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谈话开始的。1992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会议一致赞成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改革；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四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加快步伐的历史新阶段。改革由过去侧重于突破旧体制转向侧重建立新体制，由改革调整转向制度创新，由单向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由重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对外开放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为适应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93年9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同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9月，又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5年9月召开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前进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都为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步骤向前发展。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时期，改革开放的成就，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1. 中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所决定的。经过近 20 年的改革，在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1993 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 48.3%，集体工业占 38.2%，个体、私营、外资工业占 13.5%；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占 41.3%，集体商业占 27.9%，合营、个体和私营商业占 30.8%。公有制经济，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说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是我们提倡和鼓励的。非公有制经济现在不能只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正在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向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转变。扩大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了一大批企业集团。推进了企业的兼并、租赁和拍卖，进行了转变经

营机制的深层次改革。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股份制试点，各类股份制试点企业已达 1.15 万户，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在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此外，价格形成机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各类零售和批发商品市场得到大力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技术和信息市场等）正在积极培育；80%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85%以上的农产品价格和95%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已经放开，生产要素价格正处在市场化过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由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调控转变。在工业总产值中，1978 年以前指令性计划占 95%以上，1997 年减少到 5%，国家统一分配的生产资料和计划收购的商品也大大减少；随着计划、投资、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税率、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已经逐渐成大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初步形成，并开始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职工报酬与个人劳动贡献挂钩的办法；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近 20 多年的改革，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和购销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已从 1978 年的 3 亿吨增加到 1993 年的 4.56 亿吨，1997 年已达到 4.925 亿吨，用占世界 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 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到 1993 年底，农村兴办了 2321 万家乡镇企业，吸纳了 1.1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1997 年则

为1.4亿。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标志值，1978—1997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自1993年实行紧缩性宏观调控至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1.7%，1997年则为8.8%。从1993年—199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11%，这一速度与世界同期平均3%左右的经济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7.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8.8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7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1997—2001年我国平均增长率是8%，仍居世界第一。难能可贵的是，在我国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均衡，实现了高增长率与低通货膨胀并行，克服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经济增长伴随高通货膨胀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看，我国通货膨胀率平均低于经济增长率，即使是通货膨胀最高的年份1994年，通货膨胀率也仅在23%左右，1995年便回落到15%左右，1996年进一步回落到6%左右，1997年再降到3%左右，从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我国的经济总量，根据世界银行三年调整汇率方法计算，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居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十位，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8%和8.7%；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西班牙、加拿大和巴西，居世界第七，分别占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2.5%和12.9%；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七，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逐步缩小。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粮食、棉花、油菜籽、肉类、煤、布、水泥和电视机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和化肥产量跃

居世界第二，特别是钢产量1996年首次突破1亿吨，1997年继续保持1亿吨以上，跃居世界首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1993年同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由28.4%下降到21.2%，第二产业由48.6%上升至51.8%，第三产业由23%上升到27%，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有较大发展。1993—1997年铁路正线铺轨总里程11344公里，高速公路增加4083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1.1亿门。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京九、南昆铁路全线投入运营，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顺利截流，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3. 形成了对外开放新格局，外经外贸取得突出成果

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基本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全国对外开放的市县已超过1100个；开放领域已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展；投资的软硬环境都有所改进，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体系和涉外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对外贸易取得可喜成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958亿美元，增长8.5倍，平均每年递增16.2%；199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到世界第11位；中国的进出口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成为世界上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又有进一步发展，199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251亿美元，位居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香港、加拿大和荷兰之后的世界第十位。中国吸收和利用外资增势强劲。1979—1993年，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万个，外商实际投资639亿美元，仅1993年就新批准外商投资项8.3万个，实际利用外资257.6亿美元。到了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640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64%，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53亿美元，增长65%。中国吸引外国长期资本一直居发展中国家前列，1993

年以来吸收外国资本总额一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993年以来，随着进出口贸易平衡状况的改善，中国外汇储备保持强劲上升势头。到199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10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199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399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122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二位。经过改革，中国对外开放已由过去的单向引进转向双向交流。中国鼓励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办企业。1993年，中国境外设立企业已有4497家，中方共投资51.6亿美元，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基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

改革开放20多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多年。据测算，目前我国居民已走过4/5的小康生活之路，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其中城市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90分；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达81.5分。绝大多数人已摆脱了贫困局面。

我们都清楚，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4元，城镇职工人均工资只有615元。到1993年则分别增加到921元和323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分别增长7%和5%。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元，年均实际增长5.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60元，年均实际增长6%。市场商品丰富多采，居民的衣、食、住、用、行条件明显改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10.3%，城乡居民人均粮食、肉类、蛋类等消费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拥有的家用电器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家庭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5%以上。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8.7平方米，农村由8.1平方米增加到22平方米。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46280亿元。全国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7年的5000万，贫困地区的生产

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此外，全国初步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逐步扩大，372 个城市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93—1997 年中有 3000 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四、改革前进中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已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前进中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又面对着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因此，中国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

1. 老问题解决后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旧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被打破之后，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呼唤和调动起来，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悬殊、地区差距拉大的问题在发展。因劳动态度、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差距是合理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出现的等量劳动投入的收益差距显著，不同地区行业、职业的收入差别大，特别是各种非法收入造成一部分人暴富以及贪污腐败蔓延、走私活动猖撅，既破坏正常经济秩序，又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的稳定，是需要重视解决的。二是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待业、失业就业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问题。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毒瘤，各国政府都非常害怕其发展。中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远不如西方健全，使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市场机制鼓励竞争、激励进取，解决了社会前进的动力机制问题。但是在市场机制下必然会有弱者、失败者，对他们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措施和制度来保障其基本生活，即社会缺少平衡机制，这个社会就难以稳定。如果只重视运用市场机制，而容许社会保障机制长期滞后，真正健康的市场机制也建立不起来。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已成我国的当务之急。三

是道德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流动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犯罪问题等等，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亟待解决。

2. 还存在不少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现在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尖锐，资产流失的数量惊人，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二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之后，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已积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这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增加了改革的难度。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中国原有的问题如资源、人口、粮食、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现代化变得更突出了。中国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而言是贫乏的，节水、节能、节约各种资源是一件大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随着出现了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还有如何渡过人口老龄化这一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粮食生产始终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而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粮食未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格局，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抗灾能力下降，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进一步强化，加入 WTO 后对我国农业更将产生巨大冲击，这使我们更需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害国家，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每年达 1000 亿元左右，这表明中国环境质量较低、稳定性较差。经济发展、人为破坏自然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如果仍按目前的污染程度、资源消费的速度走下去，不必说后代子孙，就是我们这一两代人都难以生存下去。

4. 国际经济融合带来新挑战。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经济联系和合作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既为我国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正在改变着传统产业和传统生产方式。这既为我们发挥后起优势、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存在

着我国科学技术与国际水平差距拉大的可能。国际金融进一步活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同时金融风险对各国经济的冲击也随之增大。

总之，从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但总的说来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尽管前进中还会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21世纪必将是中国更加繁荣昌盛的世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取得更大成就的世纪。

第五章　朝、越、老、古的社会主义

本章描述的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四国：朝鲜、越南、老挝、与古巴。

朝鲜自1953年起在金日成的领导下进行“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金正日继续领导人民走朝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政治上过度集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越南自1976年全国统一后即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1986年起实行全面改革。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后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越南自我定义为现处于“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初级阶段”。

老挝自1975年全国解放后即着手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1986年后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苏联东欧剧变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我定义为现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

古巴自1965年成立共产党后即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苏联东欧剧变后顶住苏东解体、美国高压封锁的双重打击，向中国、越南学习，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节　朝鲜的社会主义

朝鲜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在金日成的领导下进行

“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1994 年金日成逝世后，金正日继续领导人民走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与对领袖的尽忠尽孝。世纪之交又开拓外交新局面，与中国、俄罗斯、美国进行交流访问，并着手与韩国共筹统一大业。

一、朝鲜的概况

朝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古国。1910 年 8 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从 30 年代起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为打击日本，1945 年 8 月、9 月美、苏军队分别进入朝鲜。美国提出，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38 度线以北的日军由苏联受降，以南由美军受降。1948 年 12 月、1949 年 6 月苏、美军队相继撤离。1948 年 8 月，在美国的策划下，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1948 年 9 月 9 日，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民主义共和国成立。

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半部，面积 12.2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2300 万。境内多山，矿物资源丰富多达 200 多种，首都平壤有人口 122 多万。

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巨大的成就。朝鲜工农业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如 1978—1984 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12.2%。农业实现了电气化和水利化，机械化和化学化也有很大进展。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逐年增加。如 1975 年为 1000 多美元，1979 年为 1920 美元，1986 年达到 2400 美元。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进展。解放前 80% 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学校只有中小学，连一所大学也没有。目前有 280 多所大专院校。1959 年起实行全民免费教育，1957 年起实行 11 年制义务教育。全国知识分子有 180 多万。其中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约 20 多万人。1953 年起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人民健康

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8岁提高到74岁。

目前，朝鲜人民在金正日的领导下，继续执行“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纲领路线，坚持“主体的社会主义”，为建设有独特的“朝鲜式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

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金日成的“主体思想”。

1. 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形成

1955年底，金日成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要克服思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时，第一次提出要树立“主体”的问题。他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创造性的学说。10年以后，1965年4月，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出“主体思想”的概念。他说，树立主体，即独立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1970年劳动党五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把主体思想定义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1980年10月劳动党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方针”。

自70年代以来，金日成强调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主的哲学”。在1972年9月，金日成答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问时说：“主体思想就是认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是主体思想的基础”，“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这就是主体思想的要求”。1981年10月，金日成在答加纳政府机关报《加纳时报》总编辑问时又说，“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主的哲学”。1982年6月，金日成在答外国通讯社社长问时进一步表达了主体思想的内涵，即要求劳动人民群众应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和建设，思想上树立主

体，实现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和国防上自卫。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一切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政治自立、经济自主和国防自立。

2. 金正日对“主体思想”的进一步阐述

1976年，金正日在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到，“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成来看，金日成主义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他把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定义为金日成主义。1986年7月，金日成在《主体思想教育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把人放在世界的主人地位上阐明世界的本质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世界观。”1996年7月26日，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杂志《劳动者》上发表谈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崭新地提了出来。”

可见，金正日把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定义为金日成主义，同时认为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以人为本，从而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3. 金日成“主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思想上的主体。金日成强调“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是主体思想的基础”。一切从人出发，则人民群众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开创自己命运的力量也在于自己本身。于是，金日成要求朝鲜人民从“人”出发，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他国经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2) 政治上自主。金日成说，坚持自主立场最重要的是坚定

地保障政治上的自主性。他还强调，一个民族要做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就必须拥有自主的政权，坚定地保障政治上的自主性。为此，金日成要求独立自主地制定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别人干涉。

(3) 经济上自立。金日成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性，就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也不能从物质上保障他们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立场。因此，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奉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以经济自立来保证政治独立。

(4) 国防上自卫。金日成指出，国防上的自卫路线是自主的独立国家必不可少的要求。因此，朝鲜的国防建设要贯彻执行党的自卫军事路线，即做到："全军干部化，全军现代化，全民武装化，全国要军事化"。

三、苏东剧变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朝鲜战争结束后，从1953年到1956年，朝鲜进入经济恢复时期，从1957年起开展全面社会义建设。到1994年金日成逝世，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进行了以下社会主义实践。

1. 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上，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面，并在建设中重视经济上的自立。

朝党在1958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就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完全消灭，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主要力量放在经济建设上面。金日成强调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促进经济建设是工人阶级的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朝党从未发动过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非常重视保卫和安全工作，为经济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建设中，重视建立"自立经济"，强调自力更生，但也大力争取外援，注重与它国"互通有无"。他们认为，不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就不可能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是，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技术、资

源、自己的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同时，他们认为，用自己的力量发展自立的民族经济，绝不意味着拒绝国际经济交往，因而他们采取了一些对外开放的措施。1984 年 9 月，朝鲜公布了《合资经营法》，鼓励外商到朝鲜投资设厂。1991 年 12 月，朝鲜还开设了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总面积最后扩至 746 平方公里。

2. 在经济体制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从而采用了“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

1971 年 10 月，金正日在《加强党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离开了计划，经济在无法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有计划地发展”。1992 年 1 月，金正日又进一步记述了国家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和发挥企业的创造性的关系问题，认为两者不应当对立而应当协调。在管理中，实行过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方法。在工业管理上实行“大安工作体系”，即在企业中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总工程师各司其职的工作体系。随后朝鲜还不断改善工业领导体系，实行中央与地产分权等等改善。在农业领导体系方面，建立领导农业的专门机构“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用企业方式领导农业，推行分组管理制。为进一步加强集中制和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从 1964 年起，实行计划一元化和细部化，这实质上即是过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3. 所有制结构方向，着意于向更“大”更“公”方向过渡，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革命，为此他着意于所有制方面的“大”与“公”。1958 年完成农业合作化，1962 年把合作社改为合作农场，1964 年提出了使集体所有逐步转变为全民所有的任务，1986 年又多次指示要在近年内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1994 年，姜成山总

理说朝鲜正在使所有合作农场向大规模的全民所有制农场发展。为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朝鲜大力开展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50年代起掀起了以技术革新同教育人民相结合的“千里马”的运动；7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即对完成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任务成绩卓著者授予“三大革命红旗”，这一运动将一直进行到建成共产主义。为完成三大革命，又从73年起开展“三大革命小组运动”。即由党中央组织派遣由干部、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三大革命小组轮流到基层企业去推进三大革命。这一运动仍在进行。

4. 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以农、轻、重为顺序安排国民生产，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从60年代起，朝鲜就提出了“农业第一主义”，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攻方向之一。多年来，农业基础建设的投资额逐年增加，农业的技术革命也在不断深入发展，全党全民重视为农业，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发智力资源。每年用于教育的费用占国家总支出的18%左右。70年代在全国普及“11年义务教育”，当前还在普及高等教育，力争实现“全社会知识分子化”。同时尊重教师，在各方面为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条件。

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是由于长期坚持持续高速增长战略，导致计划指标过高，基本战线过长；二是农、重、轻工业之间比例不当，人民生活必需品不够丰富多样，某些消费品甚至供应紧张；三是过分强调用大突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生产，从而打乱了正常生产秩序，留下很多后遗症；四是权力过分集中，人民民主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苏联东欧剧变后的朝鲜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1993年12月朝鲜劳动党第六届

二十一中全会认为朝鲜进入了“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和尖锐的时期”。国际反共势力企图趁机搞垮朝鲜，加强了对朝鲜的渗透和“和平演变”措施；1994 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不幸逝世；连续几年的灾害造成农业歉收粮食不够吃。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朝鲜依然坚定地走“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 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坚持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并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要求。

1990 年 5 月，金日成对东欧变革发表看法，认为帝国主义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人民的社会主义事遭到了严重挑衅，但这是暂时的退却。形势越复杂，反动派的攻势越疯狂，革命人民就要坚持革命原则，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前进。1992 年金日成对苏东解体进行总结，认为苏东解体的原因是：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困难时动摇了社会主义立场，接受资本主义的全套东西；社会主义与“多元化”是势不两立的，引进“多元化”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无秩序；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以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为中心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社会主义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基础。他认为，朝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巩固和不可战胜，是因为她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后的几年，为进一步巩固朝鲜式的社会主义，金日成对全党全国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工人阶级要忠实地拥护党的领导；二是对领袖要尽忠尽孝，认为领袖是以科学理论和战略技术引导人民群众走向胜利的中心；三是要克服干部的霸道和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干部树立为人民大众忠实服务的风气，清正廉洁，成为群众的楷模与表率；四是要更牢固地树立主体思想，坚持主体立场。

2. 在国际形势剧变、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对经济

建设作了一些调整。

进入9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与国际社会主义市场的减失，朝鲜经济情况恶化，粮食供应紧张，能源、原材料短缺，工厂开工不足。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朝鲜在大政方针不变的前提下，经济政策作了些许调整。

(1) 在农村改进“分组管理制”。首先是降低了国家给分组的计划指标；其次是缩小了分组的规模；再次是“以量计工”代替原来的“按时计工”。

(2) 逐步活跃农贸市场。一是扩大农贸市场的规模，二是允许粮食等农轻产品进入农贸市场，三是允许小集体单位设立自己的摊位等。

(3) 采取进一步对外开放措施。首先将罗津、先锋的经济贸易区扩大到清津地区，并提高其地位；其次是对自由经济贸易区的放权让利。如区内的生产、价格等由外商自由决定，降低外商所得税；再次是作出决定任何单位皆可从事外贸活动，只要对国家有利，政府就将提供方便。

3. 加强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抵制西方的思想文化渗透和“和平演变”。

朝鲜一贯重视党的领导，苏东剧变后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全党在主体思想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团结，要求干部加强自身革命化，经常到群众当中去进行政治工作，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干部每年要到培养机关学习一个月，每周举行一次报告会和集体学习。

1991年5月，金正日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要抵制西方的渗透和演变。而抵制的措施是深化思想教育，把全国人民培养成立体型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此外，加强党员和群众的组织生活，所有劳动人民都参加一定组织，过严格的组织生活。

目前，朝鲜人民以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在劳动党的领导下，沿着主体的社会主义——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五、小　结

1. 金日成、金正日领导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创新发展。

(1) 在哲学上，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原理。认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

(2) 在社会主义理论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是比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的工作更为重要的首要任务。认为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人的自主性”，摆脱种种奴役，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过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

2. 朝鲜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独特特点是高度过度集权，要求全国对领袖尽忠尽孝，全党以领袖为中心团结起来。

3. 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

第二节　越南的社会主义

越南北方自 1958 年起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时期，1976 年全国统一后，即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70—80 年代，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与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使国家陷入困难和危机，1986 年起实行全面改革。苏联东欧剧变后顶住了内外冲击和压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越南自我定义为现在处于“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初级阶段”。

一、越南的概况

越南位于印支半岛东部，面积 32.96 万平方公里，人口 7600 万。越南历史悠久，公元 10 世纪开始建立国家。19 世纪中叶法国入侵，1884 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40 年被日本侵占，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反日武装斗争。1945 年 8

月19日，越南人民举行了八月革命。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同年9月27日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进行了9年抗法战争。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按《日内瓦协议》越南被分为南北两方。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在南方扶植西贡傀儡政权。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开展抗美救国战争，迫使美国在1973年1月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撤离南方。1975年越南人民打败了美国扶植的南方傀儡政权。1976年全国统一，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6年全国统一后，越南共产党黎笋集团又追随苏联穷兵黩武，试图建立一个以越南为明主的“印度支那联邦”，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在中越边境进行侵略挑衅活动。人民不能休养生息，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1986年越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确立了“革新开放”方针。1991年越共七大坚持并完善了革新路线，采取一系列深化革新开放的措施和步骤。1996年6月越共召开八大，在全面总结10年革新开放的基础上确定跨世纪的战略目标；宣布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为工业化准备前提”的任务基本完成，将进入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时期；规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990年的8倍到10倍，争取2020年把越南建成一个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工业国家。2001年4月越共九大总结15年革新开放成就，并确立了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2001年12月国会会议决定在宪法前言中增加“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越南经济连续稳定增长。90年代年均增长率在8%以上，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7.1%，2002年将为6.7%，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农业多年连续丰收，由一个长期缺粮大国变成世界第二位的大米出口国。对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广交朋友，现为东盟成员国。2002年与中国加强“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目前，越南人民在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和国家主席陈德良的

领导下，逐步迈向社会主义。

二、越南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

自1976年统一后至苏联解体，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76—1986年黎笋集团领导时期，在计划经济中的框架内进行小改小革。

76年统一后，越共当时的领导人黎笋认为越南已进入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迅速“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方针。76年12月，越共召开四大，主张尽快取消多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经济，马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国营经济，否认商品生产规律，决意要在5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决定争取在约20年内（即到1996年）基本完成越南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即结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对这一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犯了违反客观规律、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致使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了深重危机。农业连年减产，城乡广大人民的口粮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战前。于是，自1979年四届六中全会后，越南被迫采取“放宽”政策，通过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农业上，提高谷物收购价格，放慢集体化步伐，逐步推行最终产品承包制，强调按劳取酬等。工业上，全面实行计划工资制，扩大工厂、企业和地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逐步克服官僚管理体制，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等。政策放宽后，农业和小工业、手工业部门以及某些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的生产情况有所好转，但管理混乱、通货膨胀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于是1983年又采取经济上的“收缩政策”，即严格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严禁粮食自由买卖，严格控制企业生产，大量发行公债等。但“收缩”无济于事，经济严重恶化，于是在1984年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新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尤其是财政上，

实行鼓励企业自我经营等等“松绑政策”。1985年还在全国进行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但又造成商品供应奇缺，市场物价猛涨。198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74.7%，有几百万人失业，加深了经济和社会危机。

2.1987—1991年阮文灵、杜梅领导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1986年越共召开六大，大会对越南11年来越南经济问题进行检讨。并在会后制订新的内外政策。具体为：(1) 承认越共长期以来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超越阶段，急于在过渡时期初级阶段即实现社会主义的许多目标，是既“左”倾、又右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2) 明确越南仍处于“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大会指出，越南是从小生产起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所以越南的过渡时期是长期而充满困难的。目前处于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为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3) 会后越共对内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对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和实行全面革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外，开始奉行“广交友、少树敌”的政策，以从柬撤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为契机，逐步改善同中国、东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991年6月越共召开七大，杜梅接替阮文灵出任总书记。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过渡时期结束后，越南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七大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和《2000年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战略》，确定2000年前战略总目标是：摆脱危机，努力奋斗以摆脱贫困、不发达国家的状态，为国家在21世纪初有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七大后，采取了一系列深化革新开放的步骤和措施。1991

年11月，越南同中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越南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越南造成巨大冲击。越南共产党在杜梅、黎可漂的领导下，顶住压力，继续高举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的旗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面革新路线，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1. 顶住冲击，坚持社会主义

1976年全国统一后，越南同苏联东欧保持着密切关系。1978年6月加入经互会，在经济建设中长期依赖苏联东欧。1978年越苏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82年越共五大政治报告称“苏联是越南的最强大最可靠的盟友”。苏东剧变前，越南平均每年从苏联获得近10亿卢布的援助。因此，苏东剧变给越南造成巨大冲击，党内外思想一度混乱，政治上有人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经济上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与苏东大部分传统市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加紧了对越南的“和平演变”活动。

为此，必须顶住压力、澄清思想。越党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阐明越共对苏东剧变的看法。认为苏东剧变是偏离了马列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并不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对社会主义教条观念的错误造成的。因此，越共牢牢把握革新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理想、坚持马列主义等五项原则，并在1992年颁布的新宪法中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全社会的领导地位”。

2. 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

苏东剧变前，越南实行的是不彻底的包产到户承包制。剧变后，越南加大农业革新力度。如实行耕地承包到户，并颁布《土地法》，允许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出租权、继承权、转让权和作为向银行贷款抵押权。1993年越共七届五中全会还做出了

《关于继续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决议》，指出“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是越南革命各个时期的战略问题。

到了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按照工业化、现代化和合作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工农业和农村，并制订了如下主要措施：一是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大力开发农村工业、小手工业和第三产业；二是大力解决农产品销售市场问题；三是大力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形式。

目前，越南正致力于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发展专业化的家庭农场，同时致力于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越南的农业改革还在继续深入进行。

3. 加大工业企业改革力度

苏东剧变后，越南实行的是“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的国家管理企业的方法，国营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好。1986—1990年间，国营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4%，企业开工率仅为30%—40%，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

剧变后，越南加大了工业企业改革力度。1995年通过了《国营企业法》，并下达了企业重组方案。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对国营企业进行重新安排。保证国营企业生产经营有效益，关键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要占主导地位，扩大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二，采取必要措施正确处理好所有权与使用权、国家与企业、经理厂长与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对部分中小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化试点，成立股份企业、股份公司。第四，大力发展由国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组成的多种合作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1996年越共八大把国家的经济体制正式归纳为“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提出现在已进入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时期，强调国有经济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并确定2020年前国企改革的目标。特别是1997年八届四中全会作出深化企业改革的决定，重点在于重新部署国营企业。

一是确定必须保持国家独资的、国家必须控股的和国家只需占有低额股份的企业目录；二是对国家不必占有100%资金的企业，应制定实行股份制的计划；三是对于拥有10亿盾以下资产、长期经营亏损而不必维持国家所有制的小型企业，采用各种适宜的处理形式，如合并、公开招标租赁、承包经营或变卖；四是实行破产法所得收入首先用于解决就业问题。经过调整改革，越南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54.7%，由从前的12300家减少到目前的约5570家，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提高。

到了2001年4月越共九大重申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成分的、按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其中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并委任农德孟为新总书记。2001年8月越共九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越共经济路线中的一个很重大、很基本的问题。为此，九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决调整国有企业的结构，并拟定了从2001年至2005年的五年时间内越南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现有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革新国有企业的工作，明确划定各种国有企业类型，以便制定适合的相关政策和方案。对于100%国家资金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度；基本完成不需保持100%国家资金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工作；健全和提高国家总公司的活动效益，组成一些强大的经济集团；形成配套的法律框架，为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活动创造平等的经营环境，等等。

目前，越南国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技术设备落后，管理水平低，企业经济效益差，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尚未真起到主导作用，企业股份化遇到许多困难。目前改革要走的路还很长，相信在越共的领导下一定能闯出自己的路来。

4. 加强政体改革力度，重视精神文化建设

1986年越共六大开始全面革新开放。其经济体制的目标模

式是："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商品经济"，1996 年八大正式归纳为"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与经济体制革新的同时，越南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精神文化建设。

从 1986 年起，越共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探索。七大后，越共加大了改革力度。到 1996 年八大越共把 10 年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归纳为 3 条。一是强调党的正确领导在于胜利实现经济改革，二是强调政体改革要稳妥慎重，三是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并重申不搞多元化、多党制。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第一，重视党建工作，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第二，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改革国家机构；第三，重视革新和提高国会的立法工作质量，加强国会对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的最高监察；第四，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党要统一领导干部工作和管理干部队伍；第五，积极进行反腐败斗争。在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一些党政干部腐化堕落贪污受贿，人民群众斥之为"国难"、"国祸"，严重影响党的威信。为此越共把反腐斗争当作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从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加强斗争力度，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了许多具体防范惩治措施。

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狠抓精神文化建设。越南革新开放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文化精神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越来越严重。为此，越南加强了精神文化建设。1995 年，越南陆续颁布了《关于加强对文化和文化服务业的管理，严厉打击和清除严重社会弊端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措施，严打不法行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1998 年 7 月，越共召开八届五全会，专门讨论了关于"建设和发展先进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越南文化"问题，全会提出了今后建设和发展文化的具体任务是：培养品德高尚的越南人；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发展科教文化艺术事业；保存和发展文化遗产，发展

和管理好大众传媒系统；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实行宗教文化政策；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建立和完善文化体制；等等。提出从现在到2000年及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心任务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每个家庭中建设健康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竞赛运动。

四、小　结

越南的社会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越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革则是以中国的改革为楷模的。

(2) 越南的社会主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把人从不公正中解放出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做到既有温饱、幸福的生活，又有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

(3) 越南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革新，革新是多方面的，但以经济革新为重心；强调“改革而不改色”。

(4) 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但强调计划在宏观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市场既是计划的依据，又是计划的对象，计划主要起决定方向的作用。

(5) 所有制结构方面主张多种经济所有制，目前存在5种经济成份：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和小业主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强调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目前实施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

第三节　老挝的社会主义

老挝自1975年全国解放后，着手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由于急躁冒进的过激政策导致国家经济建设的困难。自1986年后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苏联东欧剧变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我定义为：现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

一、老挝的概况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位于印支半岛北部，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90万。老挝建于公元749年，近代长期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统治。189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日本侵占老挝，老挝人民奋起抗日。1945年8月武装起义获胜。10月12日宣布独立，成立了以佩差拉和苏发努玛为首的临时政府。1946年3月再度被法国占领，临时独立政府解体。1954年美国取代法国在老挝扶殖亲美势力。

早在30年代老挝的革命者就加入了印度支部共产党。1951年2月，印支3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党。1955年3月老挝人民党宣告成立。1972年改称老挝人民革命党。该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1975年10月公开），党的线路、方针、政策通过其领导的公开的统战组织——老挝爱国战线贯彻执行。1972年老挝爱国战线领导的武装力量已解放了全国3/4地区1/2人口。1975年5月在柬埔寨、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相继取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老挝人民建立了各级革命政权。同年12月，老挝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老挝人民革命党公开执政。1977年2月老挝总理、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宣布“老挝已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开创了走向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认为“老挝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于是，老挝以越南为楷模，从1976年起，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在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政策过激，脱离老挝实际，造成经济停滞和下降。1979年11月党的二届七中全会对经济工作的失误进行反思，随后进行调整和放宽政策。1986年11月党的四大，明确老挝革命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目前仍处于“向社会义过渡的初级阶段”，从而提出了“革新

开放”的方针。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一些革新。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解体给老挝造成较大冲击。但老挝党顶住了内外压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96年3月老挝党召开六大，重申继续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并制定了2020年前的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方针及具体任务，提出2020年基本摆脱不发达状态。2001年3月党的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人民生活增加3倍的目标，对摆脱落后局面充满信心。

目前，老挝人民在国家主席坎代·西潘敦的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二、老挝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

1975年12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即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迄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时，老挝的社会主义实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1976—1979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全国解放后，老挝党认为老挝已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开创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老挝把苏联视作楷模，着重变革生产关系，大抓社会主义改造，急于实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开展了生产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思想主文化革命的三大革命运动，具体做法是：

(1) 对原王国政府控制区的私营工厂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合营时，政府不投资，却硬性规定要占51%股份，加上有些企业领导不懂经济，不善经营管理，致使工厂企业年年亏损。对私营商业则推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严格限制私商的经营活动和范围，规定私商销售的商品必须从国营商店进货，禁止私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等，严重损伤了私商的积极性。

(2) 在农村实行余粮征购，推行合作化运动。规定农民的余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否则将被没收。1976 年 9 月还公布《农业税条例》，实行“少产少征，多产多征”，大大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 年 5 月，又在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规定到 1980 年底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并采取种种办法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民入社。

(3) 实行极左的统战政策，对数以万计旧军政人员，包括在 1975 年 8 月老挝党开展夺权斗争时曾宣布起义、支持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一些人，也不加区别地统统送往北部山区老根据地去改造。

上述政策脱离了老挝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造成严重后果。工厂主、私商纷纷外逃，资金大量外流。工厂被迫停产或开工不足，商品匮乏物价飞涨，农民纷纷要求退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加上连年遭灾，三年内全国粮食总产量均低于建国前，使老挝经济陷入困境。

2.1979—1990 年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改革时期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老挝党重新认识本国国情。1979 年 11 月，党的总书记凯山在答外国记者问时指出，老挝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老挝存在着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党的五大上他把这一时期的失误概括为两点：一是照抄外国模式，二是没有独立自立。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取消非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为此，老挝党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放宽政策。如停止强令推广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放弃消灭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生产。1984 年起还解散一些农业合作社，试行承包制。1985 年还颁布《国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开始改革试点。这些调整虽未从根本上改变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观念，但却使老挝经济恢复和发展。

1986 年起老挝进入了“革新开放”的阶段。1986 年 11 月老

挝人民革命党召开四大，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上存在主观、急躁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过分集中、官僚、统包和不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等问题。为此，要革新开放。会后，革新开放在全国逐步展开。在农村推广家庭承包制，在城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1989年1月党的四届七中全会召开，凯山总书记发表讲话，认为老挝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0%，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起点很低，目前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老挝仍处于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为此，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把老挝的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1990年3月政府又作出了关于把国营企业转为其它所有制形式的决定。

1991年3月老挝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重申四届七中关于老挝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论述，重申四届八中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六项原则。随后，将上述写入同年8月颁布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还规定：“国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在生产经营中相互竞争和合作，各种经济成份在法律面前平等”。并将建国后长期使用的政治口号，“将老挝建设成为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改为“繁荣昌盛”，把国徽图案中的五角星、镰刀、斧子改为老挝民族的象征——塔銮佛塔。

自86年以来的革新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86—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8%。

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老挝

苏联东欧的剧变对老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党内一度出现思想混乱，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有的人甚主张多党制并酝酿成立反对党。流亡国外的反政府武装趁机回国进行武装骚乱，原苏联东欧国家纷纷停止了对老挝的经济军事援助。面对上述严峻

趋势，老挝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全党认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 统一全党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既定目标

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老挝党认为是其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放松政治思想工作、经济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从面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目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但一定能克服困难重新获得发展。他们表示，无论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困难，世界趋势还会发生多么复杂的变化，老挝决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他们还表示，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得逞后，必定把矛头对准中、越、老、朝、古等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

老挝领导人除一再重申六项原则外，又强调了五个观点，即：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上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本质没有改变，改革是客观需要，坚定社会主义目标，加强思想教育、内部团结和思想统一。

到了1996年六大，更进一步强调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以便真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反对多党制、多元化思想。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强调以马列主义道路原则作为党的思想基础，但要根据本国具体条件运用各国经验，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2. 继续革新开放，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苏东剧变前，老挝已经对原有的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革。苏东剧变后，他们继续革新开放，主要有三：

（1）经济管理体制由中央集中计划，转变为国家指导性计划和宏观调控，让企业根据市场机制和市场供需规律自主经营。

（2）在所有制结构的革新上，除电力、邮政、自来水、公路桥梁建设等骨干企业外的国营企业，通过承包租赁、合资、股份制等不同形式，由公有制转向其它所有制。

(3) 继续贯彻“三多一平等”的经济结构，即：多种所有制成份、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组织形式长期并存的方针，各种经济成份依照市场机制在国家管理下开展活动，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注意巩固发展国营经济并使之在某些部门起骨干作用。

(4) 在农村，鼓励扩大承包作用，并向土地法人颁布土地证，规定“保护农民长期享有土地使用权，继承权和转让权”。此外，还号召建立农业与工业手工业服务业相结合的新型经济结构。

这些年来，老挝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如1990—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7%，1996—2001年为6.2%；人均收入在近6年内以年均3.8%的增长率在增长。对外关系扩大，建交国扩至104个，社会安定政局稳定，群众生活有所改善。

3. 加强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老挝人民革命党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强调不断加强政治建设。加强政治建设主要有三：

(1) 首先是加强思想教育，反对多党制思潮和自由化倾向，警惕西方和平演变阴谋。他们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举行各种会议，统一全党全国思想认识。并组织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密切党群关系。针对西方的歪曲诽谤，注意加强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而对破坏社会稳定制造混乱者依法严惩。

(2)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1991年党的五大强调，在当前的党建工作中，要大力解决好党群关系。1998年，由中组部和中宣部牵头组织实施的“基层一把手”工程，由中央机关各部委下派干部到县、村指导，协助政治、经济双扶贫工作。老党七大还强调，要坚决执行干部交流制度和实践中锻炼考察干部制度，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维护党的纯洁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党内腐败分子和违法行为要严加处理，绝不姑息养奸。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

力，从而真正发辉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3) 强调加强法制建设。法制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近几年来，老挝颁布实施的法律条文有《宪法》、《国会法》、《刑法》、《民法》、《劳动法》、《国营企业法》、《外国投资法》等30余部，还有《反贪腐败条例》、《反贪腐败令》等法律法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法制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果。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工作：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完善干部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在确保国家政局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高度重视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

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有力配合了经济建设，保持了社会稳定。老挝人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到2020年基本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定程度的现代化。

四、小　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自我定义：老挝现在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

(2) 现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各方面需要之间的矛盾。

(3) 老挝的社会主义改革从1986年起步，目前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工业注意国有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农业是家庭承包制。注重建立农业与工业手工业、服务业相结合的新型经济结构。

(4) 老挝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马列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方向等六原则。

(5) 老挝社会主义建设中现有的问题和困难：经济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工业产值占20%；资金严重不足，专业管理人才缺乏。

第四节　古巴的社会主义

古巴自1965年成立共产党后，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60年代采取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做法，70年代起以苏联模式为楷模，苏联东欧剧变后顶住苏东解体、美国高压封锁的双重打击，向中国、越南学习，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古巴的概况

古巴是一个美丽的岛国，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北部，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象大象的鼻子从北面伸向古巴，距离只有180公里。领土总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1100万。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1511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68—1878年进行第一次独立战争，1895年进行了第二次独立战争。1898年美国以援助古巴为名与西班牙宣战，作为战胜国占领了古巴。1902年古巴共和国成立，但仍在美国的控制支配之下。1903年美国强租古巴两处海军基地，至今仍占着关塔那摩基地。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100多名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建立了“7.26运动”。1956年11月卡斯特罗又带领81名革命者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出发到达古巴东部，登陆时遭到政府军袭击，后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卡斯特罗把游击战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1957年卡斯特罗开辟第二战线，即在国内组织复国统一战线。1959年1月革命军队攻克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亲美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

古巴在革命中和胜利之初，所举的都是反帝反独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当时卡斯特罗对美国抱有幻

想，他一再表白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宣称古巴革命“不是红色的、极权主义的，而是绿橄榄色的、人道主义的”。但由于美国坚持敌对政策，对古巴进行搜索并组织雇佣军妄图推翻古巴革命政权，从而促使卡斯特罗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把古巴革命进一步发展下去。

1961年4月，美国派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在胜利粉碎这场进攻之后，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革命是“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年5月1日，卡斯特罗和多尔蒂科斯总统又发表公告，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古巴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同年12月，卡斯特罗宣布自己“信仰马列主义”。从1959年至1963年，古巴通过颁布国有化法令和两次土地改革法，使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61年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与人民社会党共3个革命组织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10月改称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任总书记，标志着古巴革命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后来，卡斯特罗在1975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古巴革命的这场转变是说：“在一个像古巴这样情况的国家，革命能否只限于单纯的民族解放的目标，而保留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或者还应当朝着彻底的社会解放的方向前进呢？古巴民族没有别的选择，人民不想也不可能停顿下来。我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是密切相连的。前进是历史的需要，停顿就是怯懦，就是背叛，停顿会使我们重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成为剥削者的奴隶。”①

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苏联为楷模，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1961年4月粉碎美国雇佣军入侵后，开始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1963年完成了土地革命和外国企业国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有化，建立起以国有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1968 年发动一场“革命攻势”，实现了彻底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公有化，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70 年代，古巴纠正了 60 年代的过左政策，1975 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80 年代，古巴进行了一场利用市场的局部性小改革。90 年代，古巴顶住苏联解体的冲击与美国的高压政策的双重打击，进行改革开放。

目前，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经验，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二、古巴的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1963 年古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迄苏联东欧剧变，其建设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60 年代，从“理想”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一些社会主义做法。

经济上实行经济新体制。革命胜利初期，卡斯特罗赞同切·格瓦拉的观点，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全盘集体化和高度集中化，力图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认为革命的理想很快就能达到，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多样化。在 1963 年建立了以国有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后，1968 年又发动了一场“革命攻势”，把全国 5.5 万多家私营商业和手工业全部实行国有化。政府对经济工作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国营企业实行古巴独创的经济新体制——经济簿记登记制。这种新体制，既不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种独特的取消财政预算、放弃统一计划，否定企业间购销关系的“经济簿记登记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内部没有产值指标，也没有利润核算；企业之间实行无价调拨。由于这一体制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经济混乱和生产下降。

社会上实行高福利的保障体系。一是实行免费教育。1961

年颁布教育全面国有化法的同时，宣布实行免费教育的决定。并推行庞大的奖学金计划。全国的教育经费达到古巴资本主义时期的11倍。二是实行免费医疗。宣布，在古巴“所有病人有免费看病和住院治疗的权利”。为此，古巴公共卫生所花的经费是革命前的20倍。三是实行社会保险。1963年古巴颁布了第1100号社会保险法令，规定凡领工资者均可受到社会保险，保险资金和管理由国家负责。卡斯特罗说：在古巴“没有一个人会不受到保护的”。古巴不断增加免费的项目，在1969年达到顶峰，免费范围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如学生免费包括食宿、交通、制服费；免费医疗还包括病人和陪床人的食宿费。国家还对大量食品提供补贴。后来卡斯特罗指出当时的做法不切实际。

思想上培育造就一代“新人”。古巴强调“精神”和“觉悟”的作用，在经济工作中不重视利用经济杠杆、否定商品关系和物质刺激。1965年古巴取消了财政部、中央统一计划；1967年取消国营企业间的购销关系，取消货款利息和农业税，取消工资级别和工人加班费，鼓励人们凭觉悟劳动，号召大家做无私的人、勇于自我牺牲的新人。由于这一时期从“理想”出发，凭激情办事，违背了客观规律，导致了政治、经济的严重困难。

2.70年代，与苏联和好，搬用苏联经济模式。

70年代起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两个重大的转变。

一是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古巴与苏联关系疏远，1968年后古巴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卡斯特罗着意与苏重新和好。1972年7月古巴正式加入经互会，密切了同苏联的经济关系。1970—1977年，卡斯特罗先后4次访苏，而苏联领导人也进行了回访。

二是建立了“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1972年古巴开始加强宏观的计划管理，编制了1973至1975年的“三年经济计划”。1975年古巴共产党举行一大，决定建立“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该体制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经济规律，承认工资、

价格、计划、指标、利润、成本等经济概念和机制；主张企业独立收支，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系，个人物质所得应和劳动成果挂钩。这一体制实行后，逐步恢复了全国统一计划和财政预算。统一计划的做法是，计划在中央、省、市人民政府机关和企业3级制定，由中央统一协调后，再分别作为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下达给企业。财政预算方向，古巴分别设立了国家财政、统计、价格委员会，建立了全国财会体系，整顿了银行，注意利用信货、信息、价格等经济手段对企业实行领导。此外，还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重视物质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一个不过分依赖制糖业生产的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等等。

古巴这一时期实行的体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经济工作紊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这一体制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过度集中、粗放经营的经济模式，所以对经济的促进是有限的。

3.80年代，上半期局部性小改革，下半期又进行收缩。

80年代上半期进行了某些利用市场的局部性小改革。

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注意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如提高了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向个体农民发放优惠贷款，并在各城市普遍开放了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出售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剩余产品，还允许私人卡车主从事运输业务。

二是进行工资改革，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取消一部分免费项目。1980年古巴实行全国工资改革，制定了新的工资等级，这次工资改革既增加了工资级别的档次，拉开了最高与最低级别之间的差距，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又为职工普遍提高了工资。此外，还宣布取消许多免费项目，如学生制服、工人午餐、体育比赛门票等。

三是调整零售物价，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古巴的零售物价定于1962年一直不变，国家长期实行物价补贴，仅1967—

1981 年国家就补贴了 18.87 亿比索。生产成本高于价格，企业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1981 年古巴初步调整了价格，提高了 1500 多种零售商品的价格，使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同成本挂上了钩，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补贴，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古巴这场小改革为古巴经济注入了一定的活力，1981—1985 年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 7.3%，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8.8%。但是，由于措施不配套，又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投机倒把、贪污受贿、哄抬物价、化公为私等。群众不满情绪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为此，从 1986 年起又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纠偏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批判经济工作中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工作的倾向，强调经济工作中精神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共产主义觉悟和精神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中要比金钱强大一千倍”；反对引进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认为有些个体经营者“比美国雇佣军还要坏”；取消农民自由市场，恢复国家统购统销制度；修改允许私人建房卖房的住宅法，禁止私人行医和出售手工艺品等。使这一时期古巴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降。1986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3.5%，1987 年为 1.5%，低于 1985 年古共三大提出的 5% 的增长率。

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古巴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后，古巴面临十分严重的国内外局势。西方有人预言：“古巴迟早要垮台”、“下一个该轮到古巴了”。然而，古巴并未被言中，而是克服苏东解体后的艰难，顶住美国的压力，在稳步的改革开放中前进。

1. 顶住双重压力，誓死捍卫社会主义

古巴 1972 年加入经互会，经济等各方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很大。古巴缺乏燃料和食品。由于 30 余年来，古巴外贸的 85%、石油供应的 90% 及每年 15 亿美元的军援和大批机器设备主要依赖苏联供应。古巴每年的粮食消费约需 200 万

吨，其中160万吨靠进口。苏东剧变后，古巴许多工厂因缺乏燃料和原材料而被迫停工停产；居民基本消费品配量减少，经常面临断炊威胁。当时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大米5—6磅，每日供应80克重的小面包一个。鱼肉类等很难见到，牙膏、肥皂等均靠配给。居民有钱常常买不到东西，居民区经常停水停电，拖拉机无油开不动以马车代之。总之，苏东剧变后的古巴面临生存威胁。

另一重压力来自美国。美国自1962年起对古巴长期实行封锁和禁运，苏东剧变后美国趁机对古巴实行封锁高压，企图一举搞垮古巴社会主义。流亡于美的反古分子也叫嚷“要返回哈瓦那过（1990年的）圣诞节”。

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古巴主席卡斯特罗把坚持社会主义同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古巴共产党号召和动员人民度过“和平时期的特殊时期”，古巴全国上下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庄严口号。

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古巴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如打击破坏活动，优先发展食品生产，保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进一步密切干群党群关系，领导与群众大成一片同舟共济等。稳住了局面，经济出现复苏。

2. 开展反封锁斗争，通过经济外交扩展国际空间

1962年起，美国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目的是通过制裁扼杀古巴的革命政权。苏东剧变后，美国进一步强化封锁。1992年通过了针对古巴的“托里切利”法案；1995年又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1996年该法为克林顿所批准。该法宣布要制裁与古巴有贸易或投资往来的公司或个人，切断古巴与国际的联系，把美国对古巴的单方封锁国际化。在这种形式下，古巴加强反封锁斗争，并把打破其封锁作为其外交战略重点。

古巴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关系。1994—1995年，卡斯特罗先后出访了13次，其中9次是

访问拉美国家，使古巴同拉美国家的贸易额从1989年占其外贸总额的6%提高到37%。古巴还以创始国身份加入了地区一体化组织加勒比国家联盟，签署了拉美禁核条约并同近10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边合作扫毒协定。其次是积极开展同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的交往与合作，通过推行经济外交来加大反封锁斗争的力度。1995年3月，卡斯特罗在参加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首次访问了法国。随后，法国、西班牙、加拿大、英国等纷纷在古巴进行投资。接着，古巴又调整了同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关系。1995年10月，俄、古双方签署了8项合作协议。继而进一步发展了古中、古越关系，1995年12月卡斯特罗访问了中国和越南。此外，古巴还发展了同美国企业、新闻、宗教界人士和旅美侨民的关系和联系，使美国企业到古巴寻求合作机会的人士日益增多，仅1994年就有500多名美国工商界代表访问了古巴，其中100多位同古巴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古巴的斗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同情。1992年，联合国大会首次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只有59国投票赞成，而在1993、1994、1995、1996年再次表决时投票增至88、101、117、138个。2001年增至167国，仅有包括美国在内的3个国家投反对票。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等国际或地区会议上都发出了“要古巴、不要封锁”的正义呼声。1996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会议通过了谴责“赫一伯法”决议，欧盟15个国家也一致谴责和拒绝该法，加拿大更是抵制美国这种蛮横的政策。现在古巴与世界上156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在古注册的外国公司有600多家，其中400多家还在古设立了办事机构。

在古巴的外交攻势下，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有所松动。1998年1月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古，原则上同意首先在医药和食品方向取消对古巴的禁运。3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了4项放松制裁的措施。卡斯特罗说这些措施“有助于为古美关系创造一种良好气氛”。

3. 借鉴国际经验，推行“稳步的改革开放”

80年代，古巴曾在过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上进行局部小改革，但随后又采取收缩政策。苏东剧变后，为求生存与发展，古巴开始改革。90年代古巴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借鉴国际上的正反经验教训，强调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卡斯特罗说：改革的目的是“改进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古巴认为，苏联的改革“毁灭国家、毁坏历史、毁灭秩序”，不能学；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古巴要学习“中国人的榜样”。为此，古巴在改革的同时坚持“三不放弃”，即：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民造福的目标。同时强调要从古巴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做法。

(2) 考虑到古巴所处特殊环境，改革以“稳步”为明显特征。90年代古巴的改革开始于经济所迫，不改革难以生存而不得不进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古巴考虑到美国近在咫尺，至今仍未放弃对古巴的敌视封锁、以压促变的方针；而古巴社会福利、免费项目多，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改革的社会承受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搞改革带有很大风险。如果改革过急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要改革，又必须“稳步地”进行。

(3) 根据古巴国情，采取积极稳妥的做法。

一是不放弃计划，但要“利用市场”，逐步加大市场因素在古巴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起，开放农业市场及工业、手工业品市场，这些产品的生产是根据供求规律进行的。

二是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但其它成分的比重在增加。近几年古巴允许个体经济存在，肯定其对国民经济“起补充作用”，个体户已由原来的4.6万人增加到现在20多万人。在农业经营机制上，先是划小国营农场经营单位，建立自负盈亏的“基层合作生产单位”；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目前，

国营农场耕地面积由过去的70%降至16%，合作社耕地面积由过去的20%上升到44%，个体农民耕地面积由过去的10%上升到40%。此外，外国独资、合资的成分也迅速增加。但是，古巴不会放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并将捍卫国有经济的存在，努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

三是调整过高的社会福利性分配，逐步减少平均分配财富的比例，但某些基本的福利制度不会变，如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认为“它们是国家无偿给予人民的基本福利。这属于我们革命的本质之一”。

此外，对外开放方面。古巴对外开放搞得早，近年来步伐有所加快。古巴包括制糖业在内的生产部门均向外资开放，外资已出现在古巴的34个经济部门和行业里，外资来自43个国家。古巴还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并建立自由区和工业开发区。在自由区开展的工业、贸易、农牧业、技术和劳务活动均实行特殊制度。

古巴的改革虽起步不久，但已取得明显成就。它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困难，阻止了经济的继续下滑。1994年国民经济增长0.7%是90年代以来的首次增长，1996年增长率7.8%。古巴现在仍有重重困难，如美国的封锁、以制糖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等。但古巴有坚强的党、有卡斯特罗的英明领导，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前进。

四、小　结

(1) 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1995年12月访华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说：“古巴正在进行稳步的改革和开放，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2) 在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并拥有一个坚强的党。“为保证革命的连续性”，“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钢铁般的党”。

(3) 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卡斯特罗说：“我们拥有并将坚持

社会主义”。

(4)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加强精神和道德建设，认为“没有精神道德就没有社会主义”。

(5)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古巴社会福利、免费项目最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免费措施是国家给予人民的基本福利。

(6) 古巴最大的成就是在文教体育方面的成就居第三世界前列；古巴最大的困难在于以蔗糖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

第六章　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

本书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是指三大类五种典型：民主社会主义和瑞典模式与欧洲共产主义和法国典型；以色列的基布兹与日本的山岸主义；还有印度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改良，是社会党人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及社会政治运动。社会党在欧洲有21个党执政和15个党参政。其中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的瑞典模式。

欧洲共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欧兴起的一种共产主义思潮、派别和运动。推崇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共产党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典范，它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并在法国社会党执政的斯若潘政府中参政。

基布兹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它产生于20世纪初，由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犹太移民根据民主、平等、公有等原则建立起来的。它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产物，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不自觉采用了社会主义的做法，被誉为“成功的乌托邦”，受到世人的注目。

日本的山岸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共产主义村”，它是汲取中国老子的思想而创立用老子的思想来指导运作的共产主义村社。

印度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典型。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主张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推行民族民主的社会主义，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印度的实践约为40余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页。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和瑞典模式

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人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及社会政治运动。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改良，出现于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发展壮大于20世纪下半叶。社会党力量在欧洲最为壮大，有21个党执政和15个党参政。其中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被国际上普遍公认为成功的模式，称为瑞典模式。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党

1.“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与演变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它是从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演变而来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语，马、恩常常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

“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8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论社会主义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他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李卜克内西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

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①] 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把“民主”与“社会”两词颠倒一下。

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至，列宁也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上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所以，在原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词意义是相同的。

到了19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从而使“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具有改良主义特征。1899年伯恩施坦写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地论述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他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抛弃了事实上已经过时的口号，而“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态度出现，那么势力定会远较今天更为强大”。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改变了李卜克内西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含义。

当代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正是以伯恩施坦主义为其思想渊源的。后来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中，就把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因此，现时代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而是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

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后，又出现“社会民主主义”提法，实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2. 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

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以其

① 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9、7页。

为思想指导的政党有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及它们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以下涉及到尊崇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时统称社会党。

在马、恩时期，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名称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等。例如，1869 年德国建立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叫社会民主工党，1870 年瑞士建立的叫社会民主党，1879 年西班牙建立的叫工人社会党等等。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欧美 20 多个国家广泛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称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1889 年工人阶级政党建立了国际联盟组织叫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后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良主义思潮逐步滋长，并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导致国际组织分裂为左、中、右三派。以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的右翼和以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中翼，反对布尔会维克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转而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样，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思潮从组织上就彻底分道扬镳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翼，从 1918 年起纷纷分立出来，在列宁的倡导下改变政党名称叫共产党，由它组成的国际组织叫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

由此可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马、恩、列时期，现在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原本是一家。共产党是当年社会党的左翼改名而成的。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

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联盟组织叫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的发展大体经历了 4 个阶段。

1. 第二国际阶段（1889—1918）

由上所述，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般都称为社会党，成员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19 世纪 70、80 年代末，随着

国际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掀起了建党高潮。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标志着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条件已基本成熟。在恩格斯的关怀指导下，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第二国际正式成立。第二国际的组织原则是各国党在自己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在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二国际各国党是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传播社会主义、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社会主义思潮迅速滋长。时值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内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对帝国主义战争态度以及对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党内部出现了左、中、右三派。在1914—1918年一战期间，第二国际的右翼领导人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大多数社会党由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蜕变为主张社会改良的政党。左翼社会党人在列宁的倡导下建立了共产党，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2. 社会主义国际阶段（1919—1940）

十月革命胜利后，大多数社会党人公开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其右翼领袖们于1919年2月在瑞士的伯尔尼召开国际代表会议，恢复了第二国际，称为“伯尔尼国际”。原中派社会党人则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召会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由于它自称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所以又称第二半国际。而左翼社会党人新建立的共产党则于1919年3月建立了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左、中翼社会党人的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与第三国际是相对立的。1923年，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在德国汉堡召开合并大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欧美工人运动中鼓吹改良主义。该国际由35个社会党组成，包括欧洲和某些美洲的社会党以及各种流派和组织，组织较

为松散。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法西斯主义在西欧崛起，各国社会党相继被宣布非法，许多社会党遭到法西斯镇压。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总部迁到伦敦后，组织已陷于瘫痪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剩下一个流亡在伦敦的委员会和部分的社会党保持联系。

3. 社会党国际阶段（1945—1951）

在二战中，由于西欧各国社会党积极参加并同共产党联合反对希特勒的抵抗斗争，所以战争结束时，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影响有所加强，组织上迅速恢复和发展。例如法国社会党党员由战前的27万人发展至1946年的35万人并五次参加联合政府，意大利发展到70万人，法国发展到60万人。至1945年底，西欧各国社会党党员总数由战前的500多万人增加至800多万人。

在各国社会党力量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西欧一些社会党人提出重建社会党国际的决议。1945年5月，欧洲部分社会党，如法、意、比、荷、瑞士等国社会党，应英国工党邀请在伦敦会晤，商讨重建社会党国际的系列问题。

1946年5月，在英国的克拉克顿举行了19个国家社会党参加的战后第一次社会党的正式会议。研讨了筹建社会党国际的问题。1947年11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四次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欧洲有33个社会党参加），以推进日常工作。它实际上是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前身。

安特卫普会议后不久，国际上冷战加剧，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日趋对立。战后西欧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改善人心思定，易于接受改良主义思想。于是改良主义思潮重新抬头。这些因素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建立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1951年3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代表会议在伦

敦召开，提出了社会党国际纲领和组织原则草案。1951 年 6 月 30—7 月 3 日，在法国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八次会议，大会通过了社会党国际的决议，并把这次作为社会党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社会党国际的正式建立。出席大会的有 34 个党的 106 名代表，自称代表了 970 多万党员和 4000 多万选民。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基本纲领（简称《法兰克福宣言》），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目标与宗旨，并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整套改良主义纲领。

4. 社会党国际发展壮大阶段（1952—2000）

自社会党国际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党在国际上的实力增长极为迅速，远远超过各国共产党的实力和影响。1996 年统计，各类成员党约 142 个共有党员近 3000 万，遍布欧美和第三世界，并有 30 余个党在各国执政或参政。尤其是欧洲社会党共有 21 个党，党员 400 万左右，执政或参政的有 15 个，还成立了区域性组织“欧洲社会党”。

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在理论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苏东剧变既是他们的机遇，也使“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丧失信誉”的严峻的挑战。为此，自 1992 年十九大开始，明显回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大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式称谓。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战略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反对共产主义

由于社会党在历史上同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想有联系，也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所以社会党思想体系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并不认为共

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更不承认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反，它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会起很多破坏作用。1951 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中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威胁势力，宣布共产主义有“六大罪状”。这个宣言公开宣布社会党国际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把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它的任务。70 年代以后，虽然一些国家的社会党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建立左翼联盟参加竞选和组织联合政府，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

2. 认为不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必把全部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制。

社会党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正义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可以用来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说，国家可以通过实行一定的经济计划发展生产，通过税收和各种政策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提高全体居民的福利水平。所以他们认为基本策略应该是走和平的、民主的、议会的道路；即是通过社会改良的道路而非革命的道路，运用和平方法而非暴力手段，通过长期缓慢的积累而非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内经过普选争取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掌握政权，而不必要也不应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奥地利著名社会民主党人领袖克赖斯基说过，“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已经失去了任何现实内容，我们应当敢于承认，社会只有通过不断改良，才能发生变化。”他还说：“我完全可以公开地说，早就不能把社会民主党设想为革命党了。其实，任何时候都不能这样设想。我认为，它充其量是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无论如何不能以马克思的名言‘剥夺剥夺者’为目标。”在对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早期社会党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战后社会党右翼认为应该放弃过去的立场，主张只有对那些威胁到公众利益的大企业才考虑实行公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说，只有在私人资本不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时才考虑实行公有。它的理由是，在现今条件下，“所有

制已不是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基本因素”，因为“所有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都可以通过采用国家干预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完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和有害的。另有一些社会党的理论家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不是财产私人占有，而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管理职能操纵在少数人手里，所有制已不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废除私有制。他们认为，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可以不必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而主要是限制资本家的经济权力，使资本主义处于群众监督之下便可。

3. 主张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思想多元化。

所谓政治多元化就是不存在一个始终不变的权力中心，要实现权力的多中心。具体内容就是反对一党制，允许多党存在并彼此进行竞争。他们说：“民主需要一个以上党的存在和彼此反对”，应该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他们要求真正做到多党并存、互相竞争，谁取得选票最多谁上台执政，这就是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的构想。所谓经济多元化，就是允许各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用“混合经济”来代替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他们认为私有制不会妨碍平等的社会秩序结构，但也不能统统是私有制。可以把那些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部门实行国有制，让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长期并存，互相影响，这样才能繁荣经济，促进社会发展。所谓思想多元化，就是主张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反对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1951 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宣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它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社会》更加具体地指出：基督教学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辨证的历史哲学、马克思

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伯恩斯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不过，社会党左翼一般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的还自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者。

4. 主张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

所谓政治民主，就是政党民主和选举民主。社会民主党要求各国政府允许各种政党公开合法存在并进行自由选举。投票箱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手段，一切依靠投票箱来解决。基于这种看法，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十分重视公民选举，竭力争取普遍、自由、平等的选举权利，主张“人民有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权”。各党派要尊重选举结果。得票最多的党派可以组织政府，但必须尊重少数派的权利。在野党可以攻击执政党，也可通过选举途径推翻执政党。这就是“政治民主”最核心的内容。所谓经济民主，主要是要求工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经营方向、人事安排等方面同资方有对等的决定权。社会党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维护企业的工人利益，消除劳资双方的对立。所谓社会民主，主要是大搞社会福利，充分满足就业。社会民主党认为政府和资方应该在福利事业方面付出必要的开支，他们主张给失业者发救济金、给学生发奖学金、给老年人发养老金、给各种不幸事故者发抚恤金、对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及免费午餐等。他们还认为国家应该创造条件，实现充分就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了社会民主。所谓国际民主，就是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超级大国包办世界事务，赞成南北对话、支持南南合作、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等等。

以上四点大体上概括了当代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目标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一般说来，各国社会民党、社会党和工党的左翼是比较接近共产党的，它们的许多观点和主张是进步的、有益的。但总的看来，社会民主党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区

别的，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因此共产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备被民主社会主义融化。英共、意共的变化，本质上就是共产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占上风的结果。从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社会主义的战略重点转向苏联、东欧。1989年11月，西欧社会党的23个领导人会晤于米兰，讨论了东欧的形势，制定了对东欧施加影响的共同措施。不久，社会党国际日内瓦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东欧的立场、问题与机会》的决议，呼吁西方用经济援助促进东欧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再加上苏、东历史上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很容易在这些国家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共产党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改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称为匈牙利社会党；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改称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接着，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分别改称民主社会党和社会党。这是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相同但又有其特点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有意识地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有目的地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从堡垒内部瓦解社会主义；以“改革”为旗号，将社会主义制度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此，西欧各社会党曾为之欢欣鼓舞，认为社会民主模式在东欧会有大的发展。然而，几年过去，各社会党非但没能向东部扩展其影响，反而在西欧各国都逐渐失势。正如已故社会党国际主席威·勃兰特在1991年初写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东欧巨变之后，很多人宣传这不仅是东方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也同时宣布了民主社会主义时代的终结。其实，终结的只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四、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瑞典模式

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现为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成员。曾有集体党员120万，1991年1月取消集体党员制，现有个

人党员 20 多万。瑞典社会民主党以推行“瑞典模式”而闻名于世。该党于 1920 年 3 月首次组成一党内阁。1932 年重新执政后，提出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的思想。1944 年制定《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强调通过改良实现社会福利，把全面就业作为党的首要目标。1960 年党代会认为瑞典已经进入福利社会，取消了原党纲中“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等提法。1976 年大选失利下台。1982 年重新上台后，提出实行介于紧缩与扩张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冷战结束前后，瑞典的经济问题十分凸显，瑞典党不得不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即减少工资福利水平，结果引起中下层群众的不满，1991 年大选失利被迫下台。1994 年又重新上台执政，党的领袖佩尔松出任政府首相。

（一）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特点

1. 职能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是指所有权是由各种不同的所有权职能构成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目标，就等于是对所有权的个别职能社会化。佩尔松在其《职能社会主义》一书中，论述了瑞典社会党的“瑞典模式”的指导思想，即实行一种由市场控制生产、又通过国家干预照顾工人利益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并不是对全部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而是对所有权的各个职能实行部分的社会化。其特点是通过立法，使重要的所有权职能转移到国家手里，这不同于其它西方国家的那种通过补偿来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的社会化。按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瑞典社会党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劳动市场化政策、直接立法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病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这些政策和立法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调整了收入分配、解决了失业和经济危机。形成了一种资本家推动生产发展、工会通过国家推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发展模式，结果使瑞典既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又拥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平等权利。

2. 福利社会主义

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宣称保证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终生福利。它包括以下内容：

①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

一是老年保险。其一是国家基本退休金，对年满65岁的退休者，不论其退休前职位的高低和工资的多少均可领取；其二是补充退休金，其数额相当于退休前15个最高收入年份平均年收入的60%，并按物价指数递增。一个一般收入的人，这两项退休金可达原工资的2/3左右。

二是医疗保险。一个家庭只要有正式收入的成员将收入的12.8%交纳医疗保险税，全家均可享受免费医疗。生病的职工还可得到数额为原工资90%的现金补助，以补偿其因病损失的工资。

三是失业救济和失业补贴。失业救济金分若干等级，但不得超过纳税后平均工资收入的92%。没有参加保险的失业者每天也有65克朗的失业补贴，一般只给150天。

四是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残疾人工资的75%由政府支付，其余由工厂主负担。政府拨款为残疾人创办许多提供就业机会的工厂，并向残疾人提供各种免费公共服务。国家还提前发给那些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残疾人的退休金。

②免费教育和福利补贴

瑞典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16岁以下的孩子有统一的免税补助，16—20岁的学生有助学金。高等学校学生可向政府领取一笔无须偿还的助学金和贷款，研究生有特定的薪金。移民子女也同样享受以上待遇。

家庭福利有：孕妇的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免费。新生婴儿的父母共有一年的假期，可以领取原工资的90%。公民结婚可以享受免费旅行。住房补贴分为三种：一是中央政府给予的补贴。数额大小以收入的多少和抚养孩子多少而定，最高额为每个孩子每年补贴1500克朗；二是中央与市政府联合提供的补贴。这种

补贴的多少取决于收入和住房费用的大小，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000克朗；三是政府对老年人的住房费用和房租还有特别的补贴，这种特别补贴可以补偿较低收入老人的全部住房费用和房租。

③“充分就业”和“国有化”政策

瑞典政府不仅通过提供招工补贴、进行职业培训和举办公共救济工程、住宅建造计划等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还特别强调运用国家财政补贴去解救亏损的私人企业。这种补贴有两种：一是普通补贴，凡符合规定标准的申请者都可获得；二是特别补贴，即有目的、有选择地给予某些特定的企业或个人补贴。

国有化企业大体有两大类：一是包括邮电通讯事业在内的公用事业。这些非盈利性企业的盈亏，均由国家财政预算负担；二是分属于钢铁、造船、服务等行业的国有化企业，它们大多被置于一个由国家设置的“控制公司”之下，成为该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子公司。

3. 基金社会主义

基金社会主义或称“雇员投资基金”、“工资收入者基金”，是相对于“福利社会主义”而言的。其最大特点就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工人集体控制企业利润和股份，从而实现对资本所有权的控制以及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福利，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把“福利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认为福利社会主义导致国家干预的扩大，国家干预与资本权力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劳资妥协的基础上形成的福利社会主义因劳动力量的强大而打破了“历史性妥协”的劳资平衡关系。同时，国家干预引起的“滞胀”问题无法解决。而实行基金社会主义又则可免去此弊。基金社会主义说明工人阶级已进入到争取经济民主阶段。

在实践中，社会党颁布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法案规定对一些中大型公司每年征收一定的利润税和“附加养老金”，这

两项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各公司的股票，即用来投资，这实际等于慢慢地减少企业主对企业的所有权。该基金由工人来管理。这项法案等于扩大工人的经济权利、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有助于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

（二）瑞典模式的困境

“福利国家”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主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解决或缓和以下两个矛盾：一是解决或缓和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二是实现收入均等化，解决或缓和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减少社会动荡。在70年代中期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上述矛盾之所以在瑞典暂时得到一定缓和，“福利国家”制度的确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也是“福利国家”无法解决的。7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经济在危机和滞胀的冲击下步履蹒跚，但是为了维持福利制度的社会福利开支和工资却急剧增加。社会消费增长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80年代竟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3。而且福利政策的“刚性”作用使社会消费只能上升，难以停止或减少。这样，不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无法解决，而且由此引发的“福利国家”本身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大致有三：

（1）税务负担沉重，财政赤字庞大

高福利、高消费的基础是高税收。瑞典的税收在西方国家是最高的，不仅有所得税、销售税等一般税，而且还有名目繁多的成年教育税、小儿日托税，等等；税率也高得惊人，一般占个人工资收入的25—40%，收入更高的边际税率竟高达80%。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1988年瑞典的各种税收总和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人均税务负担近6000美元，占个人收入的52%。扶摇直上的福利开支造成瑞典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猛增，1982—1983年竟达到820亿克朗，占国家收入的一半。长期的巨额预算赤字，迫使瑞典不得不大量举债，其外债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

（2）通货膨胀加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除了大量举债外，瑞典政府还不得不扩大货币发行量，使得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接踵而至。1982 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13%，90 年代为 7—9%之间，物价上涨率则在 10%以上。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固定货币收入者和各种社会补贴领取者纳税后的实际收入大大降低。高福利、高缴纳（包括税收和各种保险缴纳）吞噬了很大一部分个人的、社会的储蓄和投资，形成社会消费严重地同经济发展争夺资金的局面，致使固定资本投资下降，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更新缓慢，从而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在 60 年代，瑞典加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 7%，而在 1973—1981 年间则降为 1.8%，1989 年仅 1.3%，90 年代是 1.7%。

此外，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鼓励了懒汉。现在瑞典的欠勤率高达 20%，泡病号和缺勤现象相当普通，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降到 3 小时。例如，某大医院的医护人员超编 1/5，因为经常有 1/5 的人请“假”，不得不请“临时工”来代替，而这批临时工实际上就成了长期的正式职工。瑞典目前领取残废金的人中，半数以上实际上都是能够工作的。有些人领完失业补贴就出国度假。这一切也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3）产品竞争能力衰落

瑞典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大大大低于工资增长率，导致产品中的工资成本急剧增长；加之进口的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造成产品成本的全面上涨，大大削弱了瑞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致使瑞典自 1973 年以来连年出现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逆差。瑞典每年的进、出口额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30%，工业产品近 50%靠出口。对于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的国家，竞争能力衰退和出口萎缩简直是一种“窒

息症”。

从经济角度看，瑞典由于福利制度的推行，公共开支过度膨胀，已超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负担能力，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使得瑞典一方面经济萎靡不振，债台高筑，另一方面福利开支却持续增加。从生活福利上看它是一个富国，但从经济和生产上看它却是一个穷国。“福利国家”的发展破坏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正是当前瑞典模式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从政府角度看，瑞典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瑞典实质上是个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私有经济仍是最主要的经济成份，95%的生产资料掌握在100个家族的17个财团手中，它们控制了全部工业品的1/3；私人公司在采矿和制造业中约占90%；零售商业和91%的银行都由私人经营；农业和土地全部私有。瑞典“福利国家”的危机，突出地反映出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它表明，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

五、小　结

(1)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是社会党人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及社会政治运动，现在又称社会民主主义。

(2) 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是社会党国际，拥有各类成员党约142个，共有党员近3000万，遍布欧美和第三世界，并有30余个党在各国执政或参政。

(3) 社会党人主张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思想多元化，主张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

(4) 社会党人主张通过和平的、民主的、议会的道路，即争取选民支持上台执政，通过改良走上社会主义制度。

(5)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模

式，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迄今约60年，以推行福利社会而闻名于世。

第二节　欧洲共产主义和法国典型

欧洲共产主义（简称“欧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欧兴起的一种共产主义思潮、派别和运动。推崇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共产党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典范，它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并在法国社会党执政的斯若潘政府中参政。

一、欧洲共产主义概况

1. 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由来与含义

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最先出现是1975年。1975年6月26日，意大利记者弗拉内·巴尔别里，在为米兰《新日报》撰写的社论《勃列日涅夫的期待》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他在社论中写道：“近来，圣地亚哥·卡里略阐明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思想越来越定型了。它以西欧集团为支柱，而不那么符合莫斯科的战略意向。”[①] 此后，这一概念相继在西方的一些报刊流行，但意、法、西三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开始时认为它并不正确并反对使用。然而，时隔不久，1976年1月3日，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在法共为他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欢迎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采用了这个概念。同年6月30日，他在欧洲共产党的会议上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西欧一些共产党相继有保留地接受这个新概念。西共总书记卡里略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幸被选中的名词”，“其科学价值也值得怀疑”，但“只要我们找不到

① 《欧洲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挑战》，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一个更好的定义，欧洲共产主义就会作为现实强加给我们。”①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含义，已故的意共总书记贝林格解释道：“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出发，寻求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模式”。它是“欧洲发达工业国家通过民主途径，寻求所有社会主义工人力量、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② 卡里略在《1980年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它的根本点就在于各国共产党要独立于苏联，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明确表示走真正的民主道路。

为此，我们可以这样归纳欧洲共产主义：（1）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西欧一些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2）它主张民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以区别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2. 欧共党基本概况及其变迁

我们把信奉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定义为欧共党。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地理概念。欧共党的主体在西欧，但不是所有欧洲的共产党都奉行欧共主张，欧洲以外也有一些共产党奉行欧共的主张。据1986年统计，世界上有18个党奉行欧共理论。西欧14个，其中被誉为欧共中坚支柱的是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此外还有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瑞士共产党、瑞典左翼共产党人、荷兰共产党、希腊（国内派）共产党、圣力马诺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冰岛统一社会党（冰岛人民联盟）。欧洲以外有4

①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78版，第2—3页。

② 198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个：亚洲的日本共产党、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共产党、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及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这 18 个欧共党大多数是在第三国际时期建立的老党。据 1986 年统计，这 18 个党拥有党员 330 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共产党员总数的 75%以上；在西欧，14 个欧共党拥有党员 250 万，约占西欧党员总数 90%。人数较多的党是：意共党员 160 万人，法共 60 万人，西共 8 万人，日共 50 万人，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10 万人。实力最大的是意共，它在 1975 年的地方选举中，其执政范围涉及到全国 20 个大区的 6 个大区和约占全国 1/3 的省、市政府中。其次是西共。西共在 1979 年的大选中也获得了 10.7%的票数，并占有众议院 350 个议席的 23 席，成为西班牙议会中的第二大党。西欧原来唯一参政的欧共党是圣马力诺共产党，多年来它与天民党共同执政。

1989 年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欧欧共党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一些成员党改变党的名称，如英共、奥共、意共、芬共、瑞典左翼党等等，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其次是修改党章，很多党在党章中删除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葛兰西、陶里亚蒂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再次是欧共党很多党员退党，党员人数剧减。如意共人数由 1977 年的 181 万降到 1989 年的 143 万，法共由 1977 年的 100 多万降到 60 万，而荷兰共产党干脆宣布解散。在这场冲击中，欧共党的中坚支柱党意共，于 1991 年召开 20 大，正式将名字改为“左翼民主党”，但党内不同意这一改变的派别，于 1991 年 2 月组成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而法共和西共则顶住冲击，坚持以欧洲共产主义为指导并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探索与创新，法共在 1997 年 6 月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成为苏东剧变后唯一走向参政的欧共党。

二、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

1. 阶级理论

正确认识和分析发达资国因科技革命的实现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是欧共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欧共的阶级理论包含以下的阶级分析。

一是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欧共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实现，工人阶级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是因为“新中间阶层”的介入。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蓝领工人人数明显下降，如1980年意大利从事体力劳动、直接生产性的各类工人约占就业总人口的32%。白领工人和第三产业的非直接生产性工人逐年增长，如意大利这一阶层占工人总数的47.3%。他们认为，这些人属于“新中间阶层”，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欧共认为，随着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资本更加集中，资产阶级成分更加复杂。法共把法国资产阶级分为大、中、小三部分。他们认为，大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全国政治大权控制经济命脉，是最顽固、最反动的剥削阶级。因而它是革命的打击对象。而中小资产阶级即非垄断资本家阶级也受垄断资本家的排挤掠夺和欺压，因而与大垄断资本家有矛盾。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他们是参加反对大垄断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的间接力量。

三是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他们认为，各级管理人员、和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他们是领薪金受雇佣受剥削的“文化力量”，与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量”同是革命的主体，两者结成广泛的反垄断联盟，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基于以上对于阶级结构新变化的分析，欧共提出了新的阶级联盟路线：以工人阶级为核心，与各阶层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与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权作斗争，动摇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开创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2. 革命道路的理论

欧共认为，当今时代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各国国情多样化，因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多样的。在工业发达、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欧国家，不能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更不能走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道路，而是必须选择“独特的民主道路”。“独特的民主道路”的理论主要是：

①要和平取得政权而不是武装夺取政权。欧共认为，在列宁时代不使用暴力革命就不能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但在现时代，在经济发达的西欧进行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民主道路来进行。因为：第一，西欧民主传统比较发达，有议会民主制可以利用，为和平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在核武器时代，暴力革命易导致核战争，而核战争是毁灭性的，因此，任何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了更加成熟的经济基础；第四，工人阶级（包括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社会上已占绝大多数，他们要求和平变革而不主张使用暴力，所以，用民主的方法走向社会主义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②要改造和利用国家机器。欧共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发达资国可以用“结构改革”的办法代替“打碎旧国家机器”，在民主改革过程中逐步夺取国家政权。因为：第一，现代国家的职能扩大了，国家不仅仅有镇压职能，而更重要的是管理职能；国家不仅可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为满足公众的福利保障进行调节再分配。一旦社会主义力量上台执政，就能通过民主改革改变国家的性质，利用国家机器为人民谋幸福。第二，国家结构发生变化。卡里略认为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国家已经不再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而是为部分大资产阶级服务了，因而现代国家与社会大多数人民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国家。当受大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之害的社会各阶级联合起来，形成一支广大的群众力量之时，就有可能把国家

机器中的“决策中心”、“重要地盘”从大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在国家机器内部进行彻底改造。第三，西方国家建立的民主制仍然有效。欧共认为，西方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有效的，如果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话，它会更加有效。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必摒弃资产阶级民主，只要改变这些民主的机构内容即可。基于对发达资国国家机器的新认识，欧共认为不必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而是对其改革改造便可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

③民主道路不排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欧共认为，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可能会遭到反革命暴力的抵抗，因此在某个时刻也许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暴力的抵抗。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策略是：实行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政策；实行阶级联盟政策，即扩大工人阶级联盟体系；实行民主革命政策，即先进行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建立新型民主制，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

3.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

欧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有多种模式，西欧国家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不能照搬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应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即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欧共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二：

①政治体制模式包含四点：

第一，实行多党联盟制，民主轮流执政。欧共把多党制看成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他们认为多党制是防止共产党僵化的一剂良药。实行多党制的具体内涵有四：一是各政党独立自主地存在和发展，保证反对党的活动自由；二是共产党不是独占领导，而是通过“多党联盟”来实现领导，共产党在其中起政治引导作用；三是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可以组成多数派和少数派，通过普选，实现多数派轮流执政；四是党

政分开，反对把国家和政党“合二为一”。

第二，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民主，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欧共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高度全面的民主。高度全面的民主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并使所有劳动者成为国家管理者和真正的主人。

第三，发扬议会民主制的“中心环节”作用，使它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指导、协调、监督权”；废除两院制，实行一院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制度，防止滥用权力。

第四，保障和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意共认为，应保障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的自由和自立，充分保障文化艺术科学自由，尊重宗教和一切宗教自由原则，保障言论自由和“多元化”新闻报导，不允许强行统一意识形态。

②经济体制模式的特点有三：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除了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外，还将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充分发挥私有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国家将通过税收政策进行限制和调节私有经济，逐步把它引向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二，在经济模式方面，多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并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产品的丰富，多样化服务网进一步扩大，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种形式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最终实现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

第三，在经济政策方面，实行经济民主规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公、私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决策同劳动者对确定和监督生产方针的参与结合起来；劳动成果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保证国内经济平衡发展和独立的前提下，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4.“新型群众性政党”的理论

欧共认为，在当今西欧国家的新历史条件下，真正能起社会改造的历史主体作用的是新型的群众性政党，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新型的群众性政党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主要特点是：

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欧共多数党不再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的伟大思想”。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不动的，用新的提法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特点；二是他们认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容易被理解为承认苏联的模式。

②关于党的性质。欧共认为党是新型的群众性的党，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认为列宁的建党原则中，把党建成职业革命家构成的革命者的党，这是俄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当时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低，不可能自觉参与对国家的领导权。而现在西欧的情况不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高，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工人、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公民的组织，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群众性组织，是工人运动的神经中枢。

③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欧共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活动的准则，但他们加强了民主。例如，他们实行党务公开，主张党的集会应该公开，非党员也可参加；党的档案可供非党人员查阅，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同时担任其它组织的领导职务，党内实行干部轮换制；党的委员会和申诉委员会不应是党机构的一部分，而是党员利益的代表，在这些委员会里不设专职干部，而由党员自选的人来担任工作。

④关于党的领导作用。欧共各党都强调，在通过民主道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和先锋队的作用是基本保证。但他们又主张共产党不应对国家和社会实行绝对领导，而是要同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不同政党和派别建立联盟，由这个联盟来领导国家和社会，而共产党在联盟中起政治引导作用。

此外，欧共各党为把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对党员的标准作了新规定："凡是拥护党的政策和纲领的人，不问信仰如何，均可申请加入共产党。"

5. 欧共的国际政策

①各党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政策

意共总书记纳塔说，党与党的关系应"建立并保持在自主、完全平等、尊重各自立场、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之上。""各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自主是它本身发展的根本条件。"[①] 各党独立自主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独立自主是各国共产党扎根于本国民族人民群众之中，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搞好本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是服从某一外国党的内政外交的需要，也不是服从于某个国际中心组织。

第二，独立自主是各国共产党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各党在制订自己的理论和路线时，要根据本国国情和自身条件，自己选择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反对在国际共运中推广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而忽略各国民族特点的教条主义。

第三，独立自主就是各国共产党之间完全平等。各国党不论大小、老党新党、执政或未执政，都应该完全平等。完全平等是独立自主的核心，各党完全平等才能实现各党的独立自主。

第四，独立自主就是各国共产党之间互相尊重，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们认为，分歧的存在是自然的，应求同存异，通过自愿友好协商和耐心等待来逐步解决，而不能强求一致或通过国际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强制解决。

第五，独立自主就是各国共产党之间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这一原则非常重要，如若没有这一条，独立自主、

① 1985年10月《人民日报》第4版。

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就失去保证。若有不遵守这一原则而搞霸权的，各国党有权给予强烈的谴责。

②国际间政策是以“新国际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欧共认为，过去苏共把国际主义同独立自主对立起来，借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干涉和控制别党别国。而当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各国政党关心的大问题。因此，当前必须用“新国际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独立自主的新国际主义。欧共认为，独立自主是新国际主义的基础，没有独立自主的国际主义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各党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而非相互排斥。而强调独立自主的新国际主义，并不意味各党闭关自守，它坚持对世界上一切进步、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给予支持和声援。

第二，没有国际中心的新国际主义。欧共认为，新国际主义原则之一就是没有国际中心、没有领导党、没有老子党。欧洲共产主义是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多样性发展的表现之一，这决不是要用地区中心去代替另一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心。

第三，超越国际共运范围的新国际主义。欧共认为，在当今竞争与和平共处的时代，特别是核武器时代，国际主义团结的内容不能局限于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无产阶级范围。凡是进行反帝、反殖、反垄断资本寡头的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等进步力量，都应包括在新国际主义之中。

第四，新国际主义的团结中心。欧共认为，当代共运不需要也不应该有国际领导中心和领导党，但仍需有新的国际交往的联络协商的形式，在国际共运的多种化中求团结。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各国共产党应采取双边或多边会晤的新形式，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加强各国党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推动国际共运

的健康发展。

③在国际政策上的基本立场有五：

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着重打击美帝国主义，认为它是国际局势紧张的主要根源；同时反对大国的强权政治和大国沙文主义。

二是维持世界和平，反对一切战争，尤其是反对核战争。欧共认为，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毁灭人类物质文明的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核战争将使人类社会遭受最残酷的浩劫。因此，维护和平、支持反核和平运动是当前的最重大的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三是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要依靠不结盟内部力量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四是赞成竞争与和平共处。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两种制度应该和平共处展开竞争，要争取建立一个独立于美苏的、民主的、联合的社会主义的欧洲。

五是主张在整个欧洲地区建立“欧洲左翼”力量联合的新战略。他们认为欧洲共产党应当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发展“欧洲左翼”力量，促进欧洲工人运动的统一，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欧洲独立。

三、法国共产党及其“新共产主义”

苏联东欧剧变后，全世界有不少共产党改变名称，这也波及到欧共党，原来欧共党的中坚意大利共产党便于 1991 年的意共二十大上宣布放弃意共现有名称及标志，同时宣告成立“意大利左翼民主党”。随后，党内不同意这一做法的人于 1991 年 2 月成立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但是，大多数欧共党仍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信念。其中，力量和影响较大的党有法共（20 万）、意重建共（12.7 万）、西共（4 万）、希腊共（3 万）等。他们在坚持共产党名称不变的同时，还根据新情况

进行政策调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共，它强调要建设一个新型共产党，并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理论。

1. 法国共产党概况

法共成立于 1920 年 12 月 29 日。二战后，法共一度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党员达 80 多万。1946 年 9 月至 1947 年 5 月，曾先后参加过五届政府。1956 年法共十四大就提出不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人民政权已经具备可能性。1968 年 12 月，法共明确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70 年代，法共批判斯大林主义，二十二大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欧共党的中坚力量。

苏东剧变后，法共受到严重冲击，但仍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1994 年二十八大罗贝尔·于接替马歇担任法共全国书记（相当于总书记）。1995 年，他参加总统选举，获 8.46%选票。同年，他发表其第一部理论性著作《共产主义的变革》。1996 年底，法共二十九大放弃“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提法而代之“新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变革。1997 年 6 月，法共参加社会党若斯潘政府。

据 1996 统计，法共有党员 274862 人。其社会成分为：就业者占 54%，退休者和提前退休者 24.6%，家庭妇女和男子 14%，失业者 5.5%，大中学生 1.9%。失业者中间，工人占 43.1%，职员 33.3%，技术干部 8.7%，教员 7.1%，小商人和手工业者 3.5%，农耕者 2.6%，自由职业者 1.7%。法共组织机构分为支部、总支、省委和全国 4 级。全国代表大会每 3 年举行一次。二十九大选举产生及二十九大后增补的全国委员会有 145 人，全国局 29 人和全国书记处 7 人。现任全国书记罗贝尔·于为人热情富有人情味。法共现有 3 人参加若斯潘政府。

法共出版的全国性刊物主要有党报《人道报》、《人道报周刊》、《土地》、《目光》、《经济与政治》、《今日议员》等。

2. 苏东剧变后的政策调整

苏东剧变后，法共于1990年12月、1994年1月和1996年12月先后召开了二十七大、二十八大、二十九大，重申坚持共产党名称不变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根据形势进行了重大政策调整。

第一是社会主义模式上的调整。法共自1920年建党以来长期同苏共保持密切关系，虽然在70年代中期主张欧洲共产主义而批判斯大林主义，但从总体上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却没有大的改变。苏东剧变后，法共对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行思考总结，逐步从总体上肯定走向总体上否定。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发表《宣言》，指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党制、纯公有经济与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基础之上的，其弊端在于缺乏民主，即缺乏人民对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参与。其结果是使共产党变成一种与公民民主干预相对立的执政和管理工具。1995年2月法共新领导人罗贝尔·于发表讲话说苏东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蜕变”，其经验总结“从总体上说不是积极的”。1996年法共二十九大着重分析批判了苏联的思想模式。与此同时，法共主张“新共产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民主的、自治管理的、使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全面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取代原来的“民主的、多元化的、自治管理的”法国色彩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如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成员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民主第一、人及社会发展第一的社会”。

第二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调整。苏东剧变后，法共在政治思想上受到来自党内外的重大压力和冲击，右翼势力叫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灭亡，社会党鼓吹法共应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法共党内不少老党员感到困惑和担忧，党内反对派则要求放弃共产党的称号。对此，法共在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再认识的同时，重新思考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法共二十八大明确重申法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景”，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首次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的主张；法共二十九大放

弃了过去长期坚持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改提“新共产主义”。实现新共产主义是进行社会改革，即“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法共认为在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想的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级，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行深刻改革来实现新共产主义。

第三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调整。法共从1920年建党以来一直实行民主集中制。70年代中期以来尊崇欧洲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但直至苏东剧变后头几年，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认识与讨论，他们终于决定放弃“民主集中制”而转行“民主的运转原则”。1990年法共二十七大上，少数人提出了取消民主集中制的主张。1993年6月，马歇尔总书记以个人名义提议法共放弃民主集中制，此后党内进行了半年的激烈讨论最后意见趋于统一。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修改党章决定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提出党内唯一运转的原则是民主。按照民主的原则，党员是党的主人，支部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党要建立多样化的统一，党的决定要以民主的方式通过多数作出，但党内不允许存在有组织的派别。为体现民主的运转原则，突出集体领导，反对专制主义和独揽大权，法共在组织机构上作出重要调整。例如将原先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总书记职位改为全国委员会、全国局、全国书记处和全国书记。随后，1996年法共二十九大筹备工作中便开始实施民主的原则，从过去那种由中央决定一切的自上而下的筹备方式改为先从基层党员中提出问题，经过全党上下多次反复讨论，然后由全国委员会起草筹备文件，再交地方各级组织民主讨论和表决的新方式。法共二十九大确认，党的民主运转是实行新共产主义和建立新型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重申党内生活多样性原则，同时强调多样性是一种与民主的政治观念不可分割的、为法共新作用和公民干预服务的财富。

第四是在党的联盟政策上的调整。在党的联盟政策上法共长期主张左翼联盟，因此，建党以来曾与社会党有过3次重要合作，然而其联盟政策并未奏效。苏东剧变后，法国国内左右翼力量对比不断变动，社会党在1997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面对新的局面，法共进行联盟政策的调整，从过去主张左翼联盟政策转变为实行左翼进步力量新联盟的政策。新联盟政策旨在“将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都联合在议会和政府的多数派里，同人民一道，实行由人民选择的变革政策”。因此，法共扩大联盟范围，同社会党、公民运动、左翼激进党、生态一代、绿党、红绿联盟、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盟、共产主义同盟等政党和组织进行对话和会晤。进而，法共二十九大提出同右翼政策决裂的条件下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的方针，本着求同存异加强联合的精神，于1997年6月参政，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支持若斯潘政府的新政，促使政府决策最大限度地符合人民利益。

3. 新共产主义理论的主张

苏东剧变后，法共坚持共产党名称，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于党的二十九大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归纳为以下6个基本观点：

一是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法共强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男女自由、联合和平等的社会”，一个“发展和尊重个人的能力，使人类进行合作，分担费用，共享资源、知识、信息和权力的社会”，“一个没有失业，没有压迫，没有就业不稳定，没有不公正，没有暴力和没有武器的社会与世界”。

二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金钱逻辑，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主张。法共认为，“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和破坏力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受剥削压迫的人不仅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占工薪阶层人数的90%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因此要选择一条与现行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不同的道路。强调“超越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目标。“超越”是一种“社会变革进程的观念”，“不是

先打破一切，然后再建设新的东西，而是一边建设新世界，一边消灭旧世界”。

三是主张建设新型的共产党，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法共强调实行共产主义变革是要将民主置于首位，要把法共建成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和民主的党”。在法共的民主生活中，共产党人的多样性“不仅应当被容忍、被接受，而且应将其视为一种财富”。为此，他们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的可怕的歪曲”。

四是主张实行左翼进步力量变革联盟，坚持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法共强调“进行新的政治建设”，即把一切左翼进步力量联合在政府之中。为此，法共积极谋求参与左翼联合政府，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五是提出发展公民干预的新主张，坚持民主的斗争目标。法共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法国社会人民无法参与决策。因此要恢复民主的活力，把民主扩大到企业和公共生活、国家机构和新闻媒介等社会各领域里去，实行公民干预，使公民享有比代议制民主大得多的新的权利和权力。

六是主张实行合作的全球化。法共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更多地被“资本家力量用来实行统治和增加金融利润，因而成为无数困难和衰退的根源”，因此，要“用旨在获得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合作的全球化来取代现有的金融和唯利是图的全球化”。

四、小　结

（1）欧洲共产主义是当代发达资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它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与扬弃，是新时代、新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2）欧洲共产主义在党的理论上主张“新型群众性政党”的理论，认为党是包含工人、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公民等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群众性组织，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3) 在革命的道路上，欧共主张走以“和平民主”为主的道路，即争取选民支持而上台执政的道路，但不排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4) 在社会主义模式上，欧共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在政治上主张多党联盟、民主轮流执政；在经济上主张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社会生活中给人民大众以真正的民主。

(5) 法国共产党是当今欧共中的典型，它成功地以欧共精神为指导并提出新共产主义，成为欧共党中又一参政的共产党。

第三节　以色列的基布兹

基布兹（Kibbuts）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在希伯莱语中意为“集体定居点”。它产生于20世纪初，由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犹太移民根据民主、平等、公有等原则建立起来的。它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产物，但在实际运作中却采用了社会主义的做法，被誉为“成功的乌托邦”，受到世人的注目。

一、以色列概况

以色列位于西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新建立的国家。它是犹太民族的国家，因此，以色列人即犹太人。

历史上，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聚居地。犹太人的远祖是闪族支脉的希伯莱人，公元前6世纪以前称希伯莱人。公元前两千年，古希伯莱人就出现在亚洲西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古希伯莱人迁移到迦南地（巴勒斯坦）定居。公元前1700年，他们逃荒到埃及一住四百余年。他们沦为奴隶被迫做苦工。大约在公元前1250年，希伯莱人逃出埃及重返迦南地，公元前11世纪建希伯莱王国，后北部成为以色列王国，南部成为犹太王国。公元前10世纪统一为以

色列——犹太王国。公元前 922 年，英明贤能的所罗门王死后，又再度分裂。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国为新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 586 年犹太国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此后，犹太地区先后处于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等的统治之下。公元前 63 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公元前 4 年，圣经所说的耶稣诞生。从公元前 63 年至公元 70 年，犹太人曾三次起义反抗入侵者但遭残酷镇压，被屠杀者达 100 多万人。侥幸生存者被逐出境，流落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倍受当地封建主的歧视，只许他们经商而不许占有土地。他们成为没有国土的民族，时时怀念故都耶路撒冷，而犹太人的称谓也在这时开始普遍流行。公元 7 世纪，巴勒斯坦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其后该地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人。在 2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备受歧视、排挤和迫害。因此他们梦想重返先祖世居的土地，1896 年犹太族的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名震史坛的《犹太国》一书，主张犹太人是单一的民族，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1897 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号召各地犹太人回去建国。1901 年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会，筹集资金在巴勒斯坦购置并开发土地，犹太人纷至沓来陆续回归。1917 年 11 月 2 日，英国政府在美国同意下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公开宣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1918 年，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后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此后 30 年，在英国的支持下，聚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逐年增加，从 20 世纪初的几百人到 1919 年的 5.8 万人，1947 年达 60 万人，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的 1/3。但是，从公元 7 世纪起巴勒斯坦已为阿拉伯帝国占领，阿拉伯人已在该地占大多数。犹太人的大量回归加剧了阿犹之间的矛盾。为此，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即在这个地区建立两个国家：中北部 1.1 万平方公里为阿拉伯国，其余 1.4 万平方公里为犹太国。1948 年 5

月14日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当时人口仅60余万人，现已增至近500万人，绝大部分为移民回归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后代有白人、黑人、棕色人、黄色人。其国语虽为希伯莱语，但民间语言有上百种，那是移民从原居留地带回的。

以色列国土大部分是高原，90%的土地是山丘和沙漠，年平均降雨量仅400毫米，全年无雨期达7个月。资源缺乏，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以色列立国后，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极快。建立之初是半殖民地性质经济，主要靠美、英的贷款投资与帮助。民族工业被大量倾销的美国进口货挤垮，开工的工厂只有1/4。1952年有55%工人处于饥寒交迫状态。从60年代近期起，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制造工业迅速增长。到1976年，工业品出口值已超过20亿美元。1977年利库德集团取代执政29年的工党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自由放任取代原来的有计划的保护性经济措施，曾造成高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停滞。1984年成立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的联合政府后，采取“经济紧缩计划”，从而使经济状况好转。1992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单独执政，调整内外政策，经济发展较快。建国以来，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很多。50年代只有几百美元，60—70年代为数千美元，80年代为6—7千年美元。1990年增至10920美元，1994年高达13000多美元。建国仅有半个多世纪，已由一个贫穷的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跃进了世界富裕、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行列。犹太人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文盲的国家。儿童从四岁半开始读书识字，5岁到15岁均为免费义务教育。全国每十人中就有一个持有大学学位证书，每千人中有三个从事研究工作。它是现在世界上与美国可相媲美的高科技国家之一。由于人的文化素质高，在世界上被称誉为“聪明人”。

以色列的“兹布兹”是在犹太历史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促进了以色列国的建立及建国后经济文化的快速增长。

二、基布兹的建立与发展

（一）基布兹的建立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集聚、团结、集体定居点，可意译为社团、公社。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实体和群众的社会组织。

犹太人中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见诸于耶稣。耶稣当年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罗马统治者，要“大行公有制，彻底实行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里“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世纪30—40年代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给我们勾画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19世纪末东欧的犹太人社团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理想。这些人深受俄国革命者的影响，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未来的犹太人的国家是实现工人阶级和民族利益的统一。最早把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的是俄国和东欧的一批犹太革命青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残酷镇压迫害革命者。于是，俄国和波兰的一些犹太青年，抱着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跋涉来到巴勒斯坦、主张“劳动复国”。他们提出“劳动征服一切”，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和文化”，从而结束千年的亡国流亡生活，重建独立自主的国家。在那贫脊荒漠的土地上，这些两手空空满怀理想的年轻人只能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排除万难立住脚跟。1909年底，第一个基布兹在约旦河谷南端、金纳雷特湖边的德加尼亚地区建立起来。最初只有7个工人在一起，集体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自卫。基布兹既是生产组织、生活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半军事组织。基布兹运动兴起时就确定其奋斗目标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没有剥削、不分高低贵贱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最先进制度”。这个扎根于巴勒斯坦故土、以自食其力的劳动为基础的新运动、新潮流随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回归和加入。他们利用“犹太民族基

金会”提供的资金，从当地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一片片荒地，进行移民安置和开发，开始了基布兹创业的艰难历程。

1920年，在初期基布兹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犹太工人总工会。其目的在于要使自己“成为巴勒斯坦托管地内的犹太工人家园和未来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它不仅是一个工会联盟组织，而且是包括合作经济、农业垦居和拥有社会福利机构的广泛的公共社会。”① 犹太工人总工会的建立和活动进而推动了基布兹运动。到20年代召开了基布兹代表大会，确立了基布兹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所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个人收入均归集体所有；二是实行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和按需分配；三是权利平等民主管理，个人加入和退出皆自由；四是各尽所能，禁止雇工剥削。由于这四项原则，使基布兹为回归的犹太人提供了劳动和生活保障，基布兹实际上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农村根据地。20年代以后，从苏联回来的犹太人还带来了共产主义书刊和共产主义思想，为基布兹注入了新的活力。在20—30年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仅约占总人口的10%，他们依靠基布兹和犹太工人总工会的民兵同当地的阿拉伯人对抗并逐步扩张领土。1936年他们建了48个基布兹，到1947年建国前夕猛增到145个。可以说，正是基布兹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基地。

1930年1月在巴勒斯坦成立了以色列工党。该党以基布兹和犹太工人总工会作为社会基础，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社会主义。党的创建人和领袖本·古里安、艾希科尔、梅厄夫人等都在基布兹劳动过多年。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宣布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是立国三原则。以色列工党从1948年建国起至1977年，一直是执政党，大力支持基布兹的发展。这期间8个政府总理中有4个、还有1/3的政府部长都曾是基布兹社员。

---

①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第51页。

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也以基布兹为依托。至今工党仍掌握着近2/3的基布兹，其余1/3属统一工人党。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党的元老本·古里安，82岁高龄告老还乡，回到的是基布兹，半天放羊半天读书写作，1973年87岁逝世长眠于自己生前劳动过的基布兹。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埃·格拉诺特也曾在基布兹劳动过37年，他表示退休后也要重归基布兹。

（二）基布兹的发展

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得到进一步发展。1956年有227个，1990年为270个。它在经济建设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以色列生存与发展的支柱。以色列实行土地国有化，基布兹向国家租赁土地经营。全国约有300个基布兹经营35万英亩土地，占全国土地的35%；基布兹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近3%，占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半。而基布兹的农产品却占全国农产品的60%，占全国出口农产品的40%，棉花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基布兹密集使用土地，大力投入科技，精心培育新种，拥有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用电脑控制的滴灌和喷灌，用最少的水发挥最大的效益。从备耕、播种到收获几乎全部机械化。到处是良田、草坪、果园、菜棚、花房、林场。以色列的农业堪称高效、优质、多产的现代化农业。基布兹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65年一个人养活17个人，到1985年已增至67人。

以色列水源奇缺，发展农业受到局限，基布兹从60年代起大力兴办工业。1950年以前，基布兹只有工厂50家，1965年增至134家，1979年达332家，1991年已有380家。现在85%的基布兹都有一家以上的工厂。基布兹务工和务农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1969年是3：7，1979年为4.5：5.5，现在务工者已超过一半。基布兹办的乡镇工厂，原先多是修配厂和加工厂，后来有了制造厂，现在则有高新技术的现代化工厂。乡镇企业的规模也逐步扩大，现有2/3以上企业的产值超过10万美元，个别已超过

百万美元。乡镇企业的产值已超过农业的产值，有的已占60%。从80年代起年年出口创汇保持在2亿美元左右。

基布兹还凭借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开发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到以色列参观游览者，没有人不想造访这神奇而极具魅力的基布兹，现每年到此观光者达100多万人。80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基布兹的奇迹简直难以置信，亲临参观时目瞪口呆。此外，基布兹还对亚非拉许多国家提供农业技术帮助。总之，基布兹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它的人口比重。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基布兹还非常重视教育和培训，尽力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各个基布兹都有小学，几个基布兹合办中学。以色列没有文盲，首先从基布兹做起。基布兹学校的学生靠自觉学习，不考试，年年全部升级。18岁中学毕业后，除参军外都留在基布兹劳动。几年后选送报考大学，上师范院校者优先。长年有5—10%的基布兹在大学学习。满45岁，每个基布兹人可再到大学深造，更新原有专业知识或另学新专业。基布兹人一生中有两次上大学、两次选择自己嗜好的专业的机会，这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择业是个新的创造。此外，基布兹的乐队、合唱团、艺术团、博物馆都很出色，其舞剧团是以色列三大舞剧团之一。基布兹又是半军事组织，拥有相当数量的民兵，建国后这些民兵多数转为国防军。曾任国防部长、后任政府总理的拉宾原先就是基布兹的民兵。基布兹人大多被编入特种卫队，有40%的空军人员、90%的飞行员和指挥官来自基布兹。基布兹的青年长期过惯集体生活，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组织纪律性，还有踊跃参军的传统，所以成为国防建设的优秀后备军。

总之，基布兹已经发展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农工联合体，又是农工学兵四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它不仅是以色列赖以建国的基础，更是以色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三、基布兹的特色

基布兹集生产、生活和社会等事务于一身，既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特点大致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志愿加入财产公有

以色列的基布兹历经90多个春秋，延续了三、四代人。现有基布兹约300个，总共约13万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一半，仅占总人口的约3%。最大的基布兹有20000多人，最小的仅40人，一般约500、600人。

加入基布兹遵循自愿原则。几年满18岁者须服两年以上兵役方可申请加入；再经过一年考察才能成为正式社员。凡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社员，经社员大会2/3以上通过就要清除出去，基布兹可以说是做到了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基布兹实行高度公有制。基布兹创建时利用犹太民族基金购买了土地，这些土地为公共所有供大家共同使用。建国后，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基布兹以极低租金向国家租赁使用，租期49年期满再续租。基布兹内的一切生产资料，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娱乐等设施全部公有，基布兹成员的住宅、家具、家用电器及其它生活资料也由集体供给，个人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劳动产品全部公有，连个人额外收入也悉数归公。例如到政府或其它部门工作的社员的工资收入以及有的社员从联邦德国取得15万美元的赔偿都要交公。如成员要求退出基布兹，只能带走自己为数不多的私人用品，生产资料、服务设施、住宅、活动资金等公有财产一律不得撤离。此外，基布兹之间也不允许搞平调。

2. 人人劳动工种轮换

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基布兹人都必须参加劳动。每天一般劳动8小时，农忙时节还要加班。妇女生育后每日劳动减为7小时，

50岁为6小时，60岁为5小时。男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比妇女年龄提高5岁。基布兹人即便是国家议员和政府要员，每年也必须回来参加劳动25天。没有规定退休年龄，老人按照自愿，是否参加劳动均可。无劳动能力者由集体供养。中小学均设有劳动课，学生假期必须参加田间劳动。基布兹人视生产劳动为无尚光荣的人的天职，为创造财富、团结人们的原动力，鄙视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既不许雇工，也不受雇于人，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社员一年中大体上只干半年活，其余时间自由支配，学习、娱乐、外出旅游皆可。

劳动只有专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社员从事的工种采取自报、公议和领导决定三结合的办法来解决。成员定期在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社区服务等领域进行轮换，即使各管理机构的委员也要另外承担一份岗位劳动。夫妻两口子一般不安排在一起劳动。帮厨、社会服务和站岗放哨等由社员全体轮流担任，每人每年不得少于4周。每个成员劳动凭自觉，没有奖励和惩罚。一些基布基还开办没有劳动时间和工作量限制的企业，退休老人可以自愿到这里工作，以满足其劳动要求，调剂生活。

3. 集体生活按需分配

基布兹的衣食住行全部无偿供给，成员从生到死的一切需求，如教育、就业、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均由公家承担。

基布兹里分别建有生产区和生活区。生活区中心通常有公共食堂和俱乐部两大建筑，四周是住宅、托儿所、幼儿园、青少年集体宿舍和教室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基布兹的住宅多为别墅式建筑，以家庭为单位每户一个单元约50平方米。子女住集体宿舍，成年未婚者都有单间住所，已婚者另外分配住房。房租、水电免费，大型家俱和电器设备也免费。小楼群周围种满树木和花草，环境优美宜人，附近还有游泳池、网球场、俱乐部、文化室、洗衣房、育婴室、托儿所、幼儿园、少年之家、老年之家、

残疾人之家等设施。洗衣房还有人专管拆洗缝补。社员一家老小三餐都在大食堂用餐，丰盛的自助餐高级的“大锅饭”，有多种主食副食由你自己搭配。主菜每人可选一种，其它食品和牛奶、咖啡随便享用。公用餐具用毕放在洗碗机上洗刷消毒后下顿备用。不愿在餐厅吃的也可打回家去。公共大食堂还是基布兹的活动中心，除用餐外，周末集合、文化活动、选举、婚礼等都在这里举行。基布兹人的生活消费品由公家统一采购，定期登记领取。衣着按规定的数量、质量、规格，由集体依照成员提出的款式和花色品种统一制作或购买，或由集体发钱个人选购。社员外出访友探亲或观光旅游，要用什么车（摩托车、小轿车、小面包），用多长时间，头一天登记，由管委会统一安排；但是要自己驾驶。新一代基布兹人早已学会自己开车了。总的来说，基布兹人的生活水平在以色列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基布兹实行全面供给制，所有成员不分职务高低、工种差别和贡献大小，待遇全部一样。这种供给制本来是不给社员发钱币的。但是，由于人们的需要不尽相同以及经济的逐步发展，许多基布兹已取消了一部分供给制，给社员发放不等的货币作为生活津贴。或者用记账方式领取生活必需品（包括高档商品和进口货）和零花钱。收入高的基布兹，每人每月可领相当于 500 美元的谢克尔（以色列的货币），收入低的可领相当于 100 美元的谢克尔。同一个基布兹的成员，每人所得大致一样，差距不超 10%。自愿退出基布兹者，以往是不给任何报酬的，现在可根据在基布兹的劳动年限领取补偿，一年可得多少依各个基布兹的收入而定。例如，位于北部、建于 1915 年的启明星公社，有成员 1000 多人，农工业经营较好，退社者每年工龄可领 1500 美元。现在该社年年皆有退社者但又有新入社者。“共产公有”的全面供给制无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4. 计划经济统一安排

基布兹最初以农业为主，大多数人从事垦荒种植和蓄牧工

作。现在，随着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基布兹又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工补农以工养农，走上了多种经营的道路。

基布兹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等均由集体统一安排，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基布兹的生产经营主要按计划执行。生产计划是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政府及各种专业协会的配额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来制订的。生产经营的各种要素基本依靠社会服务组织和市场提供。其中农业方面的主要渠道来自区域合作组织和专业组织。这些区域合作组织由多家基布兹和莫沙夫（合作社）为适应市场竞争而联合组建的。它们通过其下属各种独立核算的企业为农民提供加工、经济作物开发、良种培育或采购、数据处理、财政保障、管理手段等多项服务。基布兹的农产品除自给外，其余全部推向市场。国内销售部分由全国农产品内销组织负责收购、加工和批发销售，占农产品总量的70%；外销部分则由农产品组织提供出口服务。

基布兹还重视科研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将其作为基布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他们除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究和技改外，还同国内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通过它们获取各种信息、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方法。尤其是农业方面。如国家农业部的技术推广服务局常将最新研究试验成果，派专人到基布兹进行传授推广。经过数十年的探索、改革和发展，基布兹已从原来封闭的独立农业发展模式转化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和科技密集型的高效农业。

5. 民主管理人人平等

在基布兹里，凡集体事务均实行民主管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事务都对成员公开。基布兹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为成员大会，由该基布兹的全体成员参加，通常每星期举行一次。大会主要内容有讨论和决定基布兹的发展规划、经营决策及其它社会活动；选举和罢免各级干部；审批预算和决算；吸收或开除成员，等等。大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一人一票制，一切

议案均需获得2/3赞成票方能通过生效。成员大会下设管理委员会，作为基布兹的核心领导和最高管理机构，负责主持基布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治安和民事等日常工作。除管委会外，还设有若干专业委员会，如生产委员会、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有的还设有住房、治安、青年、老年、保健等工作机构。这些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社区内的生产经营、产品销售、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具体事务。管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均通过选举产生，并定期轮换。任期二至三年（书记二年，专业主任三年），不能连选连任，只能隔届再任。年长者因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多被选为领导人，但不搞终身制，也不允许推荐或指定接班人，而是通过社员大会民主提名、改选，由较年轻者接班。所有公职人员都是全体社员的公仆，一旦选上，只有尽职服务的义务，而不享有任何个人特权。他们担负的管理工作是一种无偿的业余服务，不领取任何额外的报酬，仅仅视作一种信任和荣誉。在基布兹里，人人平等。从管理人员到普通的勤杂工，所有成员权利一律平等。几乎人人都能轮到一次担任管委会委员。同时实行有集中的民主制度。社员服从领导，听从指挥，遵守纪律；领导执行集体决议，接受群众监督，采纳合理建议，这种双向的民主制度受到基布兹人的推崇。社员们都非常热爱、关心基布兹。那些因工作变动而远离者时常要回基布兹看看，甚至老而终归基布兹安魂基布兹。

6. 婚姻家庭子女教育

基布兹的婚姻家庭与对子女的教育也独具特色。

基布兹全体社员之间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为了更新理念，他们不用“结婚”、“丈夫”、“妻子”等旧词，而代之以“成双”、“伴侣”等新语。恋爱对象多是另一基布兹的社员。两人情投意合决定“成双”时可向管委会申请一所双人住房，得到住房后即可合法同居。大多是第一胎孩子要出世时，这对“伴侣”才依法举行“成双”典礼。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合法权

益。“成双”年龄多在21—25岁之间。早期的基布兹因处于艰苦草创阶段，为减轻负担，曾规定不许已成家有子女者加入，后来允许。过去一对夫妇允许生一胎，现在大多生两胎，少有更多孩子者。孕妇满6个月可增加营养食品，满8个月可缩短工时或改派工作。产妇住院约一周，出院一周后就把婴儿送育婴园，母亲定时去喂奶。一般是9个月完全断奶，然后母亲全面恢复正常工作。婴儿都交育婴园由哺育员关照，一周岁后转到托儿所由保育员看管。哺育员与保育员一律由经过特殊培训的女性担任。4—5岁的孩子再转到幼儿园，由老师开始进行启蒙教育。7岁上小学，12岁之前学习与生活都由老师严加管教，随后逐步增强独立生活能力。年满13岁者一般都不再与父母同住，而迁入少年之家两人合住一套房间。中小学生严禁接触各种色情书刊和影视，也不许用香水化妆品等会刺激性能的物品。男女学生都是集体活动，不许单独约会。18岁中学毕业还要服两年兵役，方可申请加入基布兹。在基布兹流行这样一句口号：“基布兹是基布兹孩子的母亲。”基布兹使得新一代，从不到满月的婴儿起到中学毕业止，从小长期过集体生活受集体教育，集体学习集体劳动。所以集体主义、平等观念、团结意识极强，血缘观念、家庭观念、等级观念较为淡漠，没有“娇皇帝”、“娇公主”式的小孩。由于家务劳动大都已社会化，又没有多少教养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更没有什么财产纠纷，所以基布兹的家庭一般都很祥和、美满、幸福。离婚率只有0.3%，是世界各国最低的。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基布兹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全都突出一个“公”字，它在很多方面做到了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共产主义：它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人人权利平等，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实行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政治职能也基本消失。

四、基布兹的评析

1. 基布兹的奇迹成因

基布兹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道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风景线，基布兹的奇迹成因是：

第一，犹太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一致、勇于创新的精神；

第二，基布兹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代代相传的无私无畏、服务大众、以身作则、坚持不懈的精神和风格；

第三，基布兹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有犹太人善于精打细算巧于经营开拓的长处，又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特点；

第四，基布兹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文化素质高，重视科技，以科技促经济。

2. 基布兹的问题和困难

从第一个基布兹呱呱坠地到今天，基布兹已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基布兹不断发展壮大，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第一，缺乏理论指导。基布兹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它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产物。创业者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创建过程中不自觉地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做法。它是以色列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没有理论指导的村社，必将会出现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公有化程度太高。基布兹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都属公有，人们缺乏独立自主性。而与基布兹几乎同时一起创建的莫沙夫（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比起来“相形见绌”。莫沙夫的部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归农民自己所有，劳动所得主要部分归社所有，按劳分配。目前以色列有莫沙夫约 450 个，占以色列农业人口的多一半，占全部耕地的 1/3，是以色列农业的另一大支柱。当莫沙夫的优越体现出来时，基布兹体制的魅力正在削弱。

第三，绝对平均主义的不合理。基布兹实行人人绝对平均的按需分配制度，不管个人能力如何贡献大小，人人享受同样待遇。它没有必要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靠觉悟、热情和责任感来工作，这种大锅饭的体制难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合理的，相对于不同的人（能力有大小、技术有高低、贡献有多少），应有不同的报酬，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公平合理的制度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四，经济方面的难题。一是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下降，导致许多基布兹盈利减少经营困难，现在运作良好的基布兹只约有 1/3，其余 2/3 出现程度不同的亏损。二是严格的计划生产与集中管理，使各生产企业和成员没有自我决策权，也不利于各生产企业和成员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这使基布兹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减低了基布兹的竞争力。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加快发展已脱离基布兹独立，转而采取合资、股票、雇工、工资和资金等激励机制。

总之，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基布兹不要商品、市场、货币的公有制供给制和平均分配制难以为继，基布兹负债累累，人员外流，人口老化，困难很多。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发展高新科技企业。我们相信聪明的犹太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合适的改革，既保持自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特色，又使这种制度生机勃勃，成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楷模。

结　语

基布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共产主义村社，给我们带来启迪和向往。谁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共产主义还很遥远渺茫？基布兹给我们勾画了现实的图景。在充满竞争、人人高度紧张的现代化社会，也许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带来的问题也很多。而基布兹成功“乌托邦”的公有公正公平，彼此的融洽精

神的愉悦，以及衣食住行上的无忧无虑等，将会更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而使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更加向往。

这便是基布兹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四节　日本的山岸主义

日本的山岸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共产主义村”，它是汲取中国老子的思想而创立，又在老子的思想指导下进行运作的共产主义试验村。

一、山岸主义概况

山岸主义社会的创始人是山岸已代藏。1953 年 3 月山岸倡导建立了山岸会，1957 年他创立了“山岸百万只科学工业养鸡株式会社”，1959 年 4 月他在“株式会社”的基础上创建了山岸主义社会，1961 年 5 月 3 日山岸故去，时年 59 岁。40 年后的今天，山岸播下的理想国的种子结果在日本 47 个县及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泰国 7 国。理想国的本部设在村民最多的丰里，它位于日本中部三重县津市郊区。

丰里实验地的现任理事冲永和规，其职务是“农业工会法人”。冲永和规是日本中央大学毕业，1968 年 23 岁时和 30 多人携 5000 万元接下山岸旗帜。他们中多数曾是日本共产党党员，脱党后来到丰里。冲永有一儿一女。儿子现在德国实验地，女儿曾在大阪体验村外人的生活 2 年又复归丰里。

加入山岸社会必须经过“人生观的转换”。山岸主义者认为，现代日本人“精神的贫乏是不能用物质的丰富和机构的改革来解决的”，“必须要对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道德、人伦、肉体、精神、教育、学校、思想等一切之一切实行急速的变革”，“生活方式、财产、职业、人生观等也要为之一变”，从而“建立物质丰富的、健康的、充满亲爱情谊的、安全而舒适的社会”。

人生观的转变是通过宗教式的宣传来进行的。从1953年起建立的山岸会每年在全国一些固定的地方举办几次“特别讲习研讨会”，研讨会把农村的聚会和佛教的“禅”结合起来。信徒们集体静思，重新认识人生出发点。在静思中大彻大悟，在一瞬间由世俗社会的“小丑鸭”变成理想社会的“大天鹅”，即变成“真正的自由、真正幸福的人”。通过人生观的转变，信徒们提出申请变卖自己的财产归公，于是他就成了山岸社会的一员。

山岸主义社会是特立独行的社会团体，进入者必须信仰坚定，有财产者上交，无财产者亦可进村。进村后也可出村，出村之人有不回头亦有二进宫者。一般人多不愿出村而至终老，出村的人多数是走进另一村——国内47个、国外7个实验地。二进宫者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洗脑”合格后再行进入。柳本佐由美，大学时听了山岸主义讲座，一毕业即和男友进村，结婚生子已过26年。她曾在德国实验地体验2年。横滨华侨二世何洪章夫妇8年前在丰里听了“特别讲习研讨会”后茅塞顿开，于1996年2月率全家四口落户丰里。丰里有德国、瑞士、韩国、巴西等外籍村民。进村26年的柳本极少出村，她说：“我们习惯了丰里生活，满足这里的一切，什么都不缺出去干吗?”丰里人不大愿意出村，是因为他们觉得“丰里是健康洁净友爱的社会，外面太脏太乱太缺人情”。他们把实验地自诩为“不要钱的和睦快乐村”。

山岸主义的徽记是：太阳环绕一颗心，是寓意阳光照耀下的自然人，还是自然人从太阳吸收光和热，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二、山岸主义的特色

山岸主义的特色大致有三：

1. 居民生活一体化

山岸主义的创始人山岸尊奉老子，信仰《道德经》，主张“法自然”。他在他的实验地里建立老子“圣人无私，圣人无藏，既以为人，既以与人”的理想国。他认为“人因无私藏，便会有

余”，因为他人服务，自己“愈有”，因无私“故能成其私”。山岸故去后，他的继承人在他的实验地里发展了其“生活一体化”的思想，即生活在金钱个人无所有、集体所共有的村庄里使其身心愉悦。具体是：村民进村时个人财产，包括金钱，衣物、首饰、家具、书籍等一切充公，变成身外无一物的“无所有”的村民。进村一星期，由村里的理事对新人进行“生活一体化”的理念教育，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其争”。不争的人是上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争即无错。村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生气，生气就要开除。村里一切财产、通货村民共享，个人无秘密，村民无报酬，干活凭意愿。

无私“故能成其私”，山岸人无所有的另一面是全所有。丰里承包了村民的一切事——出生吃喝求学医病婚丧，即“生活一体化”。村民早上五点起床，用半小时整理身心，然后各自参加劳动；七点半集合召开“出发会”，安排全天活计，接着继续劳动；下午四点半收工，再集合总结全天工作。不发工资和报酬，全部实行供给制。村民住所皆备有电视机，出外所需物品根据需要自行取舍，商店物品随意取用调换。吃在食堂，“爱和”食堂的硕大牌匾上书写着日文汉字“满吃讴歌”。食堂一日二餐，早10点晚5点，这与中国古代习俗相同。用餐时间外亦可随时取用。食谱极为丰富，煎烤烹煮应有尽有，但无烟酒。因为“烟污环境酒乱性，所以禁止”。十人一桌，随意而坐，吃喝间还进行心灵沟通。若有人想吃特色菜肴，可在食堂橱柜中留下字条，食堂据请求单而外购。他们有这样的权利：物质是大家创造的，大家有权享有能够享有的一切。

沐在“和乐”浴室。主为洗心次为净身，用自然之泉除却身心污秽，留下人间春色。浴巾公用，每天清洗消毒。衣服皆有编号，各人认取自己编号的衣服穿用。14个女学生负责洗衣，每晚1800名村民净身后的脏衣服按种类搁入洗衣房窗口，翌日，洁净的衣物出现在有编号的衣服柜子上。日常衣服搁置一处，另

有一衣帽间有专为走出丰里去探亲访友出差人储备的礼服。该间名牌服装、鞋帽、领带、手表、金银首饰、化妆品一应俱全，还有丰里人自己设计缝制的新衣。使用者留下借条即可，无人管理。外出者还可向负责人领取车资礼金。

65岁以上的老人入住“老苏馆”，即养老院。取名老苏意为获身心复苏，并非养老等死。这里有百来人，中有早期创业者亦有外来投靠者。对他们视体力而行事，无人分配其活计，不能劳作者可安心颐养天年。丰里还有设备完善的医院，但医生寂寞，医院是“针器手术刀无用武之地”。为何？人无忧烦，病从何生。所以，老子所说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即此写照。

2. 经济经营一体化

丰里有土地100公顷，有16个生产经营部门。16个部门各推出一名负责人，这16人组成工会集体商讨村里大事。负责人干满6个月自动离任。每年6月、12月也是成人调换工种的季节。此外还有行政部门的“调正部”，负责解决村民的一应大小要求。

丰里约有1800人，大人孩子各占一半。900名成人自愿组合成班级，每班50—60人。共有16个部门，有15个班大致从事以下农林牧副加工等工种，具体有养牛、猪、鸡，种稻、菜、树、茶、草、蘑菇、果树，农、水产品、乳业、肉类、饮料、木材加工，制造有机肥、建筑、运输、出版印刷业，另有行政、销售与科研组成一个部门。村民根据自己的特长先行选择工种。如来自德国的女村民善做比萨饼，横滨华侨何洪章夫妇开过餐馆，他们首先选择了食堂。何妻郑爱芬做的“杏仁豆腐”很受大伙欢迎。工种半年一换。依村外人俗念，是否都选择坐办公室等轻松活儿，而养猪、堆肥等重活脏活无人选呢？桥口说山岸人不会这么做。假如自己的意志与外界冲突，有“朋友研讨会”帮忙解决。各班级成员每晚开会，是为“朋友研讨会”。白天想不通的

问题，傍晚净身后讨论解决，夫妇之间的交流时间少于朋友会。“朋友研讨会”是山岸生命的有机肥，“个人物质无所有不等于精神负担无所有，一旦产生精神之累”，朋友会成员一起把班上朋友的精神负担化成无所有。

山岸人倡导“劳动是人们第一需要”、“以农为本兼顾别样”、“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山岸人认为做人要做对社会有贡献全面发展的人，而一个五谷不分的大学毕业生在山岸人眼里是不及格的，而一个“合格”的人则是把劳动当成他的第一需要的。村民干活没有报酬，也没有命令规则，劳动是他们自觉的需要。山岸人重视农业，认为世上学问皆由农而生。比如果树栽培涉及到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问；认为农业别于工业、国防，它是有生命的物质，而有生命的物质使人从心底感到愉快。山岸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动植物人一体化”。他们利用自然界赐与的太阳、空气、水土创造出“循环农法”，使其经营一体化，即与自然界同存共荣。所谓“循环农法”即各工种之间相互结合渗透。他们拒绝使用化肥，不让这种非自然品进入人的机体。“我们这里的农产品是百分百的自然食品”。他们还与动物构成“一体化”。对催乳业，他们是这样认识的。“催乳非挤或榨。人与牛只有建立在深深的信赖关系之上，牛乳才会流淌。催乳是人与牛沟通的重要一环，只有好的沟通才能产生好奶。”其做法是，一组48头牛列队产奶10分钟产奶15—20升。其牛奶供日本中部、近畿地区30万人饮用。丰盛的农林牧副产品除供本村1800人吃喝外，余下出售到全国各地52个销售网点。他们还一年两次用丰收产品招待村外人。每年约有5000多名拿工资的人分享了“共产主义成果”，堆积成山的鸡蛋，蔬果随你拎取。这几年丰里每年创收100多个亿，纳税约70亿元。1996年他们花数十亿元在附近买得一高尔夫球场，填洞种草。顾大的草场上写着“天—地—人”三个大字。他们这样注释：天地人调和共生是使个人物质丰富，健康、亲爱的保证，是使他们过上安宁、舒适生活的条

件。他们把这一注释庄重地写在他们的名片背面。

3. 山岸人的精神理念

(1) 人人平等、财富共享。人人平等财富共享是山岸人的社会理想。村民进村时所有财物上交归公，个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但村里的财产都为大家所共有共享。村民一律平等，不分上下级，没有命令规则，工种轮流，负责人亦轮流担当。村民干活不支取报酬，不分配任何物质，但你生活所需却皆由村里提供配给。这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小社会。不管你进村时是信仰者、厌世者、体验者还是逃避者、栖身者，进村时就必须树立山岸的共产主义理念，并以此理念融于你的生活。

(2) 得道者足、知足者富。入夜，山岸村民身着和式浴衣，手摇团扇，在晚风中从容微笑。问为何如此惬意从容？他们道："熟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得道者足，知足者富。"原来他们得到"共产主义"这个道，所以心中无比满足。满足写在村民脸上，笑意经由心底。最是那个眼神，不急不躁平和温静，那是"知足者富"的映照。他们不但满足，而且懂得满足，所以已无所求，对私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视以不屑，他们是这世界上的最富裕者。因而他们做到了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3) 热爱农业。山岸人说："农业是我最爱，吃到自己亲手载种果实的喜悦，非干农业者所能体验。"因此，他们不愿做远离农业的人，他们品尝着收获时的芬芳味道。孩子们从小是在"热爱农业"的教育下成长的。约有 900 名学生。1—5 岁儿童与父母同住，6 岁始过集体生活，每月回家团聚一次，孩子们从小就被教以农业知识，教材是土地上生长的一切农作物，教学课程的设置以农为核根据 24 节气渐进。所以，他们自我认定自己是农业的继承人，认可劳动最光荣，认可农业之伟大。

(4) 无为而治。山岸人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们认为“为无为，事无事”，是高级的管理方法。当年的创始人山岸谨遵老子妙言治已国，而今他的追随者仍依此法治村。山岸主义社会能在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发展壮大，除共产主义理念外，“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及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三、结　语

40年来，山岸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小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国度中茁壮成长，不能不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迪与触动。它的创始人山岸已代藏汲取中国老子的思想，不自觉地尊崇共产主义的信仰，哺育出一个自由、幸福、满足的天堂。不管外界传闻议论如何，不管一般日本人的摇头疑惑，他们在自己拥有的那片土地上垦荒、种植、收获，还把共产主义的种子撒向国内外54所实验地并开花结果。冲永和规说，别人怎么看山岸是别人的事儿，山岸的成长壮大是否合乎道才是最要紧的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日月星光下，山岸人耕耘着农田，向我们展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丰采，带给我们无限的憧憬与美好的未来。

第五节　尼赫鲁的民族民主社会主义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的领袖之一，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国大党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尼赫鲁，1889年11月14日诞生于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婆罗门贵族家庭，从小受其父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1905年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哈罗公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自然科学。获学位后又进入伦敦内宫法学院，1912年取得律师证书后回到印度，任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律师。同时参加了国大党，开始了政治生涯。从1918年起，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0

年参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争取印度独立运动中曾9次被捕入狱，在狱共达10年之久。1929年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其后屡次当选为该党主席（1936、1937、1946）。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后出任总理，直至1964年5月逝世。任期内，在政治上废除土邦王公的特权，确定议会民主制，建立统一的世俗民主共和国。经济上，废除柴明达（中间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接管英国殖民政府主管的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和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体制。在社会方面，主张废除不可接触种姓制度，提倡“机会均等”、“社会公正”等。外交上，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

一、尼赫鲁模式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尼赫鲁不仅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而且还涉猎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许多书籍。同时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其中包括拉斯克的自由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影响。1912年从英国回到印度后，在圣雄甘地的影响下，他参加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深入农村，看到农村极端贫困的现象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只是民族主义还不能完全拯救印度，印度不仅需要独立而且需要摆脱贫困。1927年，尼赫鲁代表国大党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接触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同年11月，他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对苏联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这次苏联之行使我从新的角度看待历史和现实”，“对印度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返印后他开始传播他的社会主义思想。1929年12月在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上经甘地推荐，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兼全印工会大会主席）。在主席致词中他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分子”，“民族运动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农民

和工人支持的程度。只有赞助他们的事业，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这次年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1936年勒克瑙国大党年会上，他重申相信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希望国大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1944年，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研究了马克思和列宁，对我思想有很大影响，帮助我用新方法观察历史和现在的事情。”他表示他已在考虑“如何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得人心，社会主义给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带来希望和信心。尤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对印度产生直接影响。尼赫鲁说：“中国革命已经推翻了世界大国的均势，世界重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因为我们距这个中心较近，所以，影响我们的程度也较大。”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尼赫鲁当选为第一任总理。1949年11月印度通过第一部宪法，宣布印度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1950年7月7日尼赫鲁在新德里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我决定容许人民和平地随便怎样讨论或宣扬共产主义哲学。但是，如果共产主义——任何主义——使用暴力的话，那么任何国家都必须加以镇压”。1954年尼赫鲁访华后在人民院发表演说时提到要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同年12月，人民院通过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社会”。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年会正式通过关于要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1956年1月国大党政府对帝国银行和人寿保险业实行有偿国有化，4月开始实施以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为目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7年国大党印多尔年会，通过关于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合作联邦”的决议；同年12月，国大党成立了“社会主义论坛”。1959年国

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了关于合作耕种的决议。1962 年将“社会主义论坛”改为“社会主义行动论坛”。1964 年国大党通过了关于“以和平的、合乎宪法的手段，建立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决议。至此，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式为国大党所接受。“坚持‘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原则”与“坚持‘混合经济’和‘计划经济’”载入了国大党的党纲。

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1. 第三条道路的“中间社会主义”

尼赫鲁倡导“中间社会主义”道路，即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单纯政治上的民主所产生的一些弊端在美国是很显著的，而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民主所产生的一些弊端在苏联也存在着。”他说，印度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印度思想中产生，而且必须适合印度条件的社会主义。尼赫鲁在解释其民主社会主义时说：这就是如何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也就是如何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而同时在国家和国际方面对于国民经济作集中的社会管理和计划。1954 年 12 月，他在人民院国大党议会党团会议上说，“整个搬用美国或共产党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印度有害的，只能采取中间社会主义道路”。1956 年 12 月，尼赫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中进一步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的新天地”。尼赫鲁这种“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沿袭西方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2. 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

尼赫鲁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影响

下形成的。尼赫鲁认为，社会主义目标只能通过甘地主张的非暴力的和平手段，用民主和宪政的方法来实现。他说，社会主义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一种“民主的方法”。“一切问题只要运用民主的方法都可以得到解决。相反，离开了民主的方法任何企图将会导致分裂。”民主就是“尊重个人”和不牺牲个人。他信守甘地主义的非暴力原则，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并且指责共产主义滥施暴力、把自己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等。他说：“从理论上讲，用民主的方法是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当然，它要以获得民主进程为前提，社会主义不应抛弃民主。”尼赫鲁的这种社会主义在1964年1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

3.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

尼赫鲁早年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争取民族自由斗争中，他坚决主张完全独立，反对成立自治领。在他的倡议下，国大党在1927年和1929年年会上两次通过了他提出的完全独立的决议。1936年，尼赫鲁在给国大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指出：“继续坚持这两种观点（指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是印度社会党人的课题。”后来，他又说，“就印度来说，就印度目前所处的地位来说，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赞成独立，社会主义最终将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

尼赫鲁认为他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废除私有制，但要对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土地实行国有化。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姓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他把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最终结果归结为要实现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和充分的就业。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机会均等”、“消灭贫困”等为准则。

此外，尼赫鲁还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日益靠拢，区别也在缩小。资本主义正在逐步变成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想。

三、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

1. 实行公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

1950年3月，印度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1年起实施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尼赫鲁经济计划的前提是建立包括公营和私营两部分经济的“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政策指导下，尼赫鲁政府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便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大力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1950—1956年度，印度政协先后将民用航空、帝国银行、人寿保险和科拉金矿等收归国有，并从英国人手里接管了铁路、邮电和军火工业；“二五”计划期间由国家财政直接投资和利用外援建立公营企业。印度公营经济领域主要在电力、运输、煤炭、石油勘探和炼制、钢铁、化工、机器制造、建筑等投资大、收益慢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部门。其中有3个钢铁厂是在西德、英国和苏联援助下建立。根据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公营企业的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政府允许并鼓励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私人企业在“混合经济体制”中仍占主要地位。

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实行了3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印度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部门都得到很大发展。在公营部门建立了许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实体，国营部门在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这使印度的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改变了独立初期重工业落后的经济结构，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使印度走上了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2. 实行废除中间人制度的土地改革

印度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独立前，占农村人口15%以下的地主、富农拥有农村土地的85%，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雇农、中农只拥有农村土地的15%。他们遭受严重的封建剥削，农业生产力长期低下，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尼赫鲁政府于1949年公布了土地改革委

员会的报告，建议各邦实行土地改革。土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废除柴明达（中间人）制度，他们的土地由政府接管，佃农向国家直接纳税。当时，印度农村约有43%的耕地面积实行“柴明达”土地制度。这种制度早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之前就已存在。当时的“柴明达”地主是国王的包税人，亦称“中间人地主”。英国统治者承认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因而成为法定地主。1955年，土改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绝大多数省（邦）都废除了柴明达（中间人）制度。被废除的“中间人”共有250万（包括家属）。政府用赎金办法接管了3.6亿英亩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38%。简化地权减少转租，2000多万佃农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由于政府允许“柴明达”保留大量“自耕地”，因而“柴明达”在农村的地位和影响并未完全受到削弱。政府接管的土地又出售给农村的富裕者，这些人成为农村中新的权贵，而农民的土地要求并未得到满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即实行“规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1959年5月国大党通过了“土地限额法”，建议政府至迟到1959年底在全国立法规定现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这项法令在3年内实施，凡超过规定限额的土地应归村评议会所有，并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大党政府的土地限额法进行过多次修改，但由于各级官员的庇护和地主采取种种转移土地的手段，使可供分配的土地寥寥无几；又由于各邦政府规定的土地最高持有限额各异，有的规定的最高限额很高，使大地主家庭保留了大量土地，各邦只剩下少量土地可供再分配。据1976—1977年的第二次农业普查，印度全国共有农户8150万，其中拥有不到1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54.6%，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7%，而占全国总农户3%的地主，却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26.3%。所以，土地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打击封建土地制度。

但是，国大党政府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势力

和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柴明达”中间人被废除后，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50—60亿卢比的补偿金，又以“自营”名义保留了大量好地，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许多地主开始采取雇佣劳动经营农业的方法，开办现代化大型资本主义农场，富裕农民利用土改和国家的帮助，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成为新式富农，为印度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3. 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有过“土地的合作化或集体管理”的设想。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在考虑如何发展印度农业时，受苏联农业合作化和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影响。1955年底和1956年7月，尼赫鲁两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农村合作化运动。1959年国大党通过了关于合作耕种的决议。指出：将个人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交给无地的农民组织合作社；认定合作社经营将是农业的基础，实行联合耕种将是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预定在以后数年内，在全国将布满合作社。会后，尼赫鲁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印度每一个村庄建立乡评议会、一个合作社和一个党校。……合作社负责购买肥料，良种和出售产品。”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合耕种社、佃农耕种社、信贷合作社等。到1964年，全国共建立了35万个合作社，覆盖83%的村庄和4.07亿人口。合作化运动将分散的土地联合起来，有利于使用农业机械和改良土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地主和富农一般在这些合作社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土地入了社，但保留土地所有权。他们一般不参加劳动，而由入社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或雇一部分雇工去耕种，产品收入主要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股多少进行分配。从而，合作化运动并没能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

4. 社会政治方面主张公正与民主

1955年担任国大党总书记的斯·纳拉扬对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进行解释时提出了七项基本原则，其中“充分就业

和人民有工作权利”、“社会和经济正义”、“首先关心和满足最下层和最穷苦的人民的要求”三项原则都是属于社会公正的。1957年12月6日，尼赫鲁在议会民主讨论会上说：“我们从政治民主发展到经济民主的概念，首先意味着为全体人民谋求某种福利，称之为福利国家。”1959年1月，国大党年会通过竞选宣言称：“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是一种全体人民都有自由、幸福和平等的、完满的社会。”尼赫鲁还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一步解释说，社会主义指的“是一个机会均等和每个人都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我们应当注意不要把国内生产的物质财富落到一小部分很富裕的人手里，而是在穷苦的群众中间分配。”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尼赫鲁还实行多党制、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印度还有印度人民党、人民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等多党合法存在并参加议会选举和大选。议会实行两院制，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联邦院有议席224席，（最多不超过250席），其中12席由总统指定，其余的按比例分配给各邦议会及中央直辖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一次，每次改选三分之一；联邦院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宪法规定副总统为法定联邦院议长。人民院共511席（至多547席），其中各邦525席，中央直辖区20席，任期5年；人民院中占有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出任政府总理。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其实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给印度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初步地建立了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私人垄断资本不断加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奠定了现代印度的基础。但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也给印度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印度的经济虽有所进步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严重存在，所谓“社会公正”、“机会均等”等不过是宣传上的口号而已。公营和私营企业之间、种族之间、教派之

间的矛盾日趋严重。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打击封建土地制度，农民不断破产，无地、少地农民队伍增加，封建地主势力仍然强大。尤其是，尼赫鲁所实行的混合经济是在不消除农村封建势力和大垄断集团的基础上建立公营企业。其所标榜第三条道路是既要保障大垄断集团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利益，又要实现公正、平等。这一道路实行的结果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印度中产阶级的队伍扩大生活得到改善。但大垄断集团的资产不断膨胀，农村封建势力依然存在，贫困没有消除，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

尼赫鲁逝世后，由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夏斯特里继任总理。1966年1月夏斯特里去世，由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在任推行绿色革命改革农业，使印度粮食增产，到1977年基本停止进口粮食，同时工业产量也有所提高。1984年10月31日，执政15年的英·甘地遇刺身亡，由其长子拉吉夫·甘地上台。拉·甘地在任时对“混合经济”作了较大幅度调整，使印度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1991年5月21日执政才5年的拉·甘地又遇刺身亡。

在尼赫鲁家族执政的35年内，印度政治、经济都有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民族矛盾、教派斗争的激烈，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3次战争和印度与中国的中印边界战争，削弱了印度的力量，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导致了英迪拉·甘地及拉吉夫·甘地的被刺，影响了国内的建设，致使印度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

1998年开始，以印度人民党（国大党的反对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执政，印度人民党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为印度总理，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暂时告一段落。

原著附录

第一章　附录

莫尔：乌托邦（节选）

《乌托邦》第二部

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转述

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大部分不亚于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由于到处陆地环绕，不受风的侵袭，海湾如同一个巨湖，平静无波，使这个岛国的几乎整个腹部变成一个港口，舟船可以通航各地，居民极为称便。

……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各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城市之间最近的相隔不到二十四哩，最远的从不超过一天的脚程。每年每个城市有三名富于经验的老年公民到亚马乌罗提集会商讨关系全岛利益的事。亚马乌罗提作为全国中心的一座城，其位置便于各界代表到来。它被看成是主要的城，亦即是首都。

各个城的辖境分配得宜，任何城的每一个方向都至少有十二哩区域，甚至更宽些，亦即两城相距较远的一面。每个城都不愿

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

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充足的农具。市民轮流搬到这儿居住。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①

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在那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新来者本身次年又转而训练另一批人。这样，就不发生由于技术缺乏而粮食年产会出问题的危险。如果大家同时都是不懂农业的新来者，这种危险就会不可避免。虽然农业人员的更换是常规，以免有人在不愿意情况下被迫长期一直从事颇为艰苦的工作，然而许多人对农事有天然的爱好，他们获得许可多住几年。

农业人员的职务是耕田，喂牲口，砍伐木材，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将木材运到城市，视方便而定。他们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母鸡不用孵蛋。农业人员使大量的蛋保持一样的温度，从而成熟孵化。小鸡一脱壳，就依恋人，视同自己的母亲！

他们饲养少量的马，全是良种，只供青年驰骋锻炼，不作他用。耕犁及驮运是由牛担任。他们深知牛不如马善于奔腾，但是牛比马更吃苦耐劳，又较少生病。此外，牛的饲养更经济省力。超过服役年龄的牛还可以供食用。

他们种谷物，专当粮食。他们喝的是葡萄或苹果或梨子酿成的酒，甚至只是水。他们有时喝清水，但通常水里加上煮过的蜂蜜或当地盛产的甘草。

他们对于本城及附近地区消费粮食的数量虽然心中十分有数，却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谷物及牲畜。他们将剩余分给邻境

---

① 飞拉哈（Phylarch）——希腊语，意谓部落酋长。——中译者

居民。当他们需用农村无从觅得的物品时，就派人到城市取得全部供应，无须任何实物交换，城市官员发出这些供应时是毫无议价麻烦的。反正每月逢假的那一天，农村中许多人进城度假。

将近收获时，农业飞拉哈通知城市官员应派遣下乡的人数。这批收割大军迅速按指定时间到达后，几乎在一个晴天飞快地全部收割完毕。

……

关于官员

每三十户每年选出官员一人，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名叫摄护格朗特，[①]在近代语言中叫飞拉哈。每十名摄护格朗特以及其下所掌管的各户隶属于一个高级的官员，过去称为特朗尼菩尔，[②]现称为首席飞拉哈。

全体摄护格朗特共二百名，他们经过宣誓对他们认为最能胜任的人进行选举，用秘密投票方式公推一个总督，特别是从公民选用的候选人四名当中去推。因为全城四个区，每区提出一名总督候选人，准备提到议事会去。

总督为终身职，除非因有阴谋施行暴政嫌疑而遭废黜。特朗尼菩尔每年选举，但如无充分理由，无须更换。其他官员都是一年一选。

特朗尼菩尔每三天与总督商量公务，倘有必要，可以有时更频繁地接触。他们商讨国事。但如公民私人间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是不多的），他们总是及时处理。他们经常让两名摄护格朗特

---

① 摄护格朗特（Syphogrant）——对本词希腊语原意，各家解释不一，有人解为老人或长者。——中译者

② 特朗尼菩尔（Tranibor）——各家对本词希腊语原意有不同解释，一说指坐首席席位者。——中译者

出席议事会，这两名每天不同。他们规定，任何涉及国家的事，在通过一项法令的三天前如未经议事会讨论，就得不到批准。在议事会外或在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以死罪论。这种措施的目的，据他们说，是使总督及特朗尼菩尔不能轻易地共谋对人民进行专制压迫，从而变革国家的制度。因此，凡属认为重要的事都要提交摄护格朗特会议，由摄护格朗特通知各人所管理的住户，开会讨论，将决定报告议事会。有时问题须交全岛大会审议。

此外，议事会照例不在某一问题初次提出的当天讨论，而是留到下次会议上。他们一般这样作，以防止任何成员未经深思，信口议论，往后却是更多地考虑为自己的意见辩护，而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即宁可危害公共福利，而不愿使自己的名声遭受风险，其原因是出于坚持错误的不适当的面子观点，唯恐别人会认为他一开始缺乏预见——其实他一开始本应充分预见到发言应该慎重而不应轻率。

关于职业

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就从事实际操作。

每人除我所说的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是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这种衣服令人看了感到愉快，方便行动，而且寒暑咸宜。哦，每户都是做自己的衣服呢！

除了裁制衣服而外，其它的手艺都是每人学一种，男的如此，女的也是如此。妇女体力较弱，因而做轻易的工作，一般是毛织和麻纺。男人担任其余较繁重的活计。子承父业是一般的情

况，由于多数人有这种自然倾向。但如任何人对家传以外的其他行业感到对他有吸引力，他可以寄养到操他所喜欢的那种行业的人家。他的父亲，乃至地方当局，都关心替他找一个庄严可敬的户主。此外，如某人精通一艺后，想另学一艺，可得到同样的批准。他学得两门手艺后，可以任操一艺，除非本城市对其中之一有更大的需要。

摄护格朗特的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职掌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辛勤地于他们的本行，但又不至于从清早到深夜工作不停，累得如牛马一般。那样倒霉是比奴隶的处境还不幸了，然而除乌托邦人外，劳动人民的生活几乎到处如此。乌托邦人把一昼夜均分为二十四小时，只安排六小时劳动。午前劳动三小时，然后是进午膳。午后休息二小时，又是继以三小时工作，然后停工进晚餐。他们从正午算起是第一小时，第八小时左右就寝，睡眠时间占八小时。

工作、睡眠及用餐时间当中的空隙，由每人自己掌握使用，不是浪费在欢宴和游荡上，而是按各人爱好搞些业余活动。这样的空闲一般是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照例每天在黎明前举行公共演讲。只有经特别挑选去做学问的人方必须出席。然而大部分各界人士，无分男女，成群结队来听讲，按各人性之所近，有听这一种的，也有听那一种的。但如任何人宁可把这个时间花在自己的手艺上则听其自便。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水平不够达到有脑的较高深的学科。他们搞自己的手艺实际上还受到表扬，因为对国家有益。

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夏季在花园中，冬季在进餐的厅馆内，或是演奏音乐，或是彼此谈心消遣。骰子以及类乎此的荒唐有害的游戏，乌托邦是从不知道的。可是他们间通行两种游戏，颇类下棋。一种是斗数，一个数目捉吃另一个数目。另一个游戏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于此首先很巧妙地显示出罪恶与罪恶之间彼此倾轧而又一致反抗道德，然后是什么样的罪恶反抗什

么样的道德，用什么样的兵力公开袭击道德，用什么样的策略迂回向道德进军，而道德又是采取什么样的防护以阻止罪恶的猖獗得势，用什么样的计谋挫败罪恶的花招，直到最后，其中一方通过什么样途径取得胜利。

可是，为了避免误会，这儿有一点你必须更深入地加以考察。既然他们只工作六小时，你可能认为其后果是必需品会有些是不足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必需或便利所万不可少的全部供应，这六小时不但够用，而且绰有余裕。这种现象你会理解，假使你考虑到在别的国家只吃饭而不干活的在全人口中占多么大的一个比例，首先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她们是全民的半数，或是妇女有事干的地方，男子又通常睡懒觉。而且，那伙僧侣以及所谓的宗教信徒又是多么队伍庞大、多么游手好闲呀！和他们加在一起的还有全部富人，特别是叫做绅士与贵族的地主老爷。再算上他们的仆从，我指那些干不出一件好事的仗势凌人的全部下流东西。末了，包括在内的又有身强力壮的乞丐，他们借口有病，专吃闲饭。这样，你就一定发见，创造人们全部日用必需品的劳动者远比你所想象的人数要少。

现在可以估计一下，在劳动者当中从事必要的手艺的人又是多么少得可怜。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人们势不得不操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现在干活的这一大群人分配到为满足生活的少数自然需要与便利的少数行业中去，商品就必然大为增加，价格就会跌落到使制造工人无法靠作工维持生活。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全部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劳动，做有益的工作，那么，你不难看出，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够有余地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甚至享乐，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乐）所必不可少的一切。

乌托邦的经验证明了上述的后一种情况。那儿，每一座城及

其附近地区中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准予豁免的不到五百人。其中各位摄护格朗特虽依法免除劳动，可是不肯利用这个特权，而是以身作则，更乐意地带动别人劳动。有些人经过教士的推荐以及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豁免，以便认真进行各科学术的研究。但是如果任何做学问的人辜负了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就被调回去做工。相反，往往有这样的事，一个工人业余钻研学问，孜孜不倦，成绩显著，因而他可以摆脱自己的手艺，被指定做学问。正是从一批有学问的人当中，乌托邦人选出外交使节、教士、特朗尼菩尔，乃至总督。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总督叫做巴桑，[①] 近来称为阿丹麦。[②]

几乎其余所有居民既不懒散，所忙碌从事的又非无益的工作，因此可想而知，他们制出的好东西多么丰富，花时间又多么节省。除此而外，他们对大多数必需的手艺，不如在别的国家要费那么多工，这也是一个便利。首先，房屋的建成和修理在别处要大批工人经常付出劳动，这是因为一个父亲经营的建筑，他的不知爱惜财力的后人总是任其逐渐颓毁。结果，本是花小钱就可以维修的房子，后人须花大钱另起一幢。而且，甲虽然使用巨款才造成的房子，乙却任意挑剔，不把它看在眼里，不加爱惜，任其失修倒塌，然后在别处花同样数目的钱另造一所。而在乌托邦土地上，由于一切井井有条，公众福利管理认真，很少见到辟新地建新房。乌托邦人勤于维修房屋，尤其重视事前爱护。从而花的劳动量最小，房屋非常经久，瓦木工有时闲得无事可作，除非在自己家中砍劈木料，同时整修石块，以便一日有兴土木的需要，可以很快建好房子。

同样，关于服装，也请注意消费的劳动力多么少。首先，他

---

① 巴桑（Barzanes）——一说据希腊语指宙斯之子（宙斯乃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中译者。

② 阿丹麦（Ademus）——据希腊语为“无国民”之意。——中译者

们在工作时间穿可以经用七年的粗皮服，这是朴素的衣着。他们出外到公共场所时，披上外套，不露出较粗的工作装。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因此，毛绒的需要固比他处为少，而且比别处价格低廉。从另一方面说，亚麻布制成较省力，用途也就较广。对亚麻布他们着重的只是颜色白，对毛呢他们着重的只是质地洁。毛头纤细他们不希罕。所以，在别的国家，一个人有各色的毛衣四五件，又是四五件绸衫，不觉得满足，更爱挑挑拣拣的人甚至有了十件还不满足；而在乌托邦，只一件外套就使人称心满意，一般用上两年。当然，乌托邦人无理由要更多的衣服，因为更多并不穿得更暖和些，也不显得更漂亮。

此所以，既然他们大家忙于有益的手工艺，而且从中取得较少的产品已经足够，他们在一切日用品充沛时，间或调出不计其数的公民修理一切损坏了的公共道路。如果甚至这样的修理都无需要，他们还往往公开宣告减少工作时数。政府并不强迫公民从事多余无益的劳动。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

原载《乌托邦》第48—68页，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选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阅读文献》第247—25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版。

欧文：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从无理性到有理性的过渡（节选）

第四章 以不变的自然法为基础的普遍适用的理性宪法

宪法条文和立法原因的解释

（编者注：由于篇幅有限，立法原因的解释从略）

第一篇 居民的物资供应和教育

第一条 每个人都应当通过公共措施，根据平等的原则，终生得到人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这些措施应使每个人的勤劳和才能得到最好的指导。

第二条 人人从出生到成年，都应当用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方式进行教育和培养。

第三条 在教育、家庭教育和参加劳动方面，人人都应该服从一个共同规定的秩序。

第四条 一切儿童出生以后，就应当受到出生地的协作社或新村的特别细心的照管，但是他们的父母也应当经常有自由接近子女的机会。

第五条 同一新村的全体儿童，应当象同一家庭的儿童一样，在一起学习和受教育，并尽早认识支配人的本性的规律，因为这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重要的知识。

第六条 应当鼓励每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感情和信念时绝对服从关于自己的本性的规律，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切情况下只说真话。

第七条 男女两性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教育、享有同等的权利、优待和人身自由；婚姻决定了自然的互相爱慕，这种爱慕应被正确地理解，摆脱人为障碍的影响；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婚姻没有使结合的双方得到幸福，那末，那些使婚姻关系无法解除并使不满意婚姻状况的人遭到不幸的法律，就应该废除。

第二篇 思想自由或信仰自由

第八条 人人都应在宗教和其他一切问题上享有自由表示自己信念的同等权利。

第九条 除诚恳而友好的论证以外，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其他方式影响他人的见解或信仰。

第十条 不论持什么见解或信仰，都不得受到任何赞许或谴责、任何表扬或处分、任何奖励或惩罚。

第十一条 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奉者都应当有同样的权利对推动原子和主宰宇宙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表示自己的意见，以及用自己的良知所允许的任何形式和任何方式对这种力量表示各种崇拜，同时也不反对采取其他方式。

第三篇 居民的公共秩序

第十二条 在儿童通过教育获得导源于神圣法则的新习惯和新感情以后，成为目前这种严重不公正、犯罪和灾难的成因的无益的私有财产，在新村中将不复存在。

第十三条 只要这种新村的成员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受认识神圣法则的教育，习惯于在自己的行动上服从这种法则，处在相

应的环境之中，从而有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这样，一切个人奖惩制度就会消灭。

第十四条　每个新村都应当是按照通常人数比例（五百人到三千人）构成的男女老幼的联合体。三千人是人们能够最有效地在有科学根据的统一条件下联合起来以实现自己的一切重大任务的最高人数。

第十五条　随着新村数量的增加，应由几十个、几百个以至几千个新村结成联盟，直到联盟普及整个欧洲，随后再普及世界其他各洲，最后把全世界联合成为一个只被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伟大共和国。

第十六条　每个新村都要拥有足以保证人口达到最高数目时的生活需要的土地。

第十七条　新村应该建设得使每个新村的全体成员都能尽可能享受到同样的好处，在他们之间有尽可能多的愉快的交往。

第四篇　居民的管理和理事会的职责

第十八条　每个新村都应由内务部（通过由新村全体年龄为30到40岁的居民组成的总理事会）管理。每个部都应受由总理事会的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直接管理，这些成员是总理事会按一定程序选出的。对外关系部或外交部由新村全体年龄为40到60岁的居民组成。

第十九条　在新村全体居民都能胜任一般的行政工作以后，就不必再选择或选举任何人来担任政府职务。

第二十条　自幼就在新村中受到培养的全体新村居民，年满30时正式应召参加内务部工作，承担实际职务，而到40岁时解除这方面正式职务，他们年满40岁时，应召参加对外关系部或外交部工作，而到60岁时解除这方面职务。

第二十一条　内务部总理事会的职责是：调整村内的一切生

活条件，组织各种生产部门和分配部门，培养人的性格，消灭一切不利于居民幸福的条件，用所能想出或从其他新村学到的最完善条件取代这些不利条件。对外关系部或外交部的总理事会的职责是：接待来自其他同类新村的访问者或代表，同这些新村保持联系，访问它们，与它们共同拟订修筑道路的措施，彼此交换多余的产品，组织参观旅行，发送和接受有关发明、发现和改进的情报，交流各种可能有用的知识，调整为繁衍的人口而建设新村的工作并给予协助，派遣代表参加本村所加入的新村联盟。

第二十二条 内务部或外交部的总理事会，对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务享有完全的管理权，但是它们的行为应符合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完全遵循的人的本性的规律。

第二十三条 凡是依照自己的本性的规律接受教育、训练的人，一定会经常合乎理性地思维和行动。倘若他们在体、智、德方面有了疾病，理事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把他们送到治疗体、智、德方面缺陷的医院去，直到在温存的护理下治愈疾病，恢复健康为止。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必要时可以接受新村任何居民的实际帮助和建议。

第二十五条 为了避免作出不公开的判断和防止新村成年居民之间产生敌对情绪，为了经常保持神圣法则的纯洁无暇，每个新村应在每年元旦上午十时召开大会。大会的参加者是本村中曾经担任过理事会成员的老年居民，以及出生后就在本村受教育的尚未参加理事会的十八岁以上的居民。大会的任务是听取各理事会准备的正式书面报告。报告要由每个理事会最年长的成员代表理事会提出，并认真地汇报过去一年的工作。作完报告以后，大会开始讨论报告，并加以仔细审查。在大会取得一致的意见时，由年长与会者中的三个年龄最小的人和年轻与会者中的两个年龄最大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拟定大会对理事会的报告所作的决议，其中应该特别指出过去一年是否一贯遵循神圣法则。这个委

员会还应当以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对于他们认为是破坏这项极其英明而不可变易的法则的任何措施提出自己的意见。对于理事会的报告应当登记、保管和付印，以便本村居民可以利用并寄给加入联盟的其他新村。

第五篇　关于意见分歧的调解

第二十六条　如果总理事会企图在什么时候违反人类的自然法则（未必有此可能），村里担任过理事会成员的老年居民都应当召集自幼就在本村受教育的全体十六至三十岁的居民举行公共集会。这个会议在召开前一个月发出通知，它应当冷静地耐心地审查总理事会的行动。如果大多数人认为总理事会违反了或试图违反上述法则，就应当把一般行政管理工作移交给担任过理事会成员的六十岁以上的居民和尚未参加进理事会的二十至三十岁的居民。

因为居民自幼就受到理性教育，出生后就处于良好的条件下，所以很难想象这条法律会在什么时候被应用，即使需要应用它，也只是暂时的。

其他一切的意见分歧（如果在习惯于合乎理性地感觉、思维和行动的居民中真要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迅速由最近参加理事会的三位成员审查，并以多数决定的方式对双方进行友好的调解。

原载《欧文选集》第2卷第126—159页，柯象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选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阅读文献》第262—26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第2版。

第二章 附录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节选）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缺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各自分等。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①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② 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③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①]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原编者注

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①]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②]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③]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④]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

---

①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原编者注

③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原编者注

④ “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原编者注

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深受反动派称许的中世纪的那种力的野蛮表现，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

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

① “文学”一词德文是 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原编者注

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①]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那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②]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原编者注

② 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资产阶级文明和”。——原编者注

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仅如此，机器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①]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① “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原编者注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①]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②]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

---

① 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最终”一词。——原编者注

② “受到女工的排挤”在1848年第一个德文版（2月出版的二十三页本）中是“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原编者注

身;[①]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②]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起来反抗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

---

① 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原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原编者注

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②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

---

① “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原编者注

②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原编者注

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①]运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原编者注

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①]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②]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

---

① “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原编者注

② “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原编者注

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①]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②]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

①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原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原编者注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0—265、272—273 页。

第三章 附录

列宁：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

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而且他们对于这种“正常”的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

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

二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

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9—372页

列宁：论建设社会主义

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3页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 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8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

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1—32页

决议的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评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27年前就已指出，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恩格斯指出：“哪里有托拉斯，哪里就没有无计划性，而有资本主义。”①现在指出这一点尤其恰当，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计划性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35—436页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原编者注

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04页

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页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64页

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4页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68页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1页

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

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9—290页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

我们记得，恩格斯说过，我们应当采用示范的办法。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7页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8页

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意见的差异和方法的不同并没有任何害

处。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实验的阶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业已确立，但是，最有成效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促进革命胜利的策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出结论，还必须加以讨论。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一切问题，我们才能达到更高的真理。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8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怎样进行斗争，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并且早已解决了。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一过渡搞得好也需要许多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又要照顾到许多较小的过渡。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3页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保证，但是经济方面，只有当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无产阶级的俄国时，才算有了保证，而这就意味着电气化。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0—31页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

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56页

关于计划，米柳亭发表了一通谬论。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家计划工作官僚主义化。

这是莫大的危险。米柳亭看不见这种危险。

我很担心，连您也看不见这种危险，尽管您的工作作风不同。

我们穷得象叫花子，象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

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

不要追求这种空想。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30页

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但是，每个托拉斯为着自己工作的顺利，应当认为自己是自由决定方针并且对自己的工作负完全责任的企业，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就应当把这些托拉斯以及其它联合企业当作自己的辅助机关，国家就借助于这些机关去探索整个市场，而使许多比个别企业或联合企业采取的市场方针更优越的实际措施成为切实可行的。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6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6—217页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

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业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党纲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9页

我们需要的国家银行同商业的关系应当比资本主义同商业关系最密切的国家银行还要密切一百倍。我们的国家银行应当有个商业代办网，上自中央（有点类似银行中掌管几十亿周转资金的商务巡回检查员），下至小的乃至最小的商业代办点。如果整个代办网实行分成制并学会（也教会我们）很好地做生意，那么我们就能够掌握整个贸易额的9/10。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恢复黄金流通，并使新经济政策由一个愚弄共产党蠢人（他们掌握着政权，但不会利用它）的制度变成社会主义的基地——一个在农民国家里的为世上任何力量所战胜不了的基地。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289—290页

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对国家银行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变成官僚机关。我们还在考虑法令、机构。错误就在这里。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要实践。发现人才——做生意的人（但愿能从一百个、一千个共产党员中挑出一个，这还要上帝保佑），使我们的法令由废纸（不管法令本身是好还是坏，反正都一样）变成生动的实践，——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0—301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节选）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①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了解，也可以那样了解。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在19世纪末，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

附带说一句，不仅在19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经达到了英国那样的程度。至于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可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予以确定的。

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

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产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

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象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

(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殊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么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

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他的这本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著作中承认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用于教育、保健事业、管理费用、后备基金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

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地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各种生产数值，精确地计算这些数值，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实有的东西，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棉农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

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们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和蓬勃地发展，价值规律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发生作用的广阔范围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

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象在商品生产制度下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么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优先发展最能赢利的轻工业，而去发展往往赢利较少、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

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对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方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

简略地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

选自《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5—557页

第四章 附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节选）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

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

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6—649页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节选）

一

……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建成这样一个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地解决以下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

第一，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积极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

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建立和发展我国重工业中目前还缺乏的或者薄弱的而又是最急需的部分，例如高级合金钢和稀有金属的冶炼，重型机器、专用机床和仪表的制造，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无线电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的建设等等。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要求各项建设事业不分轻重缓急地齐头并进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继续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资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会削弱重工业。

第三，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

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运输业方面，应当合理地组织运输力量，继续进行新的线路的建设，对原有的线路（首先是铁路上运输紧张的地段）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并且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目前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不高，一部分日用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质量甚至比以前降低，对于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地改变。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克服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养成重视质量的风气，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都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降低成本，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

第六，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重工业部门中，必须集结和壮大设计新产品的力量，增强制造能力，并且逐步地推行生产标准化，加强专业和协作的配合，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办法，逐步达到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

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又需要密切地结合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设计和生产适合于我国具体需要的新产品。只有依靠这些重大的努力，并且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技术支援，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地完成我国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

第七，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在内地和近海地区的关系上，既须继续把工业重点合理地移向内地，发展内地的经济事业，又须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近海地区的经济事业，特别是应当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业基地来迅速推进内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在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上，既须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须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第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者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

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九，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第十，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选自《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09—81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第1版。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节选）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选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 版第 131—134 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也十分重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

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也能翻身呢？这个道路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按照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不但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坦率地说，中国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基础很落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工业几乎等于

---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零，粮食也不够吃。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我们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所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样，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发生两极分化。

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对你们来说也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

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但是只讲这个还不够，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搞建设关起门不行。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指对国际；一种是指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我们提出要发展得稍微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稍微快一点。这就要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我们首先是解决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

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学、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我们开放了十四个

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搞两极分化。这样，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我们能借此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

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再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我们相信，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这条道路我们走了五年半，这五年半发展得不错。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五年半的速度超过了我们预期的目标。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选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51 — 56 页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我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但是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

---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

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

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那就是说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所以，我认为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

选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4—97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这是比较大的错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大炼钢铁，再加上一系列具体的“左”的作法，结果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的威信、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实的步骤和比较合理的方法，三年时间就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过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二年刚刚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这时又出现了“左”的思想，一九六五年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

---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些老干部。我们把这种思想叫作极左思潮。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所谓“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七十几元人民币，那是很穷的了。七十几元的年纯收入大约相当于工厂工人的月工资。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当然这是旧中国所没有的，也是一个进步了。但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

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与此同时，我们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合资经营，外国资本占一半，另一半是我们社会主义公有的，至少发展了一半社会主义经济。一个企业办起来，企业的一半收入归社会主义所有，国家还可以从企业中得到税收。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合资经营的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欢迎外国独资经营，我们从中得到税收，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什么损害。现在外国投资有限。我们倒是觉得这种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

产阶级。如果我们的改革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没有什么坏处。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总的一句话，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还要说，讲开放问题，不要忽视国家机器的作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纠正过来。开放政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险，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会被带进来。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

中国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就是因为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于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选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4—119 页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节选）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就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对内我们也开放，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我们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逐步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所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

---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话的一部分。

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实行多种经营，不仅粮食有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增长得很快。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自从搞了改革，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他们有了自主权，一下子就改变了面貌。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他现在是我们的代总理。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公布以后，还有一些省徘徊、怀疑，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还有的看了两年才跟上。那个时候，中央的方针就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

农村改革总的来说发展是比较快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今年已经过了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往城市跑，而是建立了大批小型、新型的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

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去。尽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同时，我们的对外开放也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凡是执行了开放政策的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决定先搞四个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三个，一个是珠海，一个是汕头，一个是福建的厦门，广东省占了三个。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最近有的同志告诉我，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比深圳还理想。一九八四年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只有一个机场，现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总之，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虽然每一个领域还有不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难逐步

解决的。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现在快、慢也是我们议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我们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最近我们中央在考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这是我讲的经济体制改革。

现在我门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的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一个是多党竞选，一个是三权鼎立。我们能搞三权鼎立吗？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凡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经过那么多的反复，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们不能搬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讲的效率不是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那种效率，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考虑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就是说不能搬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实行改革的步骤。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东欧各国的改革也都不是一样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

同，所以各国的改革也不可能一样。就拿我们中国来说，考虑这个问题也同你们不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本身来说，还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

增强活力，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世界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都要大，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都偏大。我们党在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领导机构老年化。那个时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重新恢复了领导工作，所以年龄偏大。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在八大时才五十二岁，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七十二岁了，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大时是七十三岁，再到十三大我就八十三岁了。虽然有比我年轻一点的同志，无非年轻几岁，也都是老年人了。所以各级领导机构、各行各业的领导机构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干部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只能逐步进行。选拔干部也不是只讲年

龄这一条，还得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这个问题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要克服还要做许多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减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这三个目的。民主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怎么个搞法还是新问题。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搞普选，就是在县一级、城市区一级搞普选，省市和中央这两级是间接选举。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普选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我们还是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的两院制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我们也有民主党派，但是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实行多党协商的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我们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以及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正在议论，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个头绪，从十三大开始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预期的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

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选自《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2—41页

第五章 附录

金日成、金正日：主体思想

一、金日成同志对“主体思想”的阐述

究竟什么是“主体思想”？现根据金日成同志自己的权威性解释介绍如下。

五六十年代，金日成同志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丢掉依赖心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因此，他把“主体思想”概括为“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认为“主体思想”是“直接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

——1955 年 12 月，金日成同志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在许多方面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深入钻研各种问题，没有主体，这是思想工作中的最主要的缺点。”“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创造性的学说。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战无不胜的威力。”

——1963 年 10 月，金日成同志在金日成军事大学第七期毕业典礼上说：“目前，我们党的口号是：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在思想上要彻底树立主体。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有为朝鲜革命服务的主体思想。”

——1965年4月，金日成同志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演说时说，“树立主体，这意味着坚持这样的原则：独立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这是反对教条主义，并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国际革命运动经验的现实的创造性的立场。这是丢掉对别人的依赖心理，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自己负责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主的立场。”“每个党在本国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并通过这一斗争丰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这一运动作出贡献。主体思想是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原则的，是直接来自这一原则的。”

——1967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纲》中指出，“我们党的主体思想，是有效地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的坚定不移的指针。”

——1970年11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党的唯一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体思想。”“树立主体，一句话就是以主人的态度对待本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意味着坚持自主的立场，也就是说，丢掉对别人的依赖心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相信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自己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自己负责解决；同时还意味着坚持创造性的立场，也就是说，反对教条主义，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它国的经验。主体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阶段及其必然要求的反映而产生的。”

因此，1970年劳动党五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把主体思想定义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又过了

两年，1972年12月通过的朝鲜社会主义宪法也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针。"

70年代以来，金日成同志强调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主的哲学"。他说："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是主体思想的基础"，"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这就是主体思想的要求。""主体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结"，是"实现劳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的的革命学说"。

——1972年9月，金日成同志答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问时说："用一句话来说，主体思想就是认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样一种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认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是自己本身，开创自己命运的力量也在于自己本身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我们最先发现的。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论谁都是这样想的。我不过是特别强调了这种思想。""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是主体思想的基础。""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这就是主体思想的要求。"

——1975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主体思想是以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为基础的。主体思想科学地阐明了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予人们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最正确的见解，给予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主体思想是以劳动人民群众为中心加以阐述的革命理论，是以劳动群众的作用为基础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我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结——主体思想，极其丰富，它包括了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改造的所有领域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做出了正确的解答。""在长期艰苦的抗日革命斗争过程中，主体思想产生并发展和丰富起来，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主体的思想

体系。”

——1980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主体思想是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以实现劳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的的革命学说。”

——1981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答加纳政府机关报《加纳时报》总编辑问时说，“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主的哲学。这意味着主体思想是把人放在哲学观察的中心，以回答人的命运问题为使命的哲学”。“主体思想所观察的社会人的本质属性，是自主性和创造性。”

——1982年6月，金日成同志在答外国通讯社社长问时说，“人由于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才成为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和起着特殊作用的存在。”“主体思想要求劳动人民群众应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和建设，思想上树立主体，实现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和国防上自卫。”

二、金正日同志对“主体思想”的进一步阐述

自70年代以来，金正日同志在讲话和著作中，对主体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主体思想已形成“主体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完整的体系”，并称之为“金日成主义”。他强调主体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他说：“主体思想”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前提”的，二者“具有共同性”，但同时又克服了唯物辩证法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他进一步强调，“主体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主体思想“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1976年10月，金正日同志在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组成来看，金日成主义是不

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形成金日成主义的精髓的主体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新发现的思想。”“主体思想的哲学原理，是不能在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解释的。”“其社会历史原理不能按唯物史观来解释”。“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

——1982年3月，金正日同志在《关于主体思想》一文中说，“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已登上斗争舞台的工人阶级指明了历史使命和解放的道路，推动了反对资本的斗争，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已变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提出了列宁主义，从而鼓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投入了摧毁帝国主义堡垒、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端。（金日成）主席深入洞察到曾备受压迫和歧视的人民群众已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创立了伟大的主体思想，从而使人民群众争取自主性的斗争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思想”，“是以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为基础的”。“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自主性，是作为社会人要求成为世界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而自主地生活和发展的属性”；“创造性，是社会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开拓自己命运的属性”；“意识性，是社会人决定自己的认识并改造世界和自己本身的一切活动的属性。”“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为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的自主的思想意识。”“主体思想，在以唯物主义原理阐明了世界的本原问题的前提下，又崭新地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了出来，对世界的主人是谁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世界观，但未曾有过以人为中心来阐明对待世界的观点和立场的。”

——1986年7月，金正日同志在《主体思想教育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把人放在世界的主人地位上阐明世界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世界观。有些人一听到说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就以为是无视客观世界，只片面地重视人的主观欲望或愿望。这种看法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是说要以人为中心来看世界，从未说过只要看人。”金正日同志认为，以往的哲学原理只是“阐明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但无法阐明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而主体哲学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理为前提，“科学地阐明了人在物质世界中所占的特有的地位和所起的特有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唯物辩证法”。

——1992年1月金正日同志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的谈话中说，“社会的主人不是别的，就是人；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自主地、创造性地开拓自己命运的社会存在。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的发展水平；随着人的自主的思想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提高，社会财富得到增加，社会关系也与之相适应地得到发展。因此，不应该以物质条件为主，而应该以人为中心来观察社会；对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以自然史过程来观察，而应该以社会运动的主体——人民群众自主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过程来观察。”

——1994年1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中指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先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先前的理论，没有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是，由于它的主体即人民群众主动的努力和作用而发生和发展的主体运动，而把它看作一个主要是由于物质经济上的因素而变化和发展的自然史的过程。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敌对矛盾就越激化，以工人阶级为首的革命力量就越成长壮大，因而革命就越趋成熟。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

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未能指出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径。”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先前理论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得更明显。”“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是比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的工作更重要的首要任务。只有使人的改造工作领先，才能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对客观的物质经济条件赋予决定性的意义，只追求经济建设，而忽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工作，忽视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的工作，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经济建设本身也难免停滞不前。”

“把社会主义提到新的科学基础之上来的历史课题，由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主体思想，并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独创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才胜利地得到了解决。敬爱的金日成同志发现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的哲学原理，崭新地阐明了作为主体的运动的社会运动的规律性，从而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主体思想阐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完全实现其自主性的自主事业。”

——1996年7月26日，金正日同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杂志《劳动者》上发表谈话，强调主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他说：“主体哲学为哲学思想发展建树的历史功绩，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而是阐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物质的第一性与存在的第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依靠物质运动而变化发展。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崭新地提了出来，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样一个哲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开拓人的命运的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要

课题是阐明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主体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则是阐明人的本质特点和人的运动即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可见主体哲学及其哲学课题和原理是同先行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主体哲学是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的哲学，用先行哲学的框框是无法解释的。”

选自《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上卷第384—391页，肖枫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第六章 附录

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

二、原 则

自由、公正和团结

12. 民主社会主义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它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和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这些基本的价值能得到增进，人人都能过有意义的生活，男男女女的个性与天赋都能得到充分发展，人权与公民权利都能在民主的社会框架中得到保障。

13. 自由是个人努力和合作努力结合的产物——这两个方面是同一进程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权免受政治强制，并享有为追求个人目标和发挥个人潜力而行动的最大机会。但是，只有整个人类争取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并确保没有任何人、阶级、性别、宗教或种族沦为仆役的长期斗争取得成功，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14. 公正与平等。公正意味着结束一切对个人的歧视，意味着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它要求对体力的、智力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作出补偿，以及既摆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摆脱对政治权力拥有者的依附。

平等是所有人具有平等价值的表现，也是人性自由发展的前提。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平等，是个人多样化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自由和平等并不矛盾。平等是个性发展的条件。平等和个人自由是不可分的。

15. 团结是无所不包的和全球性的。它是共同的人性和对不公正的受害者寄予同情的实际表现。一切主要人道主义传统都强调和欢呼团结。在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空前相互依存的现代，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团结，这就使团结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16. 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上述基本原则具有同等重要性。它们相互依存，彼此互为前提。持相反立场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主要强调个人自由，而牺牲公正和团结；共产党人则自称要实现平等和团结，而牺牲自由。

民主与人权

17. 民主这个概念是以自由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因此，男女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在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都享有平等权利，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观的组成部分。

18. 民主社会主义者力求为各色人种、种族集团、民族和教派赢得平等的权利。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平等权利仍是存在严重争议的问题。

19. 民主的形式当然可以不同，然而，只有在人民可以在自由选举的框架内对各种政治方案自由进行选择，只有在人民有可能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通过和平手段更换政府，只有在个人和少数派的权利得到保障，只有在以法治为基础的独立司法体制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谈到民主。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成分。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与经济民主化和社会公正日益增进的持续进程。

20. 个人权利是社会主义价值的根本。民主和人权也是人民权力的精髓和不可缺少的机制，人民能够运用这种机制来控制长期统治他们的经济结构。如果没有民主，社会政策不可能掩盖政府的独裁性质。

21. 各种不同的文化无疑将产生各自的民主制形式。但民主

无论在各国内部或国际上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让个人和有组织的少数派观点享有充分的权利。对于社会党人来说，民主的根本性就是多元的，而且这种多元性为民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最好的保证。

22. 免受专横独裁政府统治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具备这个先决条件，各国人民和社会才能够创建一个更美好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民将民主地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性质

23. 民主社会主义者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规定了上述的这些价值。它们起源于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工运动、人民解放运动、相互帮助的文化传统和地区的团结互助。它们还得益于全世界的各种人道主义传统。

尽管社会党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大家一致向往一个将自由、公正和团结结合起来的、和平民主的世界。

24. 在今后的岁月中，各国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将会在政策上出现差异，在立法条文上有所区别。这些差异和区别将反映出它们的不同历史和多样化社会的多元性。社会党人并不宣称自己拥有建设某种到了终点的、固定的社会的蓝图——某种不能改变、改进或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在一个致力于民主自决的运动中，创造性将始终有用武之地，因为每个民族和每一代人都必须确定自己的目标。

25. 除了指导所有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原则外，社会党人对基本价值观念还有明确的共识。尽管存在各种差异。他们都主张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

26. 个人自由和基本的社会权利是大家都享有人类尊严的前提。这些权利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用来相互抵消。社会党人保护人们享有生命与人身安全、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

免受酷刑和屈辱等不容剥夺的权利。社会党人力求实现免于饥饿与匮乏的自由，实现真正的社会保障和工作权利。

27. 民主社会主义还意味着文化的民主。各个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文化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每个人都应得到分享本国的与全球的文化遗产的平等机会。

选自《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65—68 页

主要参考文献

1.《乌托邦》商务印馆 1982 年版

2.《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3.《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4.《傅立叶选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5.《欧文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6.《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 1980 年

7.《社会主义学说史》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下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4 年

9.《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10.《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高放主编 内部发行 1985 年

11.《社会主义四百年》上、下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 1987 年

13.《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上、下册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年

14.《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5.《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红旗出版社 1999 年

16.《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7.《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增订本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8.《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王捷 杨祖功 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20.《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21.《毛泽东思想概论》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22.《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

23.《谁主治浮——对社会主义的回顾思考与展望》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文库》红旗出版社 1995 年

25.《高举邓小平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6.《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27.《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红旗出版社 1988 年

28.《邓小平理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29.《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30.《新时代的理论纲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31.《社会主义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32.《当代国际人物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

33.《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

34.《“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阅读文献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35.《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高放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36.《国际共运名人传》北京出版社 1998 年

37.《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38.《社会主义论丛》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39.《高放政治学论粹》团结出版社 2001 年

后　记

作为一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多年来一直为无合适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参考教材而遗憾。如今，《社会主义发展史纲》的问世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全书除提供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致梗概外，还附录若干原著，供研究生探讨研习。此外，对于生活在一定社会制度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们，也是一本了解古今中外社会主义来龙去脉并从中得到些许启迪的通俗读物。

本书的写作要感谢我的老师、科学社会主义学界的老前辈高放教授。早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以及后来执教时期，高老师就一直谆谆教诲、指点迷惘、开启思路，使我受益匪浅。本书就是在高老师的策划指导下动笔写作的；在本书的构思、写作、修改中，高老师也提出许多中肯、贴切的意见，某些修改有时就是理论创新；书稿打印出来后，高老师又对书稿逐一审核确定，并悉心写作了三千余字的序言。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此外，由于第四章篇幅较多，西安空军工程大学的霍晓东老师协助了该章的初步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内蒙古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及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同仁，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就难以出版，谨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此外，还要致谢西安东方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金彤先生，是他给予我新的生命并开启我新的人生，并对本书的构思写作出版提出许多指导建设性意见，从而才有本书的早日面世。

最后，本书附录中有些材料录自高务印书馆的《乌托邦》、《欧文选集》第2卷等书。

谨祝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们美好幸福。

冯秀珍

2002年4月12日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育新花园

责任编辑/崔　羽
封面设计/方　圆

ISBN7-80083-996-6/D · 962　定价：2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0953392